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名人

演说精粹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 前 言

二十世纪也许是人类既往文明史上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为巨大的世纪之一。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里，近一百年的历史巨变更是令人惊叹。一百五十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毁了神圣天朝的梦幻，中华民族顿时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于是，在这个有着不可思议的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中，有了锐意维新变法的先驱们的探求，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斗士们的呐喊；有了冲决封建罗网的英烈们的抗争，不甘屈辱抗击侵略者的战士们的壮举；有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万众欢腾的喜庆，齐心协力共建新中国的豪情；亦有了风云变幻峰迴路转的徬徨，雨霁云开痛定思痛的感慨。在这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我们民族脱下了长衫马褂，剪去了脑后那沉重的辫子，历经几番腥风血雨，在几千年封建王朝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度沉浮之后，今天，已经在向着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迅跑。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回味、值得深思、值得铭记的世纪！

本书试图借助演说这种特殊的文体，为读者提供一种感受、品味、思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末这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大进程的独特的角度或形式。其所以独特，是因为演说既不同于史论之抽象灰色，又不同于纯文学作品之受制于具象，而是兼有二者之长——既能集中地、全景地展示时代风貌与历史进程，又颇具个性色彩。演说辞虽然已是文字形式，但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作者当年的音容笑貌、意气风采。书中选取的四十三位人物的八十余篇演说，无一不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色彩。

诚然，囿于编选者的学识水平以及资料条件等限制，本书的客观效果与我们的主观愿望必会存在距离，我们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品评。另外，在编著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入选名人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他们在历史长河的重要时刻，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演说辞，弃之不忍割爱。因此，编著者欲以入选者演说辞发表的时间为序，有些入选多篇者，则以其第一篇发表的时间为准，以此为全书之编排准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多种资料与书籍，在此谨致谢意。

编者

1993年11月

## 总 序

### 周谷城

演说就是向听众发表对某个现实问题的见解，或阐明某种事理。每个人一辈子要听许多次演说，也要作不少演说，可见演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活动。

演说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四千多年前，古埃及的法老就说演讲比打仗更有威力。在古代希腊、罗马，演说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产生过希腊的伊索格拉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的昆体良、西塞罗等一大批演说家，还办了“演讲学校”。在我国古代，演说也曾经辉煌。所谓“左史记言”，《尚书》中就有不少演说名篇。《国语》、《战国策》中之言，颇与古希腊之演说词相似，亦治政治、历史、文学及雄辩术于一炉者也。《论语》其实是孔子向三千弟子传授知识时的演说精华。孟轲、商鞅、苏秦、张仪俱为雄辩的演说家。在《盐铁论》中，则可以读到西汉政治家桑弘羊精彩的经济演说。据此，窃以为演说之在中国，实有久于希腊、罗马者。

演说不仅源远流长，且有重要作用。一篇好的演说，或事实有据、逻辑严密，或慷慨激昂、豪气凌云，或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或机智幽默、妙趣横生，或数者兼而有之，足以使人坚定对崇高理想之信念；足以使人增加知识，明白道理；足以动人心弦，催人奋发；足以给人欢乐，得到美的享受。历来名家演说，不仅风靡当时，且对后世实有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两个文明建设，要做好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演说。各级党政领导、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做报告，科学家的学术报告，群众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教师向学生讲课，检察官提起公诉，律师为当事人辩护，这些都是演说。此外接待来宾，介绍经验，发布消息，讨论问题，无不要用到演说。演说要有好的效果，就不能照本宣科，而必须掌握演说的艺术。掌握演说艺术别无他途，除了从实践中学习外，再就是借鉴前人演说的成功经验。由此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共同组织力量，翻译和汇编古今中外演说名篇，成套出版《世界著名演说文库》，以飨有志于演说者，此举确系一种有益的尝试，且为文化积累所不可少。

古今中外的演说名篇数量甚多，要想一下子收集得齐全，并同时出版，难免旷日持久，甚至是不可能的。不妨成熟一批，先拿出一批来。“草鞋没样，越打越象。”这样分期分批积累起来，相信反倒易于较快、较好地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演说文库。

至于每个分册的选录范围，无妨不拘一格。既可拿演说性质作标准，如就职演说、竞选演说，外交演说，也可以演说者的身份为标准，如将帅演说、律师演说、作家演说、科学家演说。既可着眼于演说之历史影响，也可着眼于演说之趣味性，如幽默演说。凡此种种，均不成问题。

此等演说，就其演说艺术而论，固有可供借鉴者。然不独止此。历来演说名篇，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反映时代风貌，或阐发深刻哲理，或含有丰富知识，实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成为文化遗产。唯其如此，鄙意以为阅读这些演说，非独有助于掌握不同性质、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下的演说艺术，抑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丰富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

这些演说既成历史文献，即有其时代烙印，需要读者独具慧眼，善于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有几种演说，由于性质关系，尤其如此。如演说有足以影响历史者。观夫《礼运大同》，则可知人类之追求理想社会，固不自今日始；观夫伯里克利、柏拉图之演说，则可知西方政治制度之由来。其影响历史者，均可谓至深且远。然而有正必有反。历史不断进步，亦必有曲折。只讲进步，不讲曲折，则历史不完整。演说有促进历史发展者，亦必有促退历史者。只见前者而不见后者，则演说不完整。故适当选录一些具有反面意义的演说，以证历史道路之曲折，社会发展之艰难，人类前进之不易，实亦有其必要。

不揣冒昧，即以为序。

## 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

## 康有为 一八五八 一九二七

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保皇会首领。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未就职）。1888年首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图存三项建议，因受阻而未上达。1890年后，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变法。其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该书亦未上达。是年5月，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嘉许。后与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报》，又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亦出版《强学报》，积极推动变法运动。1898年1月，上书主张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同年6月受到光绪帝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促成了“百日维新”。以后屡上奏折，陈说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改革建议。9月，变法运动遭镇压，他逃亡国外。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7年与张勋策划复辟失败。

《古今学术源流》（1896年）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给弟子们讲学的记录稿，由康有为的门人张伯桢之子张次溪先生于六十年代初向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提供。该稿系张伯桢（1877~1949）根据光绪丙申年（1896年）听康有为授课的笔记整理而成，并经方志钦先生校点。

康有为从1888年即开始宣传并努力实践变法维新的主张，出入于宫廷内外，往来于学士政客之间，后又参与保皇复辟，一生与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大转折、大变革关系甚密，堪称思想与政治舞台上的一代风云人物。当可想见，其旨在宣传思想与政治主张的演说——不论其形式如何——亦应不少，但却未曾以文字保存并流传下来。唯有此篇《古今学术源流》，今得刊布于此，虽不曾直接宣讲这位以维新改良而著称于史的人物的救世方略，但从他对上下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源流的梳理评说中，亦可体味到他那纵观历史、放眼天下的博大胸怀与宏阔的气度。张伯桢记叙康有为讲学时的情景说：“迨及秋季，先生归来，听文讲述，放言高论，闻者动容。”当时金声玉振、撼人心魄的效果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他赖以演绎发表而为变法维新及后来保皇复辟主张的基本思想倾向。

首先可以看出，对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圣的孔子及其儒学，作者是极为推崇的。他把孔子学说视作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正宗，而把老子与墨子学说作为两种异端加以比照。他认为：“老氏之学，失诸虚；墨氏之学，失诸实。”“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而不能行。”言下之意，唯孔子儒学为虚实得体、能行而又能传的中庸之道。在评说历代学术思想的流变兴衰的时候，也是以对儒学的态度和儒学的消亡兴衰作为判别是非得失标准的。康氏之看重儒学，在于它为社会规定了一整套“最仁”、“最公”的恒定的秩序或“制度”。唯其如此，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以致后来转而而为复辟保皇。

然而，在康氏看来，孔子又是一位在“制度政教皆无定”的时代中“发愤而改制”之人；孔子是要以一种“言德”、“言民”或重仁义、重民命的制度匡扶天下。这又成为康氏力倡变法维新的根据或楷模。康氏对当时天下大势的看法是：“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

才蔚起，创制立教。”他将今时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相并举，其效法孔子立教创制之志昭然明矣！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宋代变法的王安石，虽有批评之语，但首先盛赞他“甚有气节，甚有毅力，甚有血性。当时创行新法，条理颇备……”由此亦可窥其崇尚维新一斑。此外，在这篇讲学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康氏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涉猎、吸收。

这是一篇讲学的记录，内容甚丰，当不是一次所讲，因而每有不衔接或跳跃之处。原文如此，亦不便擅作梳理。但在选编时作了一些删节。

## 古今学术源流

自孔子出，百子所称道，皆孔子之制度也。孔子未生之前，制度政教皆无定。当时诸子各有改制之心，如棘成子改文从质，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或曰“以德报怨”之类，皆欲自立教，每托古以明权，孔子乃发愤而改制。故诸子所称，皆儒、墨并举。与孔子争教者，墨子也。

诸子之教，以老、墨为最老辈。老子后学两派：一派清虚，在、列是也；一派治国，申、韩是也。

与孔子劲敌者莫如墨子，老子不及也。墨子条理甚密，老子工于藏拙。老子之教“为我”，墨子“兼爱”，但无差等，卒不能行，至今不灭者惟老学。

《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易》为穷理天人之书，皆暮年所作。制作、义理，《春秋》兼有之；《易》则义理更多，莫如《乾》、《坤》二卦。孔子有经亦有纬，纬是口说，多礼学，而以发明天道为主。

天文学、历学皆出孔门。

六代之乐，皆孔子所托。《咸池》、《韶》舞隔春秋时已二千余年，岂尚有存者？余考宋乐十六调，至今只剩七字，何况当时！

李悝尽地力，即先行孔子井田之制。

魏文侯立博士，求六代之乐，即行孔教之第一人，然只行在一国。秦始皇亦甚尊孔子，立博士二百余人，二世尚立七十余人，是行至天下。至汉武帝崇尚经术，立（六经）于学官，孔教遂定一统，推行日盛，至后汉为极焉。

.....

孔子之制度，在行井田，言性理在于仁，言人伦在父子。

孔门自七十子后学外，至战国时，传道者有孟子、荀子，分两派。孟子学多在德性，荀子学多在礼，而传经则荀子为最多。

《史记·儒林传》述孔学，《任 侠传》述墨学。

晋太康九年立博士：《易》郑氏、王氏；《古文尚书》孔氏、郑氏；《毛诗》郑氏；“三礼”郑氏；《左氏春秋》杜氏、服氏；《论语》郑氏；《孝经》孔氏、郑氏。至此而西汉所立之今文皆亡矣。

《隋·经籍志》传《穀梁》者三人。传经学者至唐孔颖达而止。

六朝经学，南朝皆郑学，北朝皆王学，俱古文学也。

今文学与名节之风，至东汉大盛。汉末郑康成始集今古之大成，加以高才硕学之徒侣最多，故郑学大行而今文寢息。至晋永嘉而今文遂绝。名节自曹操荡扫于先，至何晏、王弼尚清谈，而王衍之徒唱和之，而名节遂绝。

---

“任”，当作“游”。

加以老佛之学、词章之学陷溺既深，六朝佛学更盛，孔子之道坠地矣。然六朝可取者尚有清议及九品中正之制。晋朝徵聘不绝，故风俗不至大坏。

自东汉之后，学术、风俗之一大变者，由于郑玄及曹操、何晏、王弼数人也。

隋、唐亦立“五经”博士，由此途进者，谓之“明经”。既立科目取士，以诗赋起自唐，故人皆习于词章，而通经渐少。故唐一代，无有能通经学者，然其读书甚博，且最重骈体，故一时读文史者正多，论名节则无矣。其人皆溺于科举，上下无复有言气节者，惟韩愈一人崛起，反骈体为古文，又能攻佛、老异端，作《原道》诸篇，于是风气渐趋于义理，且气节又高，故宋学由此而开焉。五代绝无一人言学。

论学术，分两大段：自孔子至东汉为一段，自汉末至唐、宋为一段。

孔子以前，皆讲“三世”。洪水时，人与水争；周公时，人与兽争；孔子时，人与人争。

宋儒以气质言性，亦以义理言性。荀子“性恶”之“恶”，指质朴而言。孟子之言性善未确。

武后令武士读《孙子》十三篇，遂立太公为武庙，孔子为文庙。

宋之学，始自欧阳修。激扬气节，始范高平。古文亦开于欧阳修，乃韩昌黎再传弟子。昌黎学出于文中子，为古文之源流。有宋一代，言义理，折衷于闽、洛；言文章，折衷于庐陵。宋学皆兼禅学，即本于孟子之心学，亦圣人所有，未可厚非也。

南宋之学，朱、张、吕、陆四大家，别有永嘉之学，朱子集其大成，邵子之数学，本于“先天”，“先天”本于“九宫”，“九宫”即出于《易纬》，然究非经学正派。

朱子不治《春秋》，专言义理，于孔子之道得一半。

朱子疑《左传》，谓左丘明全无意理。其精力全在“四书”，而于《大学》、《中庸》为最，于《六经》不甚精通。

通元世皆是朱学。延祐六年，立科学，以“四书”立学官，直至今日。后汉气节，孔子治效之极也；晚明气节，朱子治效之极也。

凡人之学，皆学为圣人而已。圣人以孔子为一统。孔子之道，全在于“六经”。《春秋》为“六经”之管龠，故孔子之道莫备于《春秋》。

.....

《易经》阐明天道，兼及人道。《春秋》发明人道，兼及天道。

儒教，孔子特立。传道立教，皆谓之儒。

老之教曰道。墨之教曰侠。近耶教藉罗马之力，十二弟子传教，专在救人，创为天堂地狱之说。马虾默德，谓之回。其教极悍。释迦牟尼，谓之佛。其教专以虚无寂灭，亦藉天王之力。可知立教，皆藉国家之力。

史载以《史记》为最精，以其尊孔也。汉武未立学官之前，墨学最盛。太史公特尊孔子为世家，弟子立列传，另立荀、孟两派，凡后学皆入儒林，特有卓识。

史公之立《儒林传》，特为孔学未盛耳，后世之《儒林传》无谓也。至《宋史》更别为《道学传》，甚谬。《晋书·释老传》特立，亦有卓识。

.....

孔子之教，盛行于东汉，重气节，轻名利。

墨子之学，盛行于战国，任侠一派皆是。



老子之学，分为二派：清虚一派，杨朱之徒也，弊犹浅；刻薄一派，申、韩之徒也。其与儒教异处，在仁与暴，私与公。儒教最仁，老教最暴，故儒教专言德，老教专言力。儒教最公，老教最私。儒教专言民，老教专言国。言力言国，故重刑法，而战国之祸烈矣。清虚一派，盛行于晋，流于六朝，清谈黄老，高说元妙。刻薄一派，即刑也，流毒至今日，重君权、薄民命，以法绳人，故泰西言中国最残暴。

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也；商君次之；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

.....  
中国开于有夏，故统言华夏。观于汉武，威行匈奴，今北番呼中国人为汉人；唐太宗威行西域，故西番称呼中土为唐人，皆此意也。

地球自洪水以前一大劫。溯洪水之初，或为日所摄，或为他行星所触，人类几绝。禹之治洪水，不过因势利导。是时日力之摄息，地球之轨平，洪水必退，禹不过疏其未退者耳。洪水之劫，通地球皆同，可知不独中国为然。观西人所考俱断于洪水后，便知。

王安石为人，甚有气节，甚有毅力，甚有血性。当时创行新法，条理颇备，然其得力在《周官》，故流毒鲜，至害苍生，且以八股取士，沦落人才，皆刘歆所丰蔀，而谬妄至此。

.....  
上三千年，兽与兽争，中三千年，兽与人争，下三千年，人与人争。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

.....  
墨子非儒，不非“尊天”、“明鬼”，为其相同。墨子之学，其最精处在“兼爱”，“尚同”，其败绩处在“灭等威”“无差等”、“短裘薄葬”。儒家言命以范人心，设乐以和人志，墨氏皆非之。盖墨氏全是粗迹，毫无精义。

老氏之学，失诸虚；墨氏之学，失诸实。

墨子之道，与佛相类，而墨子行于身前，佛氏行于身后。墨子行之速，故败之速；佛氏行之渐，故延蔓至今日。佛氏无父母妻子，故全讲虚理；墨有父母妻子，故全讲实制。

墨子另有坚、白二派，观《大取》《小取》可知。侠派出于墨子，自汉景帝禁之，而墨学始衰。墨学战国时与孔子并，至汉，墨学衰。老学盛于魏、晋、六朝，盖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而不能行。

.....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阮籍当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乱法，君子如虱之处裸。晋世尚清谈，而王戎、王衍等为领袖，士大夫翕然宗之，晋于是亡矣。今日风俗之败坏，清谈之故也。顾亭林所谓古之清谈在老、庄，今之清谈在孔、孟，然至今孔、孟清谈并无之耳。今日清谈，流为佛学。

.....  
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孟子，传孔子心学者也。荀子，传孔子礼学者也。可知战国孟子、荀子为孔子二伯。后人皆知孟子为孔子学，独不知荀子为大儒，甚可慨也。孟子、荀子是孔子的派。

（选自《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 陈独秀 一八七九——一九四二

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大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成为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下遭受了惨重的损失。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党的总书记职务。此后他拒绝改正错误，并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反党小组，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逝。

陈独秀是我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痕迹的人物。他从早年积极宣传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封建思想文化，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成立中国共产党，最后堕落为反党的托派分子，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但是他早年那些叱咤风云，领时代之潮流的呐喊，仍不失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这里选编了四篇讲演，可以让读者领略其中个味。

《劳动者底觉悟》（1902年5月1日）一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社会上各项人只是做工的是台柱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演讲以“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设问为开篇，在回答了“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后，又深入诱导听众懂得劳动者觉悟的二种层次，用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第一步是讨饭吃，第二步是将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都拿在自己手中，“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全文简洁明了，通俗流畅。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年5月1日）提出了残存在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于当时共和新体互为矛盾的尖锐问题。自辛亥革命成功以来，共和政体取代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可是人们脑袋中的封建思想却不像推翻封建王朝那样一夜之间一扫而光，社会上各种非驴非马现象，令有识之士忧愤如焚。陈独秀在演讲中列举了三例：其一分明挂了共和招牌，但政府考官却以“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为题选拔人才；其二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疾呼尊孔；其三分明挂了共和招牌，然文人学士则依旧推崇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嘲弄通俗的国民文学。陈独秀一语破的：重在平等精神的民主共和思想和重在尊卑阶级的封建君主思想是万不能调和的，“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近代西洋教育》(1917年7月1日)和《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4月1日)是陈独秀论教育问题的两篇重要讲演。我们知道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早年熟读古贤遗文,后留学日本,又接触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因而在论及教育的讲演中能较为系统地阐述旧教育于新教育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的区别。在上述的两篇演讲中,他具有说服力地指出了旧教育的四大弊端,形象地说明了旧教育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学生教先生的泾渭之分。又由于陈独秀早期经历了一个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转变,因此这两篇演讲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思想嬗变的轨迹。前者不无“唯有外国月亮亮又圆”之嫌,后者则较为公允地论及了我国古代教育的种种可取之处。

###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远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有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

今日本会开讲演会，适遇国会纪念日，鄙人不觉发动一种感想，所以选择此题。鄙人感想非他，即现今之国会非君主国的国会，乃共和国的国会。方才李石曾先生演说《学术之进化》有云：“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鄙人以为李先生的理论，固然不错，但是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

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很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歿，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

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尝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

现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就是这种现象：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不知道辨的是什么上下？定的是什么民志？不知道共和国家何以有君？又不知道共和国民是如何小法？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礼尊君的精义。若是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久要做乱臣贼子。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若是一旦帝制恢复，蔡子民先生所说的“以美术代宗教”，李石曾先生所说的“近代学术之进化”，张溥泉先生所说的“新道德”，在政治上是“叛徒”，在学术上是“异端”，各种学问，都没有发展的余地，贵学会还有什么学问可讲呢？

## 近代西洋教育 ——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

今日之中国，各种事业败坏已极，承贵校诸君招来演说，鄙人心中想说的话极多，但是从何处说起呢？诸君毕业后，或当教习，或别入他校求学，大约不离教育界。现在就着教育事业，略说一二：

吾人提起“教育”二字，往往心中发生二种疑问：第一是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第二是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种疑问，就是西洋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人之善恶智愚，乃天性生成，教育无效的。但是此种偏见，多数学者，均不承认，以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

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

第二种疑问，乃是中国人普通见解，以为西洋各国不过此时国富兵强，至于文物制度，学问思想，未必事事都比中国优胜；简单说起来，就是不信服西洋文明驾乎中国之上，所以不信服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方才贵校校长张先生说：“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鄙人觉得张校长这话犹是对那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人说法。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小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秋桐先生方才说道：“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鄙人以为秋桐先生此言，可谓探本之论。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

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

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照此依样葫芦，便是成功的妙诀。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至于西洋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不像那被动主义灌输主义的教育，不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只管拚命教去，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Moria Montessori）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害人的事以外，无人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的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意。拼命的读那和学生毫无关系的历史（小学生决不懂得自己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毫无用处的外国文，以为这就是取法西洋的新教育了。哈哈！实在是坑死人也！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

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军（Boy scout）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不像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谭嗣同有言曰：“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如何能看得起我们可厌的中国人呢？

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样，乃是最重要的。诸君毕业后，或教育他人，或是自己教育自己，请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

## 新教育是什么？

这篇是本年1月2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扬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新青年》）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



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旧教育——科举 } 形式的不同  
新教育——学校 }

经史子集 } 教材种类的不同  
科 学 }

照上表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 } 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 } 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哪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未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教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

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像这三大人物尚且这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像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斯多德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像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

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

当知道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

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

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看起来：

（1）可见之于家庭教师底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

（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

（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

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像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说，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底病状病源才能开方，服药后底经过状况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象，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底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底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底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

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底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般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般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底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像日本底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 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历史 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明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地理 天天向小学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底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己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底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听见及他们家里房屋底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样？比教

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理科 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像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图画手工 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底成绩品，装潢学校底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底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底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底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的。因为手工图画底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教育；一切“填谱”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找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 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像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底两个特点：

- （一）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
- （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

（以上均选自《独秀文存》）

## 黄 兴

一八七四 一九一六

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是辛亥革命时与孙中山并称的民主革命家。早年曾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春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弘文学院，与杨毓麟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致力于学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说。1903年夏回国，与宋教仁等创建“华兴会”，被推为会长。1904年11月策划长沙起义，未成，经上海亡命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任庶务长。1907年至1908年，他先后在广西、云南一带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1909年，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他与赵声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即由香港赶赴武汉，指挥民军与清军作战。汉阳失陷后回到上海。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南北谈判后任南京留守。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黄兴主张武装讨袁，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美。1916年病逝于上海。

黄兴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在创建革命组织、宣传发动民众、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表过许多演说。

《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03年11月）是一篇陈述发动革命的总体战略的演说。虽然简短，但俯瞰天下，经纬九州，纵横捭阖，极具气魄。且立论峻劲而严谨。当时的中国正如黄兴所说，已是“炸药既实”，唯待引人之势。清王朝的腐朽、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阶级矛盾的尖锐对抗，已使中华民族陷于无以复加的深重灾难之中，非革命无以自救。于是各种会党纷纷组成，密谋发难；社会各阶层民众也“潜濡默化”着反清排满、实现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然而以中国之大，加之清王朝在北京的强大军力、北京民众的不觉醒，要像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在首都发难而后及全国，是不可能的。因而黄兴提出了一省首义、各地响应进而直捣北京的战略主张。这是极具远见卓识的。8年后辛亥革命的进程，大体上就是按黄兴的构想展开的。

《在武昌受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时的讲话》（1911年11月3日），是一篇大敌当前时的战斗动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惶恐万状，急派兵镇压。黄兴从香港赶赴武汉，在汉口失守后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了长达24天的汉阳保卫战，从而保卫了武昌，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为最终迎来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篇演说慷慨激昂，对民军将士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既讲明了战争形势的严峻，又昭示了民军为之奋斗的革命的目的；既一再言明军纪，以“斩首示众”惩戒临阵怯敌者，又号召众人同心协力，互相友爱，共达目的，表现出大义凛然的革命家的豪气，和刚柔兼济、恩威并用的大帅风范。

《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5日），是1912年9月15日下午作者在北京国民党本部于湖广会馆举行的欢迎孙中山、黄兴及贡桑诺布尔、陈其美等人的集会上的演说。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

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政权被袁世凯窃取。中国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制度，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此时黄兴大力主张“政党政治”，即政党内阁制度。他在1912年11月22日《致杨度电》中说：“政党内阁制度创始于英，各共和国均采用之。即君主立宪如日本，近亦倾向此制。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多数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恃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容易通过，不致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他认为：“欲民国现象日臻良好，非政党不为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支持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又支持宋教仁等将同盟会与其他党派（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在这篇演说中，他力陈政党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并从时势、政策、党之道德、党之责任心四个方面陈述了他的建党思想。

《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86），较为鲜明集中地表达了作者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作者又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其要义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指出：这种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具有中国小农经济烙印的一种社会理想。尽管这种思想有着显见的虚幻性、局限性，但作者在这篇演说中所表达的对受压迫大众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不平等的憎恶，对人人得享幸福、人人得受教育的美好社会的向往，仍显示出一位革命先驱的崇高情怀。

#### 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领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儒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入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据刘揆一：《黄兴传记》）

#### 在武昌受任民军战时 总司令时的讲话

---

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黄兴在长沙邀集留日归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陈天华、彭渊恂、周震麟等，举行秘密集会，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黄兴被举为会长。本文为黄兴被举为会长后的讲话。刘揆一追记。

兄弟才识本不胜任，既承不弃，亦不能不尽力。现今各省响应，大功已将告成，然我同胞亦不可以此自满。兄弟今日有三层意思勸我同胞：第一须努力。现在黄河铁桥已毁，敌兵已无归路，誓不能不拼死命以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敌即攻入我腹心矣。临战时倘不努力，后退者决意斩首示众。（众拍手）第二须服从。军队纪律，非服从不可。倘不服从，长官命令皆不能行，此种兵士万不能以之临战。以后，军界同胞须服从长官命令，无论如何危险，皆不得规避。（众拍手）第三须协同。自来成大事定大业者，必自己能同心协力。若自己各存意见，互相柄凿，无论有何种势力，皆不能成事。洪杨之败，其前车之鉴也。我同胞无论办事人及兵士，皆宜互相友爱，以期共达其目的。（众拍手）

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斯时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但是军人打仗，第一要服从命令，第二要同心协力。自今而后，对于作战，倘有不服从命令及临阵怯敌者，即以军法从事。尚望大众努力前途为要！

### 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

鄙人前在上海接电，知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极非常盼望。今日能与各党员相见，欢慰之情，欲言不尽。鄙人对于国民党未尽丝毫之力，蒙诸君推为理事，且感且惭。惟以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然政党之组织，则当因乎时势。中国今日虽已成立，而各国尚未正式承认，即不能算完全成立。夫国家既未完全成立，则国民党亦不得为完全成立。处今日危险时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政党之责任尤为重大。凡我党员，对于民国前途，应改革者，当如何改革；当恢复者，应如何恢复？方不失为政党。日本维新不过三十年，今为世界头等国，声势震于环球者，即本于政党之力。其初，政党亦是流派纷歧，以后逐渐合并，故有今日之势力。我辈今对于民国，亦当合无数小党以成为一大政党。政党之政策，尤须规其大者远者。如日本政党政策之所定，有在百年以后者，卒能进行者，确乎政党所定之政策不错也。其政党维新何？即所谓政友会是也。中华民国今日尚未完全成立，尤当有极大之政党以维持之。国民党于此时能大加扩张，成立一极大政党，使国家日趋于巩固，是则鄙人之所最希望者也。惟有此希望，则有当注意者二事。第一，重道德心。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然党德者，又不仅本党应有之，无论何党亦当保而有之也。第二，重责任心。此后民国建设，手续甚繁，凡我党员，均应共负责任，照党纲所定次序办法，人人尽力之所能为，以巩固中国，即以巩固政党，乃不失政党之本义。因以成立之大政党，对于内政，复极力研究，以求平靖。对于国际，极力辑睦，以求平和。人人均以此责任为天职，而又保守道德，则破坏与大建设之目的以达，能享真正共和之幸福。此非独本党一党之幸，实中华民国之幸，亦实世界各国之幸。鄙人所抱持之主义如是，诸君深明之。若能对于他党极力贡献斯旨，使各党同遵一轨，是尤鄙人所希望者。



## 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的演讲

今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激。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从前专制时代，社会上受种种压制之苦，兄弟很为之悲恻。大凡富贵贫贱不平之等级，皆由政治上所造的恶。今政治上既已革命，我们当将眼界看宽，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尚未十分发达，即如法、美二大共和国，社会上有资本家与劳动家之异。美洲之资本家，其一人之财产可敌全国之富。劳动家每因资本家之虐待，常有冲突之事，将来社会革命在所不免。兄弟愿诸君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盖一国之地有限，人民则生生不穷。土地为生财之源，应供一般人民受用。然财产倘为少数人所垄断，则必如欧美之资本家，实足为社会上之恶。必须财产归公，不使少数人垄断。财产归公之后，又必广设学校，使人民教育发达，致一般社会子弟，自幼至成人，吸纳一种高上知识于脑海，脱离依赖性质，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从此社会一切不平等之事铲除无遗，是我中华民国为世界社会革命之先导，而为各国社党之所欢迎也。兄弟于诸君有无穷之希望焉。

（以上演说均选自《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 秋瑾 一八七五——一九〇七

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革命家、作家。她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1898年前后，随夫到北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蹂躏国人的悲惨景象，从此思想发生剧变，决计献身革命。1904年，她赴日留学，先后参加实行共爱会、演说练习会等。次年初，她一度回国，加入光复会，7月再返回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评论员和浙江主盟人。她经常登坛讲演，鼓吹革命，又学习射击和制造炸药，组织日后进行武装斗争。1906年为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归国。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907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积极联络会党与军学各界，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同时在安徽和浙江两地起义。7月徐锡麟起义失败，清政府由此发觉皖浙联系，派军队包围大通学堂，13日秋瑾被捕，15日从容就义。

秋瑾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成长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活动家，为此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她为探求妇女独立解放，大胆地向庸俗昏昧的封建道德传统挑战。这里选编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演讲辞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1904年10月）是现存秋瑾三篇讲演中的一篇。1904年秋瑾在日本担任“演说练习会”会长，积极带领会员们进行演说实践，她自己以身作则，多次发表演讲。在这篇演讲中，秋瑾用平实而又感情丰富的语言，述说了中国妇女身受多重压迫的悲惨事实，批判了封建伦理种种强加给妇女的精神枷锁，同时也批评了妇女思想行动上的诸多不求上进的惰性。她大声疾呼：姐妹们“要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要自强自救，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作出妇女应有的贡献。

秋瑾的演讲词句短促，节奏快，逻辑强，语言浅显易懂，立意却深邃隽永，代表了晚清进步散文的发展方向。

###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不是有冤没处诉么？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

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犹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 一样看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作他的奴隶了。既作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提起来，我也觉得难过，诸位想想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呢，不要说“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进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他缠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钱作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作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的呢，就要帮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诸位晓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以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呢！

（选自《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 章太炎 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日甲午战争造成了民族的深重危机，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维新变法。“百日维新”夭折后，他东渡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腐败无能，使章太炎从维新梦中惊醒过来，他激烈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主张。开始树起反清旗帜，并剪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在狱中宣告“不认野蛮政府”，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并加入光复会，对革命充满信心。1906年出狱后为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08年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亲至警廷，慷慨陈词，不怕坐牢，高呼“革命无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最后以妥协告终，章太炎对此不满，加之早与同盟会产生裂痕，故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拥护袁世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后一度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9年他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躲进“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但当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祖国时，又出来谴责国民党右派“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年病逝。

章太炎从一个封建学者转变为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又“渐入颓唐”，鲜明地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和民族矛盾激化时的阶级属性。这里选编的两篇演说辞，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章太炎思想转变的轨迹。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年7月15日）是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员迎他赴日，主办《民报》时，在日本受到留学生欢迎会上的一次讲演。讲演从简述自己生平始，颇具寓意地谈到自己因有“逐满独立”思想被人视为“有神经病”，戏谑地嘲弄了那些因“富贵利禄补剂”，或因“艰难困苦的毒剂”，而治愈了的“神经病”。继而提出中国人要同仇敌忾完成历史使命，须注重两件事。其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其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在宗封一事上，章太炎力荐佛教，认为佛教的真谛在于提倡平等，而数千年雄踞中国思想界的儒教，其要害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在谈到国粹问题时，章太炎像是一位历数家珍的主顾，从语言文字到典章制度，再到人物事迹。这样既显示出章先生的广闻博识，又表现出他的一片爱国热忱。

《民国光复》（1933年10月10日）是章太炎思想发生变化后的一篇重要讲演。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位反清排满的斗士，章太炎是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这场革命的。从21年后的这篇演说辞中，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但是革命成功后的21年的今天，中华大地并没有出现革命者为之献身的民主共和大业，章太炎据此正确地探讨了革命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和革命的两大目标，却又错误地得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结论，这也为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渐入颓唐”找到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章太炎演讲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是溶学识与胆识为一炉，力排利弊，从这里所选编的两篇演说辞中我们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今日承诸君高谊，开会欢迎，实在愧不克当；况且自顾生平，并没有一长可恃，愈觉惭愧。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着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两个人。其中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夜半天明，本不是那只鹤、那只鸡所能办得到的，但是得气之先，一声胶胶喔喔的高啼，叫人起来做事，也不是可有可无。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做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琐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据今日宗教家论定，是有脏燥病的。像我汉人，明朝熊廷弼的兵略，古来无二，然而看他《气性传》说，熊廷弼剪截是个疯子/PS /PS>。近代左宗棠的为人，保护满奴，残杀同类，原是不足道的。但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种种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毕士马克，曾经在旅馆里头，叫唤堂官，没有答应，便就开起枪来，这是何等性情呢？仔细看来，那六人才典功业，都是神经病里流出来的。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

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瞽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近来像宾丹、斯宾塞尔那一流人崇拜功利，看得宗教都是漠然。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藟子，怎能团得成面？欧、美各国的宗教，只奉耶稣基督，虽是极其下劣，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那伽得《社会学》中，已把斯宾塞尔的话，驳辩一过。只是我们中国的宗教，应该用哪一件？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就是各种宗教，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惟有孔教，还算干净，但他也有极坏的。因为孔子当时，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一班平民，是没有官做的，孔子心里，要与贵族竞争，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从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但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春秋》上虽有“非世卿”的话，只是口诛笔伐，并不敢实行的，所以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就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一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真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那继起的日耳曼种，本是野蛮贱族，得些基督教的道德，把那强暴好杀的心，逐渐化去，就能日进文明，这不是明白的证据么？今日的中国，虽不能与罗马并称，却还可称伯仲，断不是初起的日耳曼种可相比例。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再就理论上说，他那谬妄可笑，

不合哲学之处，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所以也无庸议。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因为净土一宗，最是愚夫愚妇所尊信的。他所求的，只是现在的康乐，子孙的福泽。以前崇拜科名的人，又将那最混账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与净土合为一气，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种种可笑可丑的事，内典所没有说的，都一概附会进去。所以信佛教的，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却还有许多哲理，是诸公见不到的。所以今日德人，崇拜佛教，就是为此。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

有的说中国佛教，已经行了二千年，为甚没有效果？这是有一要点。大概各教可以分为三项：一是多神教，二是一神教，三是无神教。也如政体分为三项：一是贵族政体，二是君主政体，三是共和政体。必要经过君主政体的阶级，方得渐入共和政体；若从这贵族政体，一时变成共和政体，那共和政体必带种种贵族的杂质。必要经过一神教的阶级，方得渐入无神教，若从这多神教一时变成无神教，那无神教必带种种多神教的杂质。中国古代的道教，这就是多神教。后来佛教进来，这就是无神教。中间未经一神教的阶级，以致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化为一。就是刚才所说的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等类，是袁了凡、彭尺木、罗台山诸人所主张的。一般社会，没有一人不堕这坑中，所以佛教并无效果。如今基督教来，崇拜一神，惜摧陷廓清的力，把多神教已经打破，所以再行佛教，必有效果可见的了。

有的说印度人最信佛教，为甚亡国？这又是一要点。因为印度所有，只是宗教，更没什么政治法律。这部《摩拏法典》，就是婆罗门所撰定。从来没有政治法律的国，任用何教，总是亡国。这咎不在佛教，在无政治法律。我中国已有政治法律，再不会像印度一样。若不肯信，请看日本可不是崇信佛教的国么？可像那印度一样亡国么？

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

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

先说语言文字。因为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著在他国，引申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一个天字。所以有《说文》、《尔雅》、《释名》等书，说那转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国的话，处处不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声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号不同的。所以《尔雅》以外，更有《方言》，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独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没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又且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什么国土的人，必看什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个〔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什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什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什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什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哪项须要改良？哪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两宋至今，哪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



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直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一项是科场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搁〔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况且那好的么？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比那欧洲、印度，或者难有定论；比那日本的物茂卿、太宰纯辈，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太宰纯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的人。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诸君今日，已有余裕；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兄弟是要诸君代劳的了。

## 民国光复

所谓辛亥革命者，其主义有二：一、排斥满洲；二、改革政治。前者已达目的，后者至今未成。有功于光复之役者，今存在尚夥，特众口纷纷，归

功于谁，亦未能定也。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野户牖申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全书》之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上为能然耶？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及后与梁启超等相处，康、梁主保国、革命同举，并谓“保中国不保大清”。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庚子拳乱，八国联军入北京，唐才常辈藉勤王名，主张革命，发表宣言，粤人容闳手笔也，严复译成汉文，大意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云戴光绪皇帝为主。余不然其说。时康、梁之徒已渐变原有革命主张，而趋重保皇，遣人询余意见，余力言奉戴光绪为非，因剪发自誓。后因《驳康有为书》及序川人邹容《革命军》被捕，与邹容入上海狱。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声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至辛亥革命之主谋，则湘人焦达峰也。达峰者，共进会会员，初与湖北日知、文学等会议起事，焦建议自湘首倡，鄂响应之。并曰：“若湘起后，鄂于十日内不响应，则湘将以鄂为敌人。”适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等谋炸事露，总督瑞澂大索鄂中党人，于是鄂不得不先湘发难，占据武昌，举黎元洪为都督。清廷命黄忠浩发湘省防军袭武昌，势甚急；焦达峰起，袭取长沙，杀黄忠浩，革命军势益盛。未数日，焦氏被梅馨所杀，传为谭延闿主使，其事今犹未明也。时共进会突然起事，同盟会首领俱未知之，孙在英，黄在香港，即与谋之宋教仁、谭人凤，亦谓须训练三年方可从事，未料及起事如此之速。共进会由张伯祥组成，其成立在同盟会后，起事则先之。初，黄兴在大森，尝劝达峰并入同盟会，达峰以同盟会舒行阔步，未果。

革命之成功原因有二：一、远因，排满思想潜伏已久；二、近因，党人鼓吹甚力。虽共进会有倡义之功，若无同盟会之鼓吹革命，布置各省革命基础，则绝无如是之大影响。当袁世凯命冯国璋攻下汉口，不敢复取武昌者，以革命军已遍满南方，不可复抑也。若只湘、鄂二省，袁何爱而不攻耶？故同盟会有倡始布置之功，而共进会有实行发难之功。姑以奕喻，布全局与白黑相杀，在奕中有相等之重要。布局，同盟会也；相杀，共进会也。今日咸以实行之功归诸一二人，虚妄已甚，其去魏收史不远矣。

武昌立政府后，黎元洪为首，同盟会则以孙文为首，国之元首有相争之局，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权力，乃举孙大总统，黎副之，此固不得不然之势，而事前筹备实未尝周密也。试观袁世凯称帝，同盟党员附和者尚有其人；张勋复辟，未有一人附和者，虽今伪国成立，党员附和者亦绝无其人，皆足徵革命之起实为排满也。

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以上皆论排满之事。

今论政治之改革。政治至今只有纷乱而无改良，盖革命党人忠实者固多，而好勇疾贫行险侥幸者亦不少，其于政治往往隔膜。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谓墨敕内降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明之内阁大学士，实即唐之翰林学士，只是天子秘书，故不能副署诏令。清亦沿明制，然如军机大臣奉上谕，内阁奉旨，虽不以人署名，而以机关署名也，则未尝无副署之意。下此则州县决狱，典吏亦须副署，此何足矜为奇创耶？又两院议可否，唐之门下省给事中，即议诏令可否者也，有封还、涂归、批敕诸名，宋、明因之，清则将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无封还诏令之权，仅能分发诏令与各衙门，所谓邸抄者也。唐给事中四人，明设六科，亦只数十人，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

上述诸事，欲政治之澄清，岂可得乎？孙谓革命尚未成功，信然。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黄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其后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吴景濂等五团体合组国民党，竟留十二年曹锟贿选之丑，可见其政治上之节操，与其维持共和之能力矣。

（本文象章氏在 1933 年 10 月 10 日的演讲词，李希泌笔记，见《章太炎先生讲演录》，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

（以上均引自《章太炎政治选集》中华书局 77 年版）

## 蔡 锷

一八八二——一九一六

湖南邵阳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898年，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从师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受维新变法思想，并参加维新变法派组织的自立军，准备拥护光绪皇帝当选而起兵“勤王”，起义失败后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懂得救亡图存，必须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此后立志习武，以图报国。1904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等省训练新军，为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积极配合，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袁世凯担心他拥兵自重，下令调他进北京，暗加监视。由于袁世凯违反民意，企图恢复帝制废除共和，于是蔡锷和梁启超策划反袁，于1915年底在云南组织救国军起兵反袁，在讨袁斗争中，蔡锷作为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坚决果断，富有韬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狠狠打击了袁世凯的部队。云南独立后不久，贵州、广东、浙江等地也纷纷宣布独立，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蔡锷任四川省督军及省长，因病赴日本就医，不幸逝世。

蔡锷一生经历了从拥护维新变法到致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道路，其思想发展颇为曲折，充满矛盾。但是他成功地领导了辛亥云南起义，发动和指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声望的民主革命家和军事家，从这里选编的三遍演讲辞中，我们可窥见一斑。

《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年5月）是他在当时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论会、共和统一党三个政治组织合为一体后的一次讲演。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宣布了共和新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但是革命成功后的中华大地，“海内俶扰，民生穷蹙，……人重私图，党见纷歧”，“内政之纷纭，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蔡锷为此十分忧虑，他知道惟有“联结同志，标帜政纲”，才能“挽回国难，奠安民生”，于是他致力于将诸政党联合起来，以求“国利民福”之大业，在他的奔波下，1912年4月，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论会和共和统一党合三为一。蔡锷是一位具有实干精神的革命家，他认为新组建的党“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期远大”，其宗旨应是“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因此他在讲演辞中，他对新党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勿请鹜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轹无秩序之风”；其二务期新党内部之巩固，对于党员，“与其鹜多数之虚名，不如定格稍严”，对那些“思借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借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者”，务必排斥于党外，这篇演讲立论鲜明，旨远趣高，令人耳目一新。

《在蒙自军政警各界欢迎会上的6演讲》（1912年8月）和《在蒙自绅商学三界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8月）是辛亥云南光复后，蔡锷任云南军都督，8月南巡时，在云南各界欢迎会上的两篇重要讲演。1911年10月蔡锷领导的起义部队光复云南后，在新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受到云南各界的一致拥护。面对蒙自各界的热烈欢迎，蔡锷一方面对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又冷静地指出“自政府统一后，

南北隔阂，意见未消，政党勃兴，竞争剧烈。内则兵变频闻，外则风云日亟。”因此他号召大家要“永矢忠贞，和衷共济”、并以“洪、杨交哄，大业以坠，廉、蔣相下，秦兵不前”为历史教训，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而日后的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代之而起的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混战与割据，造成了中国人民更深重的苦难，则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 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

清廷失政，虑人民之起而干预也，乃百端钳制，使不得伸。人民亦久困于专制压力之下，不复敢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于是，人民参政思想愈薄，则爱国之心愈微。险象环生，危症百出。仁人志士，不忍以数千年之祖国与亿万姓之同胞，沦于异族，坐以待毙也，  
势，奔走呼号，以求一当

。去岁震撼天地之大革命出，今革命告成，共和成立矣。第半年以来，海内俶扰，民生穷蹙。军队为莠民麇集之藪，兵器将窳，南北一辙，焚劫叛变之惨剧，层出叠见。加以人重私图，党见纷歧，省界加严，争权夺利，置国家问题于不顾，而内政之纷坛，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识者怒焉忧之，亟思联结同志，标帜政纲，以收声应气求之效，用以挽回国难，奠安民生。近月以来，各省政治结社，日见发达，至有数十起之多。姑无论其主义如何，方针是否稳健，揆其初意，要皆以国利民福为宗旨。海内健者，果能归纳吸收，使之蔚为中华之二三大政党，未始非民国前途之福。鄙人月前曾致（电）黎、熊、谭、张诸公，请其将民社、联合会合而为一，而免纷歧。嗣接函电，深表赞同；惟联合一层，此时尚非其时。并经派萧君前赴腹省联络一切，现已得多数同志之赞成，于四月朔日在上海开本党成立大会，合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论会、共和统一党三者而为一，名曰统一共和党。溯本党之起因，系根据于东京留学同志之旧团体；归国以来，复分途联络，同志极众。首创之际，取格甚严，非学识品性为同人所共许者，拒不收引。故党基极固，而分子极为健全。现已组为政党，尤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期远大。以愚所见：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亡国之痛，远则如犹太、波兰、印度、埃及，近则如安南、朝鲜，诸君当能知之，抑为我万众同胞所剑心怵目者。而弱国之奇耻特寻，若况惨状，即鄙人与在座诸君，或多身历其境，或受间接之影响。即四万万同胞，何莫不然。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故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力拥护人权之保障。故吾党主义，勿徒骛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轹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近日平等自由之义每多误解）。苟国家能济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分）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之不伸。默察世界潮流，国家主义之膨胀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即共和先进国如美国者，早已变易其夙昔所抱之孟罗主义，孜孜惟对外之是谋矣。在满清末覆以前，国家维持之责任，尚可委卸于政府。民国既成立以从〔后〕，则此项责任应分负于四万万同胞个人之双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在今日尤为适切。

其次，在务期本党内部之巩固。欲图党事之发达，政见之贯澈〔彻〕，须内部巩固，乃能有济；欲求内部之巩固，端在党内分子之健全。故本党党

员，与其骛多数之虚名，广为征引，致涉于滥，不如定格稍严。取具有常识，足以为齐民之表率者而结合之，庶足以举国利民福之实而罔滋流弊，即党事亦不患无含弘光大之期矣。政党者，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之主义而进行者也。故其目的，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个人之利益不计焉。其有思借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借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者，是大误也。共和国民，人人生息于自由平等之域，优游于法律围范之中，尊重人格，严守秩序，是其天职，不能有一毫私意夹杂于中。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尤不可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此则私心所以自励，而期盼〔盼〕于吾党诸君者也。

最后，尚有一言陈告于诸君之前者：锷本武人，谬预政事，今复承同人敦劝，预闻党务，才轻德薄，易克胜任。而军人投身政党，流弊滋多。鄙人现在虽未直接统兵，第部曲因此而生误解，以为隶戎籍者均得躐足党社，与闻政治，则贻误无穷。此中理由，前已陈述于同人之前。君等乃以值此政党萌芽之候，非鄙人等出而提倡赞助，难观厥成而言，是以靦然任之。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是为至幸。

（据昆明《华南新报》1912年5月6日）

### 在蒙自军政警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

鄙人今日辱承军、政、警三界欢迎，并进以祝词，奖饰溢量。自问无以副诸君之厚望，殊增惶悚。鄙人此次巡阅南防，不能不经过蒙自一次者，诚以今日之蒙自，非前此闭关时代之蒙自所可同日语。考诸蒙自之隶版图，始于元宪宗七年立蒙自千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县，隶临安路。唐、宋以前尚荒裔无稽。自前清辟为商埠，株守一隅之蒙自，一变而为商业竞争之蒙自。自滇越铁道告成，商业竞争之蒙自，再进而为国防重要之蒙自。故蒙自之安危，直接为一省之关系，间接则一国之关系也。去岁反正，虽小有变动，如天之福，不日敕平，尚未贻误大局。此皆军、政、警竭力弹压之功，用能保卫安宁，维持秩序。此后内政、外交，尤当力求进步，勿仅以回复原状为能事已毕。此则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也。抑更有进者：吾辈之实行革命，宁牺牲亿万之生命、财产而不顾者，原为改良腐败之政府计，故破坏为建设而破坏也。破坏而不能建设，不第不为功之首，且为罪之魁矣。虽然，破坏固易言之，建设则难言矣。譬之改造房宇，焚毁推倒，一举手可以奏功；至大启尔宇，始而庀木，继而鸠工，非惨澹经营，永无大厦落成之日。溯自武汉倡议，以至南北政府统一之日，相距仅数阅月，同时达政治、种族革命之两目的。视美之血战六年，法之流血八十年所仅得之者，吾国则以最短之时间，最廉之代价购之，此足为破坏最易之征。德意志联邦毕士麦竭毕生之心力，始克统一完成。加富尔之于意大利，其力任巨艰，与毕士麦同，而迭经波折，不获永其天年，至今国势犹未达圆满之域。即以吾国而论，自政府统一而后，南北隔阂，意见未消，政党勃兴，竞争剧烈。内则兵变频闻，外则风云日亟。内阁迭更，国务院如暂住之大旅馆；舆论未张，参议院如新制之留声器。此皆民国前途之悲观，亦建设维艰之一般也。然吾辈既任破坏于前，自当力任建设于后。进行之法，惟永矢忠贞，和衷共济而已。夫共和以人民为主体，譬之一家之主人翁也。为公家服务者，则为公仆。仆从而负主人之委托，不

克称职，是为不忠。从而家道衰微，不陷主人翁于流离失所之惨境不止，仆之罪不胜诛矣。公仆之对于国家，何以异是？和衷共济，为共和国之真精神，譬之肩舆然，前者唱许，后者唱邪，则进步自促，无中途竭蹶之虞。廉、蔣相下，则秦兵不前；洪、杨交哄，而大业以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区区之私，愿与诸君共勉之！

### 在蒙自绅商学三界欢迎会上的演讲

今日承绅、商、学三界欢迎，使鄙人得与父老子弟相见于一堂，不可无一言以答诸君之雅意，藉以展鄙人之愚忱。诸君亦知吾辈倡言改革，必推倒专制，建设共和，其目的之所在乎？缘专制国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故挥霍财产，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恣睢暴戾，听其所为，人民不得而干涉之、抵抗之。以此，人民之无国家观念，理乱置之不闻。而对国家负责任者，厥唯君主一人。下此仅有少数臣工，仰其鼻息，代君主而负担之。此种国家，在锁港时代，犹堪闭关自雄。一旦与欧美文明国遇，如摧枯拉朽，岌岌不能终日。前清晚季所以削弱而不能自存者，职是故也。共和国则不然，人民即一国之主体，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选任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即对于国家负无穷之义务，担无限之责任。上下一体，万众一心，乃能共济艰难，匡扶大局。美、法今日所以擅雄世界，职此之由。吾国自去秋武汉倡义以来，不数月而掀翻专制，得与美、法列强相见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何幸如之！他日制定宪法，自当采其所长，弃其所短，以收折衷尽善之益。至于内力之充实，须视人民自治之能力以为衡。如美之中央政府，仅总揽外交、军政、用人诸大权，即总统之权限亦仅在乎此。各州之分政府，号有特权，其实不过将关于集权之事，间接递之中央，其中坚而饶有势力者，则最下级之自治团体也。如教育、实业、交通以及卫生、慈善诸要政，皆地方自治团体负完全责任，而无事中央及各州分政府之过问，稍闻国政者所共知也。自治发达，则内力自然充实，然后可言对外。一旦国际有伤平和，取决武力，亦非难事。况事事展布于平日，即可以保武装之平和。如滇地多山，富于矿产，多方开采，货不弃地，外人自无从垂涎。交通不便，能广兴路政，使铁道、电车、马路次第发达，即可以戢战列强铁道政策之野心，而已失之路矿权亦可徐图收回，作亡羊补牢之计。再进而推广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改良警察，以保地方之安宁。岂第自治之能事已毕，即折冲御侮之宏漠，具于是矣。虽逼处强邻，夫何畏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又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明训昭然，可深长思，愿与诸君共勉之！

（以上均选自《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宋教仁

一八八二——一九一三

湖南桃源人，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1904年12月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划发动起义，事机泄露后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后被推为湖南分会副会长。1907年受派在东北创同盟会辽东支部。1910年在上海主持《民立报》，次年与谭人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干事，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临时政府北迁后，到北京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回到上海，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政团，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以图限制袁世凯专权，引起袁的忌恨。1913年3月从上海北上时，被袁派人刺死于上海车站。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前后作过不少演说。

《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会演说辞》（1912年5月15日），是一篇情词痛切的纪念演说。1910年，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并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各地同盟会员纷纷潜入广州。又从香港选派八百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至广州，陆续设立秘密机关三十余处。1911年4月8日，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击毙清将军孚琦，被捕牺牲。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迫使起义计划作了改变。在力量尚未集中而又不得不举事的情况下，黄兴率敢死队攻入总督衙门，转攻督练公所，遇清军截击。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牺牲一百多人，被迫退却。后广州人民收敛革命志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在这篇演说中，作者回顾了起义的经过，言辞之间，流露出对起义中牺牲的同志“至死气不馁”的英勇精神的赞叹和痛悼之情。后半部分，作者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具体原因，并指出，起义虽遭失败，但它对于激励人们的革命精神，唤起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反动的满清统治，却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为辛亥革命之先声。

《辛亥革命周年纪念会演说辞》（1912年10月10日）也是一篇纪念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作者回顾了自1902年以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斗争，讲述了广州之役和武昌起义、建立民国的经过。作者把辛亥革命纪念日与美国7月4日的独立日、法国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相并举，十分恰切地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然而，作者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却作出了过于简单、乐观的估计，以为美国独立战争历时13年，法国革命中巴黎人民三度起义历时4年，而辛亥革命仅在一年之间便建立了民国，其“所得效果”在三五年之内就可与欧美比肩。这说明作者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后的历史事实否定了他的美好愿望，连他自己也成为篡权窃国、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屠刀下的牺牲者。

《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1月8日）是一篇政治鼓动演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宋教仁深感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为此他辞去了北京临时政府中的农村总长职务，回到上海积极活动，促成了同盟会之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十分得意于国民党的组成。他在给海外同盟会会员的信中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但国民党虽较同盟会规模宏大，革命精神却多有削弱，它取消或改变了原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男女平等”、“力谋国际平等”等革命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同盟会原来的会员中很多人变成了官僚政客；宋教仁为扩大国民党声势，又把一批社会上的官僚政客兼收并包于国民党内，国民党的内部成分因而更为纷杂了，以至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都视之为“狐群狗党”而拒不加入。尽管如此，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初衷毕竟是为了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以达到建立责任内阁、最终把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其用心可谓良苦。在这篇演说中，他向国民党湖南支部的党员们说明了民国虽已成立，但“疮毒犹存”、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说明了完善政府、建立政党内阁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而鼓动党员们以“整理内政”为己任，当仁不让，努力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争取胜利，以求建立一个“国民党政府”。

### 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最初，同志计划进行方法各有不同。或主中央入手，如法、葡是，但在我国颇不易为；或主从地方入手，各处同时大举，是亦恐难以做到；最后决定从边远入手。故从前云、贵、广西诸义举，即缘此义而起，因复有去岁广州一役。

先是，黄克强，赵伯先等，立实行机关于香港，内分数部，或掌运输，或主联络，或谋通财与执文牒，谋甚秘密。孙中山先生、黄君克强先后到南洋美洲一带，募军饷四十余万，兼购最利枪枝。广州举义时，枪未运到，而各处同志来者益众，形迹颇露，卫队及警兵渐相缉探，遂决用手枪炸弹，黄君先入城。原拟黄自攻督署，而以赵君攻水师营，其余分三支：一攻旗军；一守南门；一迎新军，入城事成后，则以赵君出江西，黄君入湖南，再分道各省，鼓动响应。此部署大概也。26日，机关部得黄电，言事洩矣，请改期27日。又得黄电，催众往，遂于28日出发，到者仅一部分人，而事已一发难收矣。29日余始到，业知失败，未容展我手眼，爰探得举事时，黄君初以事洩，欲解散，多数人反对，遂仓卒举发。黄君所带无百人，又大半留学生，未习战伐。攻督署时，击死卫队甚多，同志死者亦不少。继而黄君直入后堂，见不惟无人，并器具亦无之，乃知张鸣岐得信最早，已携眷潜逃，因率队外出。而各处陆军盆集，黄又击毙数人，而我之队伍已被陆军冲散，黄乃易服出城。其余未出城者，曝血巷战，至死气不馁。黄只身逃至一买卖铺中，伏数日始脱于难。至初四日，入城调查，死尸计72人。黄虽未死，受伤颇剧，余则或伤或逃，尤不可胜纪。噫，亦惨矣！

计此事失败原因有三：一、侦探李某充运军火，为平日党中最得力人，不知实乃侦探，后查明，处以死刑，枪毙之香港；二、从戎者皆文弱书生，素无武力；三、起事仓猝，新军未能响应，诸同志亦多奔赴不及。有此三原因，所以失败。

但平心思之，此事究不得以为失败，盖失败一时而收效甚远也。何则？

有此一番变动，遂生出三种观念：一、此番死难诸人，如此猛烈，可使一般人知同盟会非徒空谈，实有牺牲性命的精神；二、此番死义，多属青年，易激起人痛惜之心，而生倾向革命之热诚；三、政府对于此举毫无悔心，人愈恨旧政府而争欲推翻之。有此种种，故武昌一起，天下从风，岂偶然哉？虽谓诸烈士已成有圆满无上之功，未为不可也。愿诸君作事勿看眼前成败，要看后来结果，最远之成败，天下事无不可为矣云云。

### 辛亥革命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今日为中华革命第一次纪念会之第一日，承诸君推鄙人才薄重任，深恐不能胜任。

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革命思想为我中华民族心理中所固有，惟其发动在十年以前，先由中山先生之于广东，次由克强先生与鄙人之于湖南，然皆遭失败，于是于东京发起同盟会，创《民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数年以来，继继绳绳，盖如一日，故能使今日思想普及全国，一举手而成共和之大业。然当发动之初，亦曾几遭失败，后竟苦心研究，规定计划三条：第一由中央入手，即于政府所在地从事运动；第二由南方重要省会入手，即于扬子江流域各重要地点，联络军警各界，各省同时大举；第三由边地入手，盖边地为人所不注意处，从事革命，布置较易，由渐而来，未为不可。三条之中，第一条最难，第三条最易，故实行之始，取其易者，此去年广州一役所由来也。

按广州之役，自革命以来，实力最可痛心。死亡诸君皆革命原动，所以如此者，以屡次革命，利用军队，而军队中人屡次泄漏消息，屡遭失败，故此不复再用军队，当事者尽为文弱书生，革命原动。先时计划定四月初一为起事之期，于香港先设立机关，更由中山先生筹得经费四十万。其内部组织推克强先生为总理，赵声、姚雨平、鄙人等诸同志佐之，更合四川、福建、安徽、江浙诸省精锐，拟一举而下广州。自正月间先事预备，购枪械，招同志，运器具，其种种困难情形，不可言喻；香港英政府亦防范甚严。其后有同志喻云纪君，能自造炸弹，且远出外国之上，故全军供用率多仰给。于是更有姚君雨平先往省城，预为布置一切。即约定期四月一号起事，岂知至三月二十七，忽由克强先生来电，劝同志不必再来，并改期重举。鄙人等在香港，闻之深为骇异。次日克强先生又来电，促诸同志速赴广州，于是诸同志之在香港者，连夜出发。当时共分数起，有自早出发者，亦有过后一二时出发者。鄙人则在下午离港，迄次晨抵广州，探悉城门已闭，岸上守兵无数，则知事已败，心中甚为焦愤。后探悉同志死者甚少，心为稍慰。晚更悉惟有一船自广州出发，于是偕数同志同至该舟。比至，则满舟皆同志，然相见均默不发一言。其后守兵更来舟中搜，同志之军藏暗器者，俱为捕去，救援不及，饮泣而已。诸同志既由虎口索生，遂各述所遇，始悉当时以赵君声未至，总司令由克强先生代摄，一切计划遂不克周顾。当时由克强先生率诸同志攻总督衙门，先时间该处守兵已经说通，岂知至则出而抵拒。时同志出为陈说，然卒无效，遂两相攻击，一方更由克强先生率数同志，直入上房索粤督。詎料粤督已数日前闻信移住他处，同志等遂出。时水巡兵已遍满街市，

同志多自戕，能于此船上相见而庆更生者，已非初料之所及矣。是役也，有可痛之一事，即失败之后一日，城中有一米店，匿数同志，为捕兵侦知，攻击数时，兵不敢近，后官兵将米店付之一炬，诸同志遂无一得生。此广州失败之大略情形也。

吾等计划第三箸既归失败，于是进一步策第二箸，规划湖北，更由陈君英士组织机关于上海，鄙人则从事湖南。时陕西亦有同志已组织完善，特派代表来会，协商一切，遂定乘四川铁路风潮激烈之秋，一举起义，规定湖北。时机关部设在汉口，相期以九月一号起义，詎知迄八月十九而机谋又泄，于是匆匆起事，一举而光复武昌，再举而复汉阳、汉口。克强先生更由香港赶至湖北，与清军血战。时则陈君英士光复上海，程君雪楼反正苏州。九月十八，南京第九镇统制徐君固卿攻击石城，不利，更进而合江浙省之各师联军，推徐君为联军总司令，于是再攻南京，张勋败走。时停战之约既成，议和之师南下，后更得北方响应，诸将要求退位，共和之诏遂颁，民国于以成立。

溯武昌起义以来，未及一年，而有今日者，岂非我五族同胞倾向共和，赞成民主之所致欤？夫吾等计划，前后计算均未实行，而其最后效果，竟得于一年之间达到目的，视美之十三年，法之三革命，不亦较胜十倍？则将来大势所趋，三年五年之后，其所得效果，有不能驾欧掣美者，吾不信也。

#### 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

今日承本党诸君欢迎，鄙人实不敢当。惟党员须常常相见，以便交换知识，故兄弟此次回乡，极欲与诸君接洽，今得聚此，甚为欣幸。顷部长谓今日建设未能完善，实非革命初心，兄弟极以为然。今且将本党责任与国家关系略为诸君述之。

现在民国未经各国承认，于国际上非可谓之成立，然其原因，则内部未能整理之故也。国民党为同盟会所改组。同盟会成立于乙巳年，时在东京。黄克强先生主张实行，故有广东、云南等处之起事；然因财政困难，屡次失败。自从广东兵变之后，渐知新军可用，故广州之役欲联新军。然仓卒之间，死事者多，咸谓当改变方法，乃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谭君石屏、陈君英士及兄弟主持其事。鉴于前此之失败，乃共筹三策：一为中央革命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此为上策，然同志都在南方，北京无从着手，此非可易言者；一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此为中策，然此等大举，布置不易；一在边省起事，徐图中原，然前此用之失败，斯为下策。三策之中，将谁适从？则新军如可为用，财政有人接济，中策自属可行。故阴历去岁筹款南洋，运动鄂军，遂能集事。恐满政府之倾北兵以至，则在山西布置，以牵掣之，守武胜关、断黄河铁桥，以梗塞之；恐势力单薄，则南联湘省，东联宁军，以左右之。原拟预完善，方在武昌发难，因黄先生病在香港，乃派谭先生与兄弟往鄂。适鄂省炸弹轰裂，事机败露，不得已而仓卒举事。时孙武炸伤，居正乃推黎副总统主持一切。然因布置未善，北军卷地而来，遂至屡挫。幸湖南首先响应，得为后援。然汉阳之失，外人讥诮，心已北倾。南京光复之后，民军始振，顾其时出师援应者，仅有湘粤两省。幸袁总统深明时局，方能刻期统一。

---

本文录自 1913 年 1 月 9 日《长沙日报》《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今民国虽成立，然破坏未极，人心上之旧习未能乘势革除，譬犹疮毒尚存，遽投以生肌之药，必不能全愈也。现在外交、内政均无可言。以言内政，则第一财政困难，拟借外债，财政又被监督。所有一切行政，在湖南尚好，社会安宁，军队亦已退伍；他省则军队犹然林立，据陆军部调查，较前清时增至七八倍。此等军队不独难以征蒙，且多有为害地方者。又民间产业凋敝，出口货少。种种现象，言不能尽，如此而欲富强，不綦难乎？以言外交，则俄蒙协约之问题不能解决，将无宁日。然其原因实因内政不能进行，以致险象环生，群思剖割。

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国民党之党纲，第一，统一政治。今当谋国家统一，毋使外人讥为十八国。第二，地方自治。第三，种族同化。今五族内程度文野不齐，库伦独立实由于此，欲求开化，非国民党不为功。第四，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第五，维持国际和平。方今民国初立，创痍未瘳，以言剧战，实非易事，惟俄蒙问题，则不得不以强硬手段对付之。总之，今之要务，在整理内政，为党员者均当负责。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划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诸君者也。

（以上演说均选自《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 蔡元培

一八六八——一九四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与章太炎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先后主编《俄国警闻》和《警钟日报》，反对沙俄入侵我国，又与陶成章等人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后出国倡办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仍宣传“科学救国”、“教育独立”的思想，发起组织中国教育改进社，并担任董事。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抗日战争中，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提出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等颇有影响的思想见解。这里选载的两篇演讲一是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辞，一是他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两篇演说辞都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讲演的，这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不少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都在这里就读过。当任这所大学校长一职，在一定意义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蔡元培先生深感责任重大。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一文中，他对学员提出了三项要求：抱定宏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蔡元培先生要求“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每位学员须抱定一个宗旨：为求学而来，否则将来“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针对五四前夕中国社会风气的颓败，蔡先生谆谆告诫学员要“束身自爱”，“力矫颓俗”，并把“国家之兴替”与“风俗之厚薄”联系起来，让学员从更高一个层次去理解德行严谨的重要意义。蔡先生还要求学员“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并用自己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为例子，阐明互相亲爱是人们交际的必需。蔡先生对大学学员的这三项要求，时至今日，仍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前后中国文坛曾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孰优孰劣的论争。这场论争的表现形式虽然是采用何种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形式问题，而实质是复古守旧与变革维新两种思潮的较量。蔡元培先生在这场论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一边。

《国文之将来》（1917年）这篇演讲中开篇就提出：“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蔡先生在这里显示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卓越见识与过人的胆识。接着蔡先生从欧洲十六世纪以前拉丁文的由盛而衰，日本维新初年废汉字、兴言文一致的日文，到我国禅宗语录、佛经翻译都采用白话文的历史经验，说明了“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

人的意思，是间接的，”从而得出“由间接的趋向直接的，是无可抵抗的”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演讲风格以清晰明快见长。《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开门见山就讲“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国文之将来》亦直接亮出“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观点。继而娓娓道来，或旁征，或博引、令听众心无旁骛，惟有顺其思路，心悦诚服地接受其教诲。

###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干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旦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勸，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选自《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 国文之将来 ——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

今日是贵校毛校长与国文部陈主任代表国文部诸君要我演说，我愿意把国文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尤愿意把高等师范学校应当注意哪一种国文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所以预拟了《国文之将来》的题目。

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

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人的信，都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么。

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像。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的境遇，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哪能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写的读的都是拉丁文。后来学问的内容复杂了，文化的范围扩张了，没有许多时间来摹仿古人的话，渐渐儿都用本国文了。他们的中学校，本来用希腊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后来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希腊文了。日本维新的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文。到近来，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见由间接的，趋向直接的，是无可抵抗的，我们怎么能抵抗他呢？

有人说：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可以省写读的时间。但是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

有人说：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话，中国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

来统一各地方的话，并且用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来帮助他，哪里会分裂呢？要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人，岂不屏斥在统一以外么？

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后的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止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不是最有名的著作么？他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余改的字很多，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难道记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么？又如六朝人喜作骈体文，但是译佛经的人，别创一种近似白话的文体，不过直译印度文与普通话不同罢了。后来禅宗的语录，就全用白话。宋儒也是如此。可见记载与说明，应用白话，古人已经见到，将来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小说从元朝起，多用白话。剧本，元时也有用白话的，现在新流行的白话剧，更不必说了。诗歌，如击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话。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很好的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是统统可以用白话的。行书，但是美术，有兼重内容的，如图画，造象等。也有专重形式的，如音乐，舞蹈，图画等。专重形式的美术，在乎支配均齐，节奏调适，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就是白话文盛行的时候，也许有特别传习的人。譬如我们现在通行的，是楷书，行书，但是写八分的，写小篆的，写石鼓文，或钟鼎文的，也未尝没有。将来文言的位置，也是这个样子。

至于高等师范的学生，是预备毕业后，作师范学校与中学校的教习的。中学校的学生，虽然也许读几篇美术文，但练习的文，不外记载与说明两种。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小学校教习的预备，小学校当然用白话文。照这样看起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该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乙种本）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 李大钊 一八八九——一九二七

河北乐亭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和《新青年》杂志编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18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同年与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从1919年底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1920年他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他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在中共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他代表中央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不顾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通缉，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4月6日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是作者于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前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集会时的演说。1914年至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了世界规模的战争，以欧洲为主战场，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中国也于1917年8月14日被拖入协约国方面作战。1918年，由德、奥、土、保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一方逐渐不支，最终失败，停战协定于11月11日签订。中国亦属“战胜”一方，自当庆祝。然而，究竟为谁庆祝？庆祝什么？对此人们并不十分明确，许多人只是受着一种简单的民族情绪的驱使而随着统治阶级的鼓点起舞。对此李大钊在演说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庆祝的“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的胜利，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全世界的庶民”的胜利。在大战中，各国的“庶民”、“劳工社会”纷纷反战、要求和平，俄国的劳工更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这标志着“新纪元的世界改造”的开始。因而大战的结束是各国的“民主主义”对各国的“军国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在这篇演说中，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大战的起因，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昭示了世界的发展趋势，令听众耳目一新。当时人们对即将举行的巴黎和会普遍抱有幻想。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在1918年12月的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真理战胜强权”，并对巴黎和会有所期待。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如此，李大钊对中国的民族与社会解放道路的艰难曲折却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他在演说中号召人们对创造“新纪元”的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不怕冒险，不要逃避。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1919年）是一篇充满诗意与激情的演说。作者把理想中的新中国称作“少年中国”，呼唤有志于创造新中国的青年们去努力进行“精神改造”与“物质改造”的运动。作者把“物质改造”即改变社会的经济组织当作“精神改造”的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但作者当时的思想有着明显的道德主义与民粹主义色彩，即主张用“互助”、“博爱”、人道主义改造人们的心灵，以作为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的补充；而实现心与物、灵与肉、精神与经济组织两方面改造的方式则是效法于当年俄国的民粹派——到农村去，自身成为劳动者，同时将文化传播到农民中，使他们亦被改造。这种主张显然有较大的局限性。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发展的过程。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1924年）是作者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等团体联合举行的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的演说。作者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对为争取集会结社自由而斗争的工人群众的血腥屠杀，用列宁与“二七”死难工友的精神激励人们继续斗争，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者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浩然正气。

###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多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

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极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情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

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剔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性、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你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种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按：托尔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20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得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

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今天是追悼列宁同志及“二七”工友。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列宁同志一生的事业，大家大概都晓得。现在只拿出一点来说：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关于其他事略，鲍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现在还有许多工友们在那里流离失所，保定监狱里还有工人同志，长辛店还有许多同志家属非常可怜，这些都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与在军阀底下争自由都是很壮烈的。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今日纪念会当中，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国民革命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

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选自《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 周作人 一八八五——一九六七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1906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夏回国后在浙江从事教育工作，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同时以极大热情介绍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业绩。五四运动后，周作人在继续批判旧道德旧文化的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有所发展，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逐渐远离时代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与敦促，周作人仍留在被日军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判刑，1949年保释出狱。新中国诞生后，除写作有关鲁迅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1967年病逝。

周作人身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胞弟，并在新文化运动创始之初，曾与鲁迅一道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到后来竟走到自己的反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思想中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极度膨胀所致。这里选编的1920年1月6日他在北平少年学会上的讲演。

《新文学的要求》也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篇讲演中，他首先批评了文学的两种倾向：即文学的艺术派和文学的人生派。认为文学的艺术派把艺术作为唯一的文学追求是不妥的，但文学的人生派又容易滑到功利主义泥坑之中，使其成为一种人生说教。于是他提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艺术派的文学，即“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出他对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的享受和人生的解释。”周作人的这一主张实际上也成为后来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宗旨，在五四运动期间对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周作人在讲演中将此进一步作了阐述，得出了新文学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基调”，这就为他日后提出“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和他把文学当成“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作人的这篇讲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论争情况，是那一时期社会斗争在文学上的折射，因而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 新文学的要求

今日承贵会招我演讲，实在是我的光荣。现在想将我对于新文学的要求，略说几句。从来对于技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艺术家的全心只在制作纯粹的艺术品上，不必顾及人世的种种问题：譬如做景泰蓝或雕刻的工人，能够做出最美丽精巧的美术品，他的职务便已尽了，于别人有什么用处，他可以不问了。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

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的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的艺术派的文学。在研究文艺思想变迁的人，对于各时代各派别的文学，原应该平等看待，各各还他一个本来的位置；但在我们心想创作文艺，或从文艺上得到精神的粮食的人，却不能不决定趋向，免得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从这两派中，就取了人生的艺术派。但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这两派的主张都各自有他的环境与气质的原因：我们现在的取舍，也正逃不脱这两个原因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如欧洲文学在 19 世纪中经过了传奇主义与写实主义两次的大变动，俄国文学总是一种理想的写实主义：这便因俄国人的环境与气质的关系，不能撇开了社会的问题，趋于主观与客观的两极端。我们称述人生的文学，自己也以为是从学理上立论，但事实也许还有下意识的作用：背义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我们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人生的文学是怎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

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关于第一项，我曾做了一篇人的文学略略说过了。大旨从生物学的观点上，认定人类是进化的动物：所以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的。因为原来是动物，故所有共通的生活本能，都是正当的，美的善的；凡是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要求，但又因为是进化的，故所有已经淘汰，或不适于人的生活的，兽的属性，也不愿他复活或保留，妨害人类向上的路程。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是了。

我们从这文学的主位的人的本性上，定了第一项的要求，又从文学的本质，定了这第二项的要求。人间的自觉，还是近来的事，所以人性的文学也是百年内才见发达，到了现代可算是兴盛了。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的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这是文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与原始的文学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关于文学的意义，虽然诸家的议论各各有点出入；但就文艺起源上论他的本质，我想可以说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现。诗序里有一节话，虽是专说诗的起源的，却可以移来作上文的说明：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们考察希腊古代的颂歌（Hymn）史诗（Epic）戏曲（Drama）发达的历史，觉得都是这样情形。上古时代生活很简单，人的感情思想也就大体一致，不出保存生活这一个范围；那时个人又消纳在族类里面，没有独立表现的机会：所以原始的文学都是表现一团体的感情的作品。比如戏曲的起源是由于



一种祭赛，仿佛中国从前的迎春。这时候大家的感情，都会集在期望春天的再生这一点上：这期望的原因，就在对于生活资料缺乏的忧虑。这忧虑与期待的“情”实在迫切了，自然而然的发为言动，在仪式上是一种希求的具体表现，也是实质的祈祷，在文学上便是歌与舞的最初的意义了。后来的人将歌舞当作娱乐的游戏的东西，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人类的关系生命问题的一种宗教的表示。我们原不能说事物的原始的意义，定是正当的界说，想叫化学回到黄白术去；但我相信在文艺上这意义还是一贯，不但并不渐走渐远，而且反有复原的趋势：所以我们于这文学史上的回顾，也不能不相当注意，但是几千年的时间，夹在中间，使这两样相似的趋势，生了多少变化；正如现代的共产生活已经不是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要明白这意思，墨子说的“己在所爱之中”这一句话，最注解得好。浅一点说，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总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反是相成的。古代的个人消纳在族类的里面，个人的简单的欲求都是同类所共具的，所以便将族类代表了个人。现代的个人虽然原也是族类的一个，但他的进步的欲求，常常超越族类之先，所以便由他代表了族类了。譬如怕死这一种心理，本是人类共通的本性：写这种心情的歌诗，无论出于群众，出于个人，都可互相了解，互相代表，可以称为人类的文学了。但如爱自由，求幸福，这虽然也是人类所共具的，但因为十分切迫，在群众每每忍耐过去了；先觉的人却叫了出来，在他自己虽然是发表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欲求，但他实在也替代了他以外的人类，发表了他们自己暂时还未觉到，或没有才力能够明白说出的感情与欲求了。还有一层与古代不同的地方，便是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情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许多重大问题，经了近代的科学的大洗礼，理论上都能得到了解决。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类里边有皮色不同，习俗不同的支派。正如国家地方家族里有生理，心理上不同的分子一样，不是可以认为异类的铁证。我想这各种界限的起因，是由于利害的关系，与神秘的生命上的连络的感情。从前的人以为非损人则不能利己，所以连合关系密的人组织一个攻守同盟；现在知道了人类原是利害相共的，并不限定一族一国，而且利己利人，原只是一件事情，这个攻守同盟便变了人类对自然的问题了。从前的人从部落时代的“图腾”思想，引申到近代的民族观念，这中间都含有血脉的关系；现在又推上去，认定大家都是“人”（Anthropos）这一个图腾出来的，虽然后来住在各处，异言异服，觉得有点隔膜，其实原是同宗。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感情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基调。

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所谓人类的意志这一句话，似乎稍涉理想；但我相信与近代科学的研究也还没有什么有冲突：至于他的内容，我们已经在上文分两项说过，此刻也不再说了。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

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 梁启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梁启超从小熟读四书五经，17岁中举人，后从师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思想为之一变。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梁启超愤中国积弱不振，于是同康有为一道，倡导变法维新，并于1895年，随康有为一道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清廷变法。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与推进维新运动，故为统治集团中顽固派所嫉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康有为一道建立保皇党，创办《清议报》、《新民众报》等，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受到民主革命派的反对。但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等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昭然若揭后，梁启超策动蔡锷组成护国军反袁，反袁运动结束后，又出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不和，梁启超辞去官职，离开政治而致力于著述，并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讲学，著有《饮冰室合集》等，1929年病逝于北京。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变法，倡导保皇立宪，表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但是他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里选编的两篇讲演辞，都是他晚年思想的显现，对我们了解梁启超不无裨益。

《人权与女权》（1922年11月6日），是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学，启迪国人思想的一篇力作。自孔子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伦理界都讲究做人，可是如何真正做一个享有人格的人，却不是人人都仔细琢磨过的。梁启超幽默风趣，入情入理地向听众讲述了要做一个真正享有人格的人，必须要有教育、职业和政治上的平等权。接着梁启超又将话题引伸到长期被人漠视的女人做人的权利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女人长期受到压抑，其做人的权利甚至连女人也遗忘了。梁启超在介绍了西方女权运动后，提出了中国的女权运动要和所有国人争取人权运动并行发展，无须等待，同时也提请女人记住，不要依赖男人，要独立地做人。梁启超的这篇讲演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令国人耳目一新，起到了极其深远的重大作用。

《为学与做人》（1922年12月），是梁启超谈做人的又一篇佳作。读书与做人，是儒家极为重视的问题，梁启超的这篇讲演基本上是遵循孔孟之道的，他以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入手，论及了教育方面的知、情、意的诸多问题。梁启超的思想显而易见属于唯心论范畴，但其以通俗浅显的语言、顺畅流便的风格却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 人权与女权

诸君看见我这题目，一定说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说人权自然连女权包在里头，为什么把人权和女权对举呢？哈哈！不通诚然是不通，但这个不通

题目，并非我梁某人杜撰出来。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通，我不过照实说，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罢了。

我要出一个问题考诸君一考，“什么叫做人？”诸君听见我这话，一定又要说：“梁某只怕疯了！这问题有什么难解？凡天地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这个答案错了。这个答案只能解释自然界“人”字的意义，并不能解释历史上“人”字的意义。历史上的人，其初范围是很窄的，一百个“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之中，顶多有三几个够得上做“人”，其余都够不上！换一句话说：从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历史慢慢开展，“人格人”才渐渐多起来。

诸君听这番话，只怕越听越糊涂了。别着急，等我逐层解剖出来。同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权，我也该享有。是不是呢？着啊，果然应该如此。但是从历史上看来，却大大不然。无论何国历史，最初总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隶”。奴隶岂不也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吗！然而那些非奴隶的人，只认他们是货物，不认他们是人。诸君读过西洋历史，谅来都知道古代希腊和雅典，号称“全民政治”，说是个人人都平等都自由。又应该知道有位大哲学家柏拉图，是主张共和政体的老祖宗。不错，柏拉图说，凡人都应该参与政治。但奴隶却不许。为什么呢？因为奴隶并不是人！雅典城里几万人，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参与政治。为什么说是全民政治呢？因为他们公认是“人”的都已参与了，剩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隶，本来认做货物不认做人。

不但奴隶如此，就是贵族和平民比较，只有贵族算是完完全全一个人，平民顶多不过够得上做半个人。许多教育，只准贵族受，不准平民受；许多职业，只准贵族当，不准平民当；许多财产，只准贵族有，不准平民有。这种现象，我们中国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时候便是如此；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到十八世纪都是如此。

在奴隶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隶的人把奴隶不当人看，连那些奴隶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在贵族制度底下，不但贵族把平民当半个人看，连那些平民也自己觉得我这个人和他那个人不同。如是者浑浑沌沌过了几千年。

人是有聪明的，有志气的，他们慢慢的从梦中觉醒起来了！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我也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为什么你更该如彼我便该如此？他们心问口、口问心，经过多少年烦闷悲哀，忽然石破天惊，发明一件怪事：“啊，啊！原来我是一个人！”这件怪事，中国人发明到什么程度我且不说，欧洲人什么时候发明呢？大约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他们一旦发明了自己是个人，不知不觉的便齐心合力下一个决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条件预备充实，一面要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第一步，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不能让贵族和教会把学问垄断。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当的职业，不许说某项职业该被某种阶级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为保障前两事起见，一国政治，凡属人都要有权过问。总说一句：他们有了“人的自觉”，便发生出人权运动。教育上平等权，职业上平等权，政治上平等权，便是人权运动的三大阶段。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轰的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齐来！属地么，要自治；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19世纪

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一百年，闹的就是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贵族是人，僧侣是人，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做人的，都恢复他们资格了。人权万岁！万万岁！

万岁声中，还有一大部分“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在那边悄悄地滴眼泪。这一部分动物，虽然在他们同类中占一半的数量，但向来没有把他们编在人类里头。这一部分是谁，就是女子！人权运动，运动的是人权。他们是 Women 不是 Men，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权，却不关她们的事！

眼泪是最神圣不过的东西，眼泪是从自觉的心苗中才滴是出来。男子固然一样的两只眼睛一鼻子，没有什么贵族、平民、奴隶的分别，难道女子又只有一只眼睛半个鼻子吗？当人权运动高唱入云的时候，又发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来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有了这种发明，于是女权运动开始起来。女权运动，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广义的人权运动。

广义的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那狭义的人权运动——平民运动正是一样，要有两种主要条件：第一要自动，第二要有阶段。

什么叫自动呢？例如美国放奴运动，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爱心的白人要解放他们，这便是他动不是自动。不由自动得来的解放，虽解放了也没有什么价值。不惟如此，凡运动是多数人协作的事，不是少数人包办的事，所以要多数共同的自动。例如中国建设共和政体，仅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动，其余大多数不管事，这仍算是他动不是自动，像欧洲 19 世纪的平民运动，的确是出于全部或大多数的平民自觉自动，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彻底的理由，全在乎此。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

什么是阶段呢？前头说过，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这三件事虽然一贯，但里头自然分出个步骤来。在贵族垄断权利的时代，他们辩护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说：我们贵族所有的学问知识，你们平民没有；我们贵族办得下来的事，你们平民办不下来。这话对不对呢？对呀。欧洲中世的社会情状，的确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纪依然是这种情状，我敢保《人权宣言》一定发不出来，即发出来也是空话。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贵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这种机会陆续到手，他们便十二分努力去增进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纪时，平民的知识能力，比贵族只有加高，绝无低下，于是乎一鼓作气，把平民运动成功了。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先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

他们的女权运动，现在也正往这条路上走。女权运动，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为什么不振呢？因为女子知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为什么赶不上呢？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用全力打破这一关，打破之后，再一步一步的肉搏前去，以次到职业问题。以次到参政权问题。现在欧美这种运动，渐渐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们怎么样呢？哎，说起来，又惭愧，又可怜，连大部分男子也没有发明自己是个人，何论女子！狭义的人权运动还没有做过，说什么广义的人权运动！所以有些人主张“女权尚早论”，说等到平民运动完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这种话对吗？不对。欧洲造铁路，先有了狭轨，才渐渐改成广轨；我们造铁路，自然一动手就用广轨，有什么客气！欧洲人把狭义广义的

人权运动分作两回做，我们并做一回，并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万不可以忘记：狭轨广轨固然不成问题，然而没有筑路便想开车，却是断断乎不行的。我说一句不怕诸君呕气的话：中国现在男子的知识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的，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几倍！讲女权吗？头一个条件，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换一句话说，是要有职业。譬如某学校出了一个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谁争赢谁？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书，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又谁争赢谁？再进一步，假使女子参政权实行规定在宪法，到选举场中公开讲演自由竞争，又谁争赢谁？以现在情形论，我斗胆敢说：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女子的知识能力实实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吗？不然不然，不过因为学力不够。为什么学力不够？为的是从前女子求学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机会。没有均等机会，固然不是现在女子之过；然而学力不够，却是不能讳言的事实。诸君在英文读本里头谅来都读过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即权力。不从知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一个人如此，阶级相互间也是如此，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了。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老实说一句：现在男子算有参政权没有？说没有吗？《约法》上明明规定；没有呢？民国成立十一个年头，看见哪一位男子曾参过政来？还不是在选举人名册上凑些假名，供那班“政棍”买票卖票的工具！人民在这种政治意识之下，就让你争得女子参政权，也不过每县添出千把几百个“赵兰、钱惠、孙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几票生意！我真不愿志洁行芳的姊妹们，无端受这种污辱。平心而论，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废食，这种愤激之谈，我也不愿多说了。归根结底一句：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谈。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知识能力上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诸君啊！现在全国中女子知识的制造场，就靠这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诸君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庄子说得好：“水之积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君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又要知道想尽此责任，除却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外，别无捷径。我盼望诸君和全国姊妹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将来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这回运动成功的时候，真可以欢呼人权万岁了！

（选自《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为学与做人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聚在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

诸君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别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

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日忧成败，二日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刚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



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噫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办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主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好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选自《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 茅盾

一八九六——一九八一

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窘迫，不得已中断学业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茅盾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运动之中，并于1921年1月，与郑振铎等十二人成立了新文学运动最早的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倡导文学要反映人生，反对把文学当成消遣品。同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他以“小说月报”编务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1927年，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茅盾欲前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因路途受阻，未能到达南昌。后遭反动派通缉，从此茅盾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茅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与鲁迅一道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6年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与鲁迅致电中央，庆贺红军胜利。这一时期也是茅盾文学创作丰收期，长篇小说《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发表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抗战胜利后，茅盾积极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揭露国民党反民主、要内战的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历届政协常委和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1981年病逝于北京。

茅盾长期以来，与党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活动是一生中令人瞩目的一段生活历程，这里选编的两篇演讲辞，是这段生活中颇具代表性的演讲。

《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1922年）是他在宁波“四明夏期讲习会”上的演讲。当时中国文坛上新派迭起，新诗、新小说、新戏剧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面对这一新鲜事物，欢呼雀跃者有之，迷惑不解者有之，攻击嘲弄者亦有之，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如何引导人们理解并接受这些文学新潮，茅盾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他循循善诱地列举冰心的《笑》、郭绍虞的《暮气》为何不合传统写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小说，并非单单看到一点离合悲欢的人事，我们要得到欣赏，得到感动，有离合悲欢的人事小说，固能使人欣赏，使人感动，没有的也可以使人欣赏，使人感动”；是因为“诗之成立，以情绪之真不真，能不能感动人为主要条件。形式、格律尚在其次。”茅盾批评了那些把新派文学比作妇女时装的浅薄见解。此外，茅盾又以意大利的未来派、法国的达达派和德国的表现派为佐证，说明任何文学新派兴起的原因，都是因为时代不同，人生各异的必然产物，绝非源于某些人的好奇喜新。这里茅盾实际上揭示了文学变化的深层原因，预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观念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

《文学与人生》（1922年）是茅盾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讲演。这篇讲演显然受到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的影响，重申了文学产生的种族、时代与环

境的三大要素。然而茅盾绝不是简单地重复泰纳的理论，而是在这三要素外，更增加作家人格这一条件。茅盾认为“大文学家的作品，哪怕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并据此提出了“革命的人，一定要做革命的文学”这一结论，这样“文学与人生”这一课题，在茅盾笔下，就有着泰纳所不可比拟的重大发展。

### 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

今天能够把我的意见贡献给诸位，真是万幸。一时想不出一个适当的题目，因为我所研究的，似乎和诸位所需要的，不十分适合。虽则“文艺像空气一样的普遍”，小说戏剧是人人喜欢看而且常看的，但若谈到文学上的种种理论，那就觉得大抽象得非人人喜欢听了。我们常常听人说最新派的小说、戏剧看不懂，或者以为那些东西不值一笑。我想，如果就从解释这种“非难”入手，带便讲到文学上的理论，或者听者更觉有味，所以我就定了“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一题。

中国近四五年，文学界起了一个变动，读者但凡看看最近出版的小说、诗、戏曲，总觉得另有一种现象。从前的小说，大都是章回体，内容不外离合悲欢的人事。像《红楼》、《水浒》就是现成的好例。现在可不是这个样子了，冰心女士所作的《笑》，是一篇短篇小说，里面第一段是描写老妇人的笑容；第二段是小儿的笑容；第三段是图画里天使的笑容。老妇人的笑容，是作者下笔前所得的印象，其余两个是回忆。这篇小说里没有悲欢离合，也不专讲一人一家的事，只是一段印象与回忆的混合品。若照旧例看来，简直不算小说，但是我们现在即叫她这一篇是小说了。因为我们现在相信，小说的内容并不一定要离合悲欢，一时的感想，一时的印象，都可作成小说。譬如有人从上海到宁波，抵埠的时候，看见许多争先揽生意的脚夫，又看见靠在第三层船舱栏杆上的安闲的贵绅和美貌青年的女士，我们觉得这两种人生有了个“对照”，因此生了一种感想，写了出来，便可成为一篇小说。如果作者能够观察到极精微的地方，又把作者对人生的意义，运化在里面，或者竟可成为一篇极好的短篇小说。因为我们看一本小说，并非单单看到一点离合悲欢的人事，我们要得到欣赏，得到感动，有离合悲欢的人事小说，固能使人欣赏，使人感动，没有的也可以使人欣赏，使人感动。

其次，中国旧体诗注重格律，韵脚平仄对仗，都有固定的格律，不好随便变动。近来的白话诗，却不讲究这些，并且反对有格律；两句三句的白话，便可成为一首诗，例如郭绍虞的《暮气》：

夕阳之神  
正在精心地撰写他的文章呢！  
把满山红霞，  
铺作满江红锦，  
说他是垂死的留恋吗？  
但是何曾有些儿暮气呢！

又如朱自清的《台州杂诗》中的一首《笑声》，却只得两句：

是人们底笑声哩，  
追寻去，却跟着风走了！

这种诗若用旧诗式来批评，一定觉得极不合格，算不得诗了。但我们试问：诗是为什么做的，不是一个人胸中有种极热烈的非说不可的情绪，故发而为诗么？可知诗之成立，以情绪之真不真，能不能感动人为主要条件。形式、格律尚在其次。我们胸中的热烈的情绪，有时可以四句话表现出来，有时或只得三句，有时说了五句方能畅尽，有时说了七句便已足够。而旧体诗的格律限定字句，七绝五绝一定只能四句，七律五律一定要八句，三句七句是万万不能的。作者拘于格律，于是只好硬硬缩短，或勉强拉长了。于是乎动笔时的真挚热烈的情绪也只好牺牲了。这种办法当然不对。可惜几千年来的文人，竟然不知其不对，或虽知之而不敢说。我记得从前书上说，唐朝有个祖咏，应试《终南积雪》一题，本限五言律，他老先生却只作了“终南阴岑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弄色，城中增暮寒”便交了卷。人问他为何只有四句，他说我已作尽，此外不能再添一语了。这一段故事，就证明诗人若果要忠实于自己的情绪，便绝不能有什么来束缚他。诗有格律是诗人的不幸。我们平心而言，若果有人能够自然地吧热烈的情绪用旧诗的体裁发表出来，我们当然不反对，但若作者不愿用旧诗体裁而用白话一行一行写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因其不照格律而说他不应该：不过在看惯旧诗的人看来，觉得实在奇怪罢了。

像上面所引的短篇小说和新诗，就是现在所谓的新派，近年来以一日千里之势流行于社会，早惹起一般人的注意，同时又引起了很纷纠的争论。有人说新派好，有人说旧派好，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我们到底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近来忽然有这些新派出来，于今新派也受一部分人的欢迎，是什么缘故？我想，最普通的答案，一定是说新派文学之产生，由于人的厌旧喜新，由于青年的好奇心，这种浅薄的见解，简直把文学上的新派比作妇女的时装，实在很不对。喜新厌故原是人之情，妇女衣服的袖口，从前以小为时髦，近来变成又短又大，渐渐又回小去，常常是循环的。但是文学上的新派，以外国的例看来，却是从不走回旧路的，只就这一点上看，已可证明文学上的新派决不是好奇心理的表现，而况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他的改变安能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我们先要晓得，文艺是人生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缩影，一时代的文艺完全是该时代的人生的写真。这种话，初看似乎是西洋来的“舶来品”，不是“国货”，然而细想起来，中国古人原也早已悟到这一层的。古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产生出什么样的文艺，什么样的文艺是怎么样的人生反映。

《左传》上又说，吴季札到各国观乐，便知某国将兴、某国将亡；与其士大夫接交，听他们宴会时赋的诗，便知某也将败，某也将荣贵，这也是吴季札晓得文艺是人生的反映，丝毫不得错的。所以他听了某国的乐声而知某国的治乱，便敢断定某国的兴衰。变乱之世，自然要生出怨以怒的文学来，并非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学，然后造成乱世；后代人大都误认“怨以怒”的文学是造成乱世的，极力要说谎话，粉饰太平，便是大错：因此而忽略了一时代的人生、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那就更错的厉害。

不但文学思潮是跟着时代变迁的，即如文学上各种体裁的次第发生，也

是跟着时代变迁而来的结果。法国近代批评家蒲留契尔（Brunetierc），主张的文学进化论就是这么说的，他以为史诗、悲剧、抒情诗等等的发生，都根据于时代变迁的影响——或者有些地方难免穿凿，然而他的见解确是不错的。

根据上面说的，我们且看西洋新兴的派别是否都合于上述的原则。我们要晓得，中国所谓新派文学——白话诗与短篇小说——实在未为十分新奇、难以索解。我们不如把西洋最新的来看一看。西洋的较新派是：

- 一、未来派 Futurist
- 二、达达派 Dadaist
- 三、表现派 Expressionist

这三派中间，未来派是大战前几年就有的，以意大利为出发点，亦以意大利为最盛。达达派是大战正剧烈的时候发生的，现在法国颇流行。表现派是大战后德国的特产。我们为易于了解起见，仍想先把这三派作品的面目说一说，然后再追求发生的原因。第一先讲未来派。

未来派的历史比较长久些，所以他的运动的范围亦较广大，除意大利外，英、法、德、俄、美都有未来派的作家。这一派有绘画、有诗、有剧本，而以剧本为最多。我们知道，剧本都是描写一段人生，其中有男女角色若干——至少也要一个角色，场面至少要一幕。但是未来派的剧本可就大不相同了，竟可没有角色。我记得有一剧本，开幕时只见一条乌黑的小弄，一条黑狗在台前慢慢的走了过去，就闭幕了，就算完了。我们知道诗是表现作者的情绪，但是未来派的诗却写了一架机关枪跳在空中，向四面放射子弹，如此而已。这种完全破坏文学旧规则的“新派”，而且好像全无意义的作品，在我们看来，也觉得奇怪，也几乎要说他们是好奇心了。但是我们向四面搜求之后，便知未来派也是受了那时候的人生的影响。我们要晓得，未来派是小中产阶级心理的产物，当本世纪初，物质文明骤然进化，科学和机械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社会，人的心理感受其影响。机械是力量愈大愈好，愈速愈好，所以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旋转着“力”、“速”两个字。无论什么事，总想以愈大的力，愈快的速度把他做成，个个人背后好像有鬼赶着，拼命要向前去，力愈大愈好，愈快愈好，这便是那时人生的真相。未来派受了这种暗示，生当那时，住在那种社会里，自然也要做出崇拜力、崇拜速的作品来了。正如日处田野要讴歌大自然，乃同一合理的事，丝毫不足为奇。

第二且看达达派。达达派的历史暂只四五年，运动范围自然要小些，现在除法国的一群人外，俄国有×个，美国有×个，都是达达派。但从者不多，势力并不怎么大。法国的一派人，也是近一二年来方得了批评家的注意。1916年欧战正剧烈的时候，有几个法国作家避乱于世外桃源的瑞士，便开始了达达派的运动。1920年2月15日，他们为要使人注意，特在巴黎郑重其事地开了个展览会，这会里陈设着他们的诗歌、戏剧和图画。最奇怪的是绘画，有一张 Marcel Duchamp 的绘画，乃是取普通铜版印物 Mona Lisa 像，加了两撇凯撒式的胡子在微笑的樱唇上，我们知道“Mona Lisa”是文西的杰作，他画了一个微笑的女子半身像，后面布着深山河源的背景，是有意义的。他说最不可测者，是女子的微笑，表面虽然极美丽、极温柔、极安静，然而底下是不可测的，犹如深渊的底下，或龙潜或魔斗，是不可测的，然而水面却

---

Marcel Duchamp (1887~?) 马塞尔·杜尚，法国画家。

只有微波。现在这幅“Mona Lisa”成为世界珍品，藏在法国罗弗宫中，铜版的影印品几乎各处都有，达达派的作家却就取了这么一张铜版影印品，加上了两笔胡子，就挂起来，这岂不是极无意义、极可笑的事么？又有一幅《圣女玛利》，却是一般白纸上洒些墨水，更不可解了。再看他们的诗，有一首叫做《基督的心》的，是 picabia 所著，乃是无意义的自造的字组合成的。又有 Aragon 的一首《自杀》，则全是字母组成之。

总之，达达派在一切新派中，比较的是最难索解了。观上例就可明白他们自己的宣言。他们说：“不求人家懂……要打破艺术上已有的规则。”像这种样“突飞”的新派，势必不能不叫人看了诧异，以为是好奇心勃发的结果；然而我们细细去考究他们发生的原因，又觉得不足为奇了。我在上文说过，达达派兴起于 1916 年——正当欧战剧烈，法国拼死命的时候。那时两交战国的胜负未分，两方都舍弃一切，作孤注一掷。布厂木厂——一切铸造人生日用必需品的工厂，都可以改作兵工厂，教育经费可以提用，口粮可以限制，大家都用了全部力量从事战争，在法国方面，因为半个国境已被德国占据，自然尤为困难，那时的法国人虽然牺牲一切，以求最后之胜利，然而究竟不敢确信最后胜利必属于己。诸位试想，牺牲一切以求一不可必得的目的，是何等可笑而无意识的事！然而那时的法国人，受了爱国的催眠术，狂热到视以为理之当然了。达达派的作家，一方面亦亲身感着这种空虚的悲哀，一方面却因置身世外，反而脑筋看得清楚，看得澈、见得到。他们觉得世界上的事都是可笑的、无意识的，人类就是可笑的，无意识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要本此见解以创作了。这结果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不可解释的东西。其次，战争是什么，是不是破坏？随便你怎样曲解，总是破坏。大战的时候，正是人类借了好听的冠冕堂皇的名词，实行破坏的时候。达达派亦感到了，所以他们实行破坏艺术上的一切法规了，其结果我们上面亦已说过了，由此观之，达达派也是应时而生的东西，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讲表现派。表现派是德国战败后兴起的新派，法国大战前出名的作家，经了这次大战，都像扰乱了神经，暂时没有什么作品，近三四年书坊里最流行的作品都是表现派的。他们有绘画、有诗、有剧本，他们的题材大都是一些刺激性极强的，例如战争、性欲等等。他们对于人间悲观极了，在他们看来，人性是恶的、物质的、肉的。从前印象派的画家画了一个妓女，尚从她的眼光里表现出人性的善，现在表现派画家画的妓女却就完全不相同了。女性的温柔也没有，可怜的景象也没有，只是痴肥、粗恶、淫毒的结晶罢了。譬如马尼的《俄林皮亚》，是一幅娼妓裸体画，他画一个妓女全身裸露睡在柔软的床上，旁边有一个女黑奴捧着一丛美丽的花，这个可怜的娼妓，不知犯过多少淫恶，现在老而且不中用了，她的身体大概已经腐了，爱之源泉也已枯涸了，但是她的瞳子尚很柔和，显着她心内深蕴的人性的善良。这是印象派画家所见的人生，白修修泰因的《女》也画的是个娼妓，那娼妓却肥胖如猪，唇厚、眼半闭，没有修养、没有道德、没有恋爱，并且没有柔软的床和香花，她只睡在荒凉的沙漠里，那分明是变态的肉欲和自然人没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是表现派所见的人生。再看他们的剧本，则和从前的完全不同，不论是布景、是结构，都和从前不同。譬如海似林的一篇《海战》，布

---

picabia (F.1879 ~ 1953) 皮卡比亚，法国画家。

Aragon (L.1897 ~ 1982) 阿拉贡，法国作家。

景是用海景和一座巡洋舰，全剧极少动作，几乎满篇都是对话——直挺挺站在那里说话。然而水兵们憎恶战争的心理以及卑怯的畏死的情形，都跃然纸上。表现派的诗比剧本和绘画更为难懂，他们完全破坏旧规律，每每一个字一句，并且不求人懂。有一个勃鲁纳，他作的诗完全是无意义的字组成的。他说声、义、色、格四者虽是诗的四德，然而声最要紧。他的诗是旧的，也有意义，但须以神会，不能以理智求得。这种议论给我们看来，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他们对人生的见解，也不是我们听得惯的。可是细细的考察，就可以知道这种创作品也是人生的反映，不足为奇。我们知道大战以前，德国人是很自负的，在科学、艺术、哲学方面。德国都不示弱于人，不但不弱，并且比人家都行。可是此次大战一败涂地，物质上的困难引起了精神上的痛苦。德国人颓丧之余，觉得对自己的文化有点怀疑了，加以实际的生活问题又近在眉前，不能不想法。照德国现在的纸币低落的情形看来，谁也不敢料定明天要跌落多少。今天有 20 马克的人，原能吃二天，但到马克一落，不够吃两天亦说不定。所以德国人天天在危疑之中过生活，然而德国人确不能不生活下去，既不能不生活，而又终日烦闷，一定要想些娱乐方法来暂时自排遣的。但是心绪不宁，又无意去寻美妙的精神上的娱乐，只要求肉感的娱乐，刺激一下罢了。所以喜听战争、炸弹、性欲的事。在这一方面看来，可说德国人现在正过着变态的肉和自然没有意义的生活。

但是德国民族的特性，不是一败之后就能屈服沮丧的。德国人虽然战败了，却不肯认输，他们现在所渴望的是“精神复苏”。德国人再提起精神来从事创造——创造出新文化来，哪怕是一双靴子，一根带子，只要是新创造出来的，总比没有好些。我们从两方面看，又可说德国人现在苦心创造，合了这两方面，就成了表现派的文学运动。表现派破弃一切旧规则而努力要创新的精神，以及变态性欲的生活，都是现在这时代的人生的缩影，既不是好新的缘故，尤其不是发昏。

从上面这三派看来，大概可以证明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是因为时代不同，人生各异，并非源于人之好奇喜新。或者有人说文学上派别兴起的原因，不仅是时代的，那也未尝不可；不过总不能不承认时代背景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近十年来，人生的变幻比从前要厉害得多，文学上要有新派兴起，亦是自然而且合理的事，虽然现在新派的东西亦尽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这是启蒙时代必不可免的现象。希望大家能够把公正的心去批评新派，不要以为只是青年好奇心的表现，不值一笑。须知他们的价值实在高出一笑以上呢！

## 文学与人生

今天讲的是文学与人生。中国人向来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

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因此，文学和别种方面，如哲学和语言文字学等，没有清楚的界限。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至于文学和别种学问的关系，更没有说起。所以要讲本题，在中国向来的书里，差不多没有材料可以参考。现在只能先讲些西洋人对于文学的议论，再来讲中国向来的文学，与人生有没有关系。

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所以可说“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背景”就是所从发的地方。譬如有一篇小说，讲一家人家先富后衰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要问讲的是哪一朝。如说是清朝乾隆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他讲的话。究竟像乾隆时候的样子不像？要是像的，才算不错。上面的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从这两句话上，大概可以知道文学是什么。固然，文学也有超乎人生的，也有讲理想世界的，那种文学，有的确也很好，不过都不是社会的。现在我们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单是说明“社会的”，还是不够，可以分下列的四项来说一说。

（一）人种文学与人种，很有关系。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哪一种人，有哪一种的文学，和他们有不同的皮肤、头发、眼睛等一样。大凡一个人种，总有他的特质，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民族的性质，和文学也有关系。条顿人刻苦耐劳，并且有中庸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也如此，他们便是做爱情小说，说到苦痛的结果，总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烈。法国作家描写人物，写他们的感情，非常热烈。假如一个人心里烦闷，要喝些酒，在英人只稍饮一些啤酒，法人却必须饮烈性的白兰地。这英法两国人的譬喻，恰可以拿来当作比较。文学上这种不同之点是显然的。

（二）环境我们住在这里，四面是什么。假设我们是松江人，松江的社会就是我的环境。我有怎样的家庭，有怎样的几个朋友……都是我的环境。环境在文学上影响非常厉害。在上海的人，作品总提着上海的情形；从事革命的人，讲话总带着革命的气概；生在富贵人家的，虽热心于平民主义，有时不期然而然的有种公子气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奥的神秘诗人，他的作品里可以和他的环境无涉——就是并不提起他的环境，但是他的作品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环境有关。即使是反乎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仍旧是有关系。因为他的“反”，是受了当时思潮的刺戟，决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至于正面的例子，在文学史上简直不胜枚举。例如法国生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学家，他们见的是法国二次革命与复辟，所以描写的都是法国那时代环境下的人物。申特虽为了他的革命思想，逃到外国，可是他的作品，总离不掉法国那时代的色彩。举眼前的例：我们在上海，见的是电车、汽车，接触的可算大都是知识阶级，如写小说，断不能离了环境，去写山里或乡间的生活。英国诗人勃恩斯（Burns）的田园风景诗，现在人说他怎样好，怎样美丽，平静；19世纪末，作家都写都会状况，有人说他们堕落；这都是环境使然。又如19世纪末有许多德国人，



厌了城市生活，去描写田园，但是他们的望乡心，一看便知。这就是反面的例。可见环境和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有人说，中国近来的小说，范围太狭，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他怎样能写别的？

（三）时代这字或是译得不好。英文叫 epoch，连时代的思潮，社会情形等都包括在内。或者说时势，比较近些。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时代精神”这一句话。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学、文学、美术等等，犹影之与形。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自然也有例外，但大体总是如此的。我们常听人说，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就是因为两汉有两汉的时代精神，魏晋有魏晋的时代精神。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又因为尊重个性，所以大家觉得尽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会，就不说。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欺人。这是近世时代精神表见于文艺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爱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学里，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坚强特异，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大文学家的作品，哪怕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法国法朗士（Anatole France）说，“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是西洋人的议论，中国古来虽没有这种议论，但是我们看中国文学，也拿这四项做根据。第一，中国文学，都表示中国人的性情：不喜现实，谈玄，凡事折中。中国的小说，无论好的坏的，未后必有个大团圆：这是不走极端的证据。关于人种一条，可以说没有违背。第二，环境更当然。中国文学的环境，自然都是中国的家庭社会。第三，时代的关系在中国似乎不很分明。但仔细看，也有的。讲旧文学的人说：同是赋，两汉的与魏晋的不同；同是诗，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李义山的无论哪一首诗，必不能放在初唐四杰的诗中。他们的诗，同是几个字缀成，同讲格律，只因时代不同，作品就迥然两样。《世说新语》的文字，在句法与文气上都与他书不同，《宋人语录》亦如此，与《水浒传》不同，与《宣和遗事》又不同，这都可以说因为时代空气不同。非但思想不同，文气、格律也有不同。可见时代的影响，也很厉害。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盗名的，也有他们的人格在作品里，所以文学与人生的四项关系，在中国也不是例外了。

文学与人生简单的说明不过如此。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凡要研究文学，至少要有入种学的常识，至少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环境，至少要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且要懂这种文学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以上均选自《茅盾全集》）

## 孙中山

### 一八六六——一九二五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曾在澳门、广州等地开业行医。1894年9月从上海去檀香山，11月组织兴中会。1905年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他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发展革命组织，并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起响应。他于12月19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组成临时参议院。2月12日清帝退位。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力下与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孙中山于2月13日被迫辞去大总统职，3月主持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他号召起兵讨袁。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1918年被迫去职至上海。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离广东退居上海。1924年1月，在中共、苏共的帮助下于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是，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24年1月29日）是一篇动员演说。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办法，同意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在思想上确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的新三民主义，在组织上将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了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从而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面前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革命前景。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有感于过去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和“没有好办法”，号召与会者“固结精神”，“一致奋斗”，按照大会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和新的政纲，努力实践，争取在短时期内取得革命事业的“彻底的大成功”。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1924年2月23日）是作者对湘军的一次演说。这篇演说的价值在于深入浅出地、生动地阐释了新三民主义。作者在这里把三民主义一以贯之为“打不平等”：民族主义就是对外打不平，打掉外族（满清）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民权主义就是对内打不平，打掉

封建皇帝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民生主义就是“对资本家打不平”，打掉贫富不均的现象。作者并以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作为三民主义完全成功的范例，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人人平等、无忧无虑的理想国，而认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尚有民生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显然，作者在新三民主义中吸收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但又并未真正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新三民主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陆覃军官学校开学演说》（1924年6月16日）是作者在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该军校是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于1924年开办的，校长为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愷，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第一期学员中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约六十余人。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曾任该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熊雄等先后在该校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北伐军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校变成反革命营垒。在这篇演说中，作者首先从俄国革命的成功与中国革命的不成功的对比，说明了开办军校，创建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继而说明了革命军和军阀军队的本质区别，最后激励学员们立志做革命军，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

以下三篇演说均作了适当删节，以减少重复。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同志诸君：

今天是我们国民党代表大会开会的第十天，也是这次大会闭会的一天。这次开会以来，所办的重要事项，秘书长刚才已经报告了。至于会中所办重要的事，即刻要拿去做宣传材料的，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全体，分作三段：第一段是讲中国国内的现状。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就是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实行这个主义。但是自民国成立以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十三年，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主义的目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由于我们的办法不完全，二是由于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协力，一致行动。我们这次开全国代表大会，订一个完全办法，划一同志的步骤，并议定党中的纪律，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把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做成事实。推究这个主义的来源，是我从前和各位同志经过了许久的讨论与研究，然后才确定出来的，在革命党没有成立以前，便有少数同志很赞同去实行；后来革命党成立了，就有多数同志赞同去实行；到了今日，便有极多的先觉先知赞同去实行。由此便可见本党的三民主义，是始终都不改变的。大家对于三民主义以后要心悦诚服，完全担负实行的责任。

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党的政纲，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节目。我们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所以不得不照中国的现状，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这个政纲。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

所以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我们从前革命，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就是为人民求幸福而牺牲。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如果人民明年有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但是人民的要求，在短时期中，决无大变动，所以我们订定的政纲，至少也要维持一年。在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动，照所订定的条件去实行。我们在这次大会所订定的政纲，或者有见不到的地方，诸君以后对于自己定的政纲以外，不能说没有新见解，所以这次所定出来的，不能说是完全周到，没有遗漏。但是诸君如果有了新见解，必须等到明年开第二次大会的时候才去修改。在没有开第二次大会之先，我们对于这次大会所定的政纲，就万不可违背，如果有了违背，便是乱大众的步骤。……政纲和主义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时期，最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对于政纲是发生根本变动的，我们临时才可以召集特别大会去修改。由此便可知政纲的修改，是有一定时间，因为预定了一定时期，大家进行的步骤，才有秩序，不致纷乱。本党党员，从前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纲相矛盾，这是本党自乱的大毛病，此后大家必须要除去这个毛病。……

……以后要我们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固结精神。从根本上讲起来，革命事业，是大家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实行，如果不能同心协力，便永远不能实行。所以这次所定的政纲，是本党临时的号令，至少要行一年。在此一年之中，不是要一两位党员去实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实行的。大家共同去实行，便是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就是党员的好道德。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奋斗的方法，在中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各地方的，大家要组织区委员会或各地方委员会，把我们国民党布满到全国。诸君此次不远千万里而来，在此开了十日大会，议决了许多议案，是已经受了奋斗的任务，得了奋斗的材料。散会之后，带回到本地去，应该分给本地的各位同志，教各位同志都要拿这种材料，分途去奋斗。……

这次的大会，是头一次试办，只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办理中央的事务；各地方委员会和地方上的事务，就要大家分头去办理。……

……现在已经是民国十三年，就是国民党在各地方公开奋斗了十三年。因为见到从前的奋斗尚不充分，所以这次要开大会，把全党来改组。从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办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办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天天成功，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宣布到全国的民众，在今年之内，一定可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湘军将领兵士诸君：

本大无帅今天在这地和大家相见，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并且可以和大

家讲话，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本大元帅今天来对湘军兵士讲话，是希望湘军从今天以后，都能变成革命军。诸君听了这次讲话之后，便全体变成革命军，那才不负革命党全体同志的大希望。

什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至少也能够打十个人；大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打破敌人十万人。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敌人，才叫做革命军。

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受满洲人统治，被满清政府征服了两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有革命党起，用手枪炸弹，推翻满清皇帝，打破专制政体，建设共和国家。所以十三年以来，中国的名义上，才有中华民国之称，表现于世界上。那次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便是革命事业。讲到当时的革命党，人数是很少的。满政府在全省都练得有很多的新兵，在各险要的地方，又有满洲的驻防军。革命党推翻满政府，究竟是靠什么本领呢？简单的说，就是靠一个人能够打几百个人。那时候的革命党，因为有那样大的胆量和牺牲精神，所以能够成那样大的事业。

……所以本大元帅要大家以后能够打胜仗，做非常的事，便要变成非常的革命军，像黄克强那次在钦廉打仗一样。如果不然，就是枪好弹多，还是送把敌人，自己没有用处。

讲到战时以一可以当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奋斗的精神。何以要先有奋斗的精神呢？有了奋斗精神，才能够牺牲，才不怕死。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奋斗精神是从何而生呢？是从主义而生。兵士要发生奋斗精神，便先要有主义；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革命目标到底是什么事呢？什么叫做革命目标呢？大家都知道革命党是拿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的。什么是三民主义呢？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我们要明白了这三种主义，才能够干革命事业。

大家都知道中国从前被满洲人征服过了两百多年，我们祖宗都是做满洲人的奴隶，习故安常，忘其耻辱。后来我们为什么能够推翻满清呢？就是因为明白了民族主义，知道自己都是汉人，总数有四万万，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被满清征服了，压迫了两百多年，不能做主人，总是做奴隶。我们祖宗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满清反歌功颂德，说清朝有深仁厚泽。到了后来，全国之内，不但是受满清的压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国、日本诸列强的压迫。便有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民族主义，推究满汉的界限：“为什么以少数的满洲人来统治四万万汉族呢？”“为什么四万万汉族总是应该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做满洲人的奴隶呢？”便发生极不平的思想，渐渐宣传，推广到全国，四万万人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平的。古人说：“不平则鸣。”所以全国便要把这个不平来打平他，用极大的牺牲精神赶走满人。由这样讲来，便知道民族主义是对外国打不平的。如果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地位有不平，中国人便应该革外国人的命。专就满汉而论，因为全国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知道满人和汉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发起辛亥年的革命。后来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义达到目的。

什么是叫做民权主义呢？这个主义的道理，和民族主义是一样的。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国内有什么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军阀官僚的专制，四万万人还是不能管国事，还是做他们

少数人的奴隶。像这样压迫的不平，和外国人来压迫也是一样。所以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提倡人民的权利；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这种不平的专制，和外族来专制是一样。所以对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打不平，便提倡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又是什么道理呢？这种主义是近来发生的。五十年前，不但中国人没有讲到这个道理，就是外国人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讲过这种话。现在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像法国、美国都是从革命而来的，国外无外族的压迫，国内无皇帝的专制，他们的政治，都是很修明的，国家又富庶又强盛，在几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几十年以来，工业发达太过，一切工作，都是用机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织布和一切制造，没有不是用机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广东的韶关，都是走路，再由韶关到广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车。火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也就是运输的机器。用一个火车头，可以运几千人，可以运几十万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难得挑动，如果专用人力去挑，非用几千人和十多日，不能挑到；但是用火车，只要一日便可以运到。所以火车就是挑东西的机器，火车就是一个大挑夫，一个火车头所运的东西，可以替代几千个挑夫。耕田也是一样，织布也是这一样。一个机器做的工，可以代几百人。机器越多，出的物件越多，赚的钱也越多。所以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没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穷。因为机器的生产，故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便发生民生主义。从前说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因为有了机器，生出了极大的资本家，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

诸位将士听到这里，便知革命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很容易明白的。这三种主义可以一贯起来；一贯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为什么要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呢？三民主义成功了，造成一个什么国家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将来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国家，便先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处于什么地位。大家生在中国的这块地方，举目一看，是一个什么世界？简单的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穷财尽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无论哪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之内，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现在中国之内，这种痛苦日日增进，这种烦恼天天加多。我们看到这种痛苦世界，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发生大慈大悲，去超度这种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变到好的地方；把这种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达到这种目的，其责任就是在我们的革命军。我们革命军实行这种责任，把三民主义完全达到目的，中国便可成为一个安乐世界。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顶进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他们国富民强，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国好得多。但是他们国内还有贫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还要革命。他们革命是用什么主义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他们国内已经成功。除英国、美国的革命现在酝酿，还没有爆发以外，现在已经爆发了的是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发生于六年之前，

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

三民主义在中国完全达到目的之后，将来变成一个什么世界，我们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见到，但是把俄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景象来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国人民也是很痛苦的。当欧战的时候，全国加入协商国一方面去打德国，欧战没有终局，国内发生革命，便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对外不帮助协商国去打同盟国，对内推翻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因此列强当时便不去打德国，反移师来打俄国。故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当时革命军竭尽全力奋斗，把所有的压迫都打破了，于是组织一个新国家，叫做苏维埃共和国，现已得英国、意国承认了。所以俄国革命，可以说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所以他们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对于这三种人民便特别优特。……像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推究他们这种幸福，是由于革命而来的，是由于实行三民主义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会，至今还有贫富的阶级。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从前反对我的，是满清皇帝，现在反对我的，是满清留下来的武人官僚；这些武人官僚的专制，就是小皇帝的行为。从前有诸先烈前仆后起的奋斗，便推翻了那个大皇帝。我们现在要继续先烈的志愿，推翻曹锟、吴佩孚这些小皇帝。……这种责任，是救国救民的责任。……我们要担负这样的大责任，做成这样的大事业，非有大志愿、大胆量和大决心不可。故本大元帅今天和湘军讲话，要大家变成革命军，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气和大胆量，变成用一可以敌百的革命军，然后我们的三民主义才能够完全实行，中国将来才能够变成安乐国家。这个能不能，没有别的问题，只问诸位将士今天听了这次讲话之后，有没有决心。故本大元帅今天要求诸位将士的，是要诸位将士在今天立一个决心，变成革命军，共同去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

###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我们拿两国的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外来的满洲人。满清皇帝的威权，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败，当那个时候。满清的国势，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时候的

情形是怎么样呢？俄皇是本国人，又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像这样比较，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然有瓜分中国的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丝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言论，并且实受兵力的干涉。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像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那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如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中国当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什么是叫做革命的基础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



至于现在广东的这些兵士，对先烈的那些行为，还是莫名其妙，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在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要将来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我们现在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处，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既是能够消灭满清，将来富有军

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反三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成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

……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以上演说均选自《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 廖仲凯

一八七八——一九二五

广东惠阳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出生于美国华侨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偕夫人何香凝留学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共同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并兼理财务，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他出任财政部次长兼广东财政厅长。1922年受孙中山委托与苏联代表越飞谈判，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因领导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坚持执行三大政策，于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爱国必先有文化》（1924年3月）是作者在石井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作者谈的是“识字”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唤起工人群众来认识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反动军阀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现实真相，从而明确“主义”，万众一心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立“正式的民主国家”。作者把倡办劳工学校、教工友识字提升到唤醒民众觉悟、改变民众精神素质的高度来认识、来实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同时，这篇演说也充分体现了作者依靠觉悟的工农大众来改造中国的明确信念。整篇演说适应工人听众的特点，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 爱国必先有文化

列位工友诸君：兄弟今日得到厂与各工友见面，非常欢喜。此校之所以要设立，其意思甚长。兄弟闻许多人言及“民主国”与“君主国”都是一样食饭，都是一样纳饷，用不着来理什么“民主”与“君主”这样的说话。都是未曾明白到“民主国”与“君主国”的关系和分别之故。诸君之不能明白“民主国”与“君主国”的分别，就因为你们大家无从来认识。譬如有一块铜片是可以用来制子弹，别人则不知道，只知道是一块铜片而已，你何以知道这块铜片可以做子弹呢？因为你认识到用怎么法子就可以做成一个子弹。别人不知道这块铜能作为子弹，就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法子来做子弹。工友们！我们的民国情形与往日不同呢！即如知道这块铜片能够成为子弹一般，我们明白到现在是民主国家，你们不能明白，因为现在民主国家未曾造成，其理与一块铜片未制成一个子弹的相同。为什么要做一个民主国呢？因为做成一个民主国，然后可以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然后使四万万同胞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国家才可以发达，人民才可以安宁。以前推倒满清，现在我们想国家发达，人民安乐，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

一个国家任由一个人管理，是很危险的。因为任由一人独行独断，一定弄到像历年君主国的崩坏情形一般。满清之所以割地赔款给外人，致令我们还要负上很重的债，不能够还清，这样的情形，自然使国家穷困。国家穷困，一定会亡。这是一个国家任由一个人管理的危险情由。如一个国家的权力，不是放在少数人手上，放在我们四万万同胞手上，国家一定比较安宁。因为

国家所以能存在，一定依赖全国人民来把持住，人人知道把持国家，国家自然发达，人民自然安乐，享太平之幸福。但国家的主权在人民，人民必须具有主义、有精神、有远大眼光，国家才能兴盛。不然，国家必归衰弱。把一个国家变为多数人的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国家，人民又必须能判分是非黑白。一个人民能明白是非黑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识字问题”是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如被无知识的人来做一个主权者，一定弄到国家陷于崩坏情形，这是亡国兆头。求国家发达，而不解决识字问题，是自相矛盾的。自己没有知识，野心者即可操纵专权，则国家仍然归于少数人手上，国家一定不能兴，反要亡国才了结。国家必先解决识字问题，然后可以得到太平。中国之任由少数人来把持，自私自利，不顾群众幸福，到今日这样情形，这就是中国的乱源。我们的眼光要放远大点，袁世凯的野心想把中国放在他手里，传子继孙都是袁家的天下。这样在普通人眼光看去，岂不是袁世凯个人的罪吗？是的。但是我们要要有远大的眼光观察，才能够看得透彻。我就把袁氏做皇帝来解释下去。我们听见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他用钱来买无耻的猪仔议员，使他们不反对他做皇帝；又用钱来买各省的督军，不反对他。袁世凯能得到这样多钱买人不反对他，试问袁世凯的钱由何处得来？这个问题非解答不可。中国自满清失败，海禁大开，至今仍是一个财穷势弱的国家，袁世凯自然不能在中国找到钱来买人家不反对他做皇帝，所以他向外国大借特借，他然后可以得钱给过我国的军阀来捣乱。等我们不能得着一块安乐的地方来谋生，我们谋生困难，工业衰弱，国货不能振兴，外人就借此大输洋货进来，把中国的金钱年年送去他的祖国。这样的侵略，便是叫做“列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想解决此问题，就要先解决识字问题。一个人能够识字，就有远大的眼光，不像“近视眼者”只能见近不能见远。我们既知道中国延长战争，使我们的兄弟不能谋生计，就是军阀。军阀的可以作恶横行，他们背后就靠列强帝国主义者来扶持。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者在后拉线。由斯而谈，我们想得到安享太平，丰衣足食，不日日被军阀来压迫，被列强帝国主义来侵略，更莫怪政府抽捐。政府抽捐不是乱源，因为政府要去打倒勾结列强来压迫人民的军阀，政府要去打倒利用军阀来侵略中国的列强，必定用兵去打，用兵就不能无饷，所以就不能不抽捐。我们想得到丰衣足食，又不被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压迫，又一定要明了主义一致去打倒军阀，一致去打倒列强、帝国主义，所以就要解决识字问题。

常有許多记者问兄弟，劳工教育比较义务教育孰为重要？我说：现在义务学校的训育成材，非十年八年不可。而吾侪现在即须为国家做事，等如许光阴，是没有希望的。故此施行义务学校，比较起来，不及提倡劳工学校的重要。各工友不识字，知识就低。想得到知识，不能不读书。如多听演讲，亦未始非求知识之一法，唯如此机会是不常的。如以为有留声机就可以，留声机是不普遍而且能力甚微的。故想知识增加，非从多阅书报不可。看书、阅新闻纸的收效，比起留声机收效大得多。人类的思想得到发展，都是借文字的功能，能阅书就可因此得悉前人所遗之教训。倘若不识字，事事都要亲眼见、亲耳闻，然后可以知识增加。但一个人是很难得到许多时候与机会，来给我们亲眼见、亲耳闻。况且世界上把人类各民族的寿平均起来，至高不过四十五岁。童稚之年浑无所知，非在二十岁以上，不能去远的地方来求知识。如不识字，则更属困难，无从得知识。所以一个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去得许多地方，而且还有些不能及的。如果不识字，又不用亲见亲闻，知识就

能发达，除非是圣人才可以做到。工友们！圣人是容易得的。几千几万年都不过一个圣人罢了。我中国想希望产生多几个圣人来救中国的危亡，这是不能救中国的。中国不用求圣人，要求工友们大家一致去想，大家一致去想一个方法来救国。我们大家一致去想，但并不要空想，大家想的实际方法，才能救国。倘若大家都是空想的，就误事了。大家能识字睇书，把前人已经想过的，继续想下去；前人想不到的想出来。将人家的知识来补自己的不足。切莫将他人曾经想过而且错的实行，莫像那班呆仔成日空想，若如此就差了。一个人能识字，在工作的方面说，亦得许多知识，可以发明新器；在个人上，不被人来压迫；在国家方面，不致财穷势弱。种种的利益幸福都是由解决识字问题得来。

刚才厂长所说，兄弟前年为陈永善困于本厂，说工友不明主义，所以不想法营救。以兄弟看来，这一层比较的不要紧。现在世界最紧要的就是肚饿。得到饭食才能生，求生就要食饭。怎样才可以食饭妥当呢？这是要有识字能力才可以解决。求一般人免于肚饿，须先打倒不平的现在社会制度。从消极来讲，何以许多人无饭食、无书读呢？要设学校来补救不足呢？其原因在国家里面，社会的制度不平等，遭军阀的压迫，想做生意又不得到安静的地方，想找工来做又没有。做生意又不能，打工又不可，所以就要挨肚饥、挨冷，想读书来增加知识又更加难。所以我们一定要革命，把目前的不良制度推倒。这个问题，是目前最急需解决的。外人能够解决此问题，全世界只有俄国而已。他现在革命成功，对于工人方面，极力鼓吹识字，还有一间“工人大学”来补救。中国不解决此问题，又无饭食，又无书读，内受军阀的压迫，外受列强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痛苦，不止北京一班武人武客之错，也是满清的错，因为满清已经种下此毒很久了。我国的不能办学补救工友的知识，没有经费来开办，就因为外交失败。同人家打，时时都失败，打败时候，就是割地赔款。我们不是欠人的债，不是借他的钱来兴实业、办教育，不过白白赔给过人家的。还不止此，当袁氏打民党的时候，又向外人借债，借三万万，来做皇帝；乱的时候，再借二万万八千万来打。养兵来残杀人民，所以哪里有钱来办教育呢！我工友没有书读，知识又少，于是日做日穷。国家的市政不好，交通不便，不能令国家发达。有铜、铁、煤等，不能运去别省。卖本国的货物去外国，又要受协定关税的影响。外人输入来的货品税微而成本轻，这就是外货平过国货的原因。本国的货运去外国税重，不能平过外人的货，所以我国工业不能振兴，弄到今日经济破产。外人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来侵略，我们想得到饭食，得到安乐，一定要打倒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家要认识，一个识字问题，是这样的重要。

（选自《廖仲凯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 郭沫若 一八九二——一九七八

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作家、史学与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参与四川保路运动。1918年开始创作新诗。“五四”时期他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与郁达夫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创造社”，标举自我，弘扬个性，反抗现实。1924年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倡导文学革命。1926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出师北伐。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古代史和甲骨文研究，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战开始时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并组织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创作了《屈原》、《虎将》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等职。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文艺领域的活动和建树，尤其给世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作为一位兼通政治与文化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一生的演讲应不在少数，但以文字记录并保存下来的却不多。这里选取的两篇都是谈文艺问题的，在时间上前后相隔二十余年，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发展演变。

《生活的艺术化》（1925年5月12日）最初发表于1925年5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艺术》第98期，是作者1925年4月3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演讲稿。此时郭沫若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但他的文艺思想中仍留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明显倾向。当时“创造社”与沈雁冰等人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前者主张尊重艺术、表现自我，而后者则更侧重于“为人生”、反映现实社会。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创造社”的倾向：“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食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这种追求“纯艺术”的倾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扫除文学艺术中陈腐的封建道统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在这篇演说中，作者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这样一种主张。结尾处所说的《歌者》的故事及歌者的诗，正是“纯艺术”观念的典型表述。

《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1946年）是发表于上海《文艺春秋》第三卷第一期上的一篇演讲稿。其时作者的文艺思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口号。郭沫若这篇演讲，是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角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的生动明了的阐发。在这里，作者讲的是“大道理”，而所用的语言却是来自于创作实践的艺术家的生动具体的语言。其中讲文艺史上“为人民”与“为少数人”的文艺之间的斗争、新与旧的更替转化，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富有

启发性。

《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30日）是作者1978年3月30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致的闭幕词。“文革”十年动乱把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推入了绝境，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受到极大的损害。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口号，使科技界和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是全国科技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盛大节日。郭沫若在这篇开幕词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盛赞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对全国的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 生活的艺术化 ——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

今夜的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提到这个题目，各位一定会联想到英国的19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的运动上来。他们的主张就是要用艺术来使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美化的。那很有名的王尔德（Oscar Wilde），他便是这项运动中的一位健将。他曾经穿着很奇怪的服装，在伦敦街市上游行，逗得当时的人们注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不过是偏于外部生活去了。我今晚所说的与此稍微不同。我的意思是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是说把艺术的精神来做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养成一个美的灵魂。

那么，艺术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先从艺术讲起吧。各位都是知道的，艺术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两大类。譬如，绘画所含者有平面，有长有阔（2Dimensions）；雕刻、建筑所占者为立体，有长有深还有深度（3Dimensions），这都是属于空间的。其次如舞蹈、音乐、诗文，是时间上的表现，故属于时间艺术。古时的人多趋重时间艺术，而轻视空间艺术；如希腊的司美的女神有九个，但所管者仅舞蹈、音乐、诗文三种。至于建筑、雕刻、绘画则无神司其事。就是后来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他把艺术分为几种等级。他以所含观念的多寡定它们等级的高下。他的等级是：建筑、雕刻、绘画、舞蹈、音乐、诗文（依次升级，诗文最高）。本来照现代的时空论上说来，时间和空间原是相互关系而存在的，绝对不能划然分开。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这样分别，乃至要勉强的定出高下的等级来，只算得是历史上一件有趣的事罢了。近代艺术已把这种无谓的分别打破了。如英国的裴德（Walter Pater）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上有

---

Dimension，英文，意思是度数或维数，二度或二维，指平面；三度或三维，指立体。

希腊神话中，管文艺的女神有九个，通称缪斯（Mousai）。她们都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其中卡利俄珀（Kalliope）管叙事诗，忒耳西科瑞（Terpsichore）管舞蹈，塔利亚（Thalia）管喜剧，欧忒耳珀（Euterpe）管音乐与诗歌，波吕许尼亚（Polyhymnia）管颂神赞歌，克利俄（Klio）管历史，埃拉托（Erato）管抒情诗，墨尔波墨（Melpomene）管悲剧，乌拉尼亚（Urania）管星宿与纯洁之爱。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著有《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逻辑学》等。

裴德（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通译佩特，英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著有《文艺复兴史研究》

句话说得好：“一切的艺术都趋向于音乐的”。这便是说一切空间艺术打破了静的空间的界限，趋向于动的方面。譬如现代绘画中的后期印象派、未来派、表现派，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在努力表现动的精神。未来派画马不画四只脚要画二十只脚，画运动不画成直线要画成三角形，这都是动的精神的表现。看来，西洋的绘画是由静而动，动的精神便是西洋近代艺术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实在比他们先进了。那很有名的南齐的谢赫，他所创的画的六法，第一法便是“气韵生动”。这便与西洋近代艺术的精神不谋而同。动就是动的精神，生就是有生命，气韵就是有节奏。唐朝的王维，这是谁也知道的，他是个诗人，也是个画家。人们称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过我觉得诗中无画，还不十分要紧，因为诗最重节奏，就是要“气韵生动”。如果画中无诗，那就不成其为真的艺术了。我们说画中有诗，并不是说画中有什麼五言诗、七言诗或四言诗，乃是指画中含有诗意。这诗意便是“气韵生动”。凡是“气韵生动”的画；才是一张真的画，因为艺术要有动的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艺术要有“节奏”，可以说是艺术的生命。何以我们不重视照片而重视绘画？又何以我们不重视报纸上的新闻而重视诗词和小说？其原因就在这里。

从古到今的诗人画家，很多很多，而不朽的大诗人，大画家，却又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呢？那便是艺术的生命不容易把捉的原故。艺术的生命究竟怎样才可以把捉？这实是一件很难说明的事。一般人因其难以说明，便把他归于“天才”。批判哲学的开山始祖康德（Kant）也说：“艺术即天才之作品。”但是天才又是什么呢？是天上落下来的吗？是生来便与人不同吗？近代精神分析学家龙布罗索（Lombroso）说，天才就是疯子！这也和说天才就是“天才”一样，同一莫名其妙。其实天才并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什么疯子，仍旧和常人没有两样，不过我们不曾探求得它的秘密罢了。《庄子》上有段很有趣的故事，我可以抄引下来：

梓庆削木为鐻，见者惊若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木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

---

等。

泛指二十世纪初年继承印象画派并加以变革而形成的新的画派。它强调主观感受的再创造，注重以强烈的色调、跃动的线条和凸起的色块表达瞬间感觉和激动情绪，讲究绘画的体积感、装饰性等。代表人物有塞尚、凡·高、高更等人。

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文艺流派。1909年意大利马利奈蒂首倡，继而传布于欧洲各国和文艺的各个领域。它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强调表现现代机械文明，主张表现艺术家创作时的所谓“心境的并发性”。绘画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画家卡拉、波菊尼等。

谢赫（约479～约501），肖像画家。著有《古画品录》。他提出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等“六法”，作为人物画创作和品评的标准，对后世影响甚大。

苏轼《书摩诘（蓝关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语出《判断力批判》上卷。参见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2～155页。



加手焉。不然，则已。”（《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为笋虞”，鐻字就是这个虞字。梓人即雕刻师。笋虞是钟馨之架，横柱曰笋，竖柱为虞。上面刻有虎、豹、飞禽、龙蛇等形象。）

这一段文字，我以为可以道尽一切艺术的精神，而尤其重要的，便是其中的“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这几句话。这便是天才的秘密，便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是能够置功名、富贵、成败、利害于不顾，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自然会成为伟大的艺术，他的自身自然会成为一位天才。所以我说天才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疯子，他并没有什么秘密。他的秘密就在前面说过的这几句话里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天才即纯粹的客观性（Reine Objektivität），所谓纯粹的客观性，便是把小我忘掉，溶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

艺术的精神就是这无我，我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化”，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时常体验着这种精神！我们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先，总要先成为一个人，要把我们这个自己先做成一个艺术！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发而为画，发而为诗，自然会有成就；即使不画画，不做诗，他的为人已经是艺术化了。无论政治家、军人或其他，倘若他们的生活都具有艺术的真精神，都以无私无我为一切生活的基本，那么这个世界便成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了。至于艺术上的技巧，如诗之音韵、画法之远近，音乐声调之声低，人人都可以学习得到，但也当以无我的态度进行学习。

上面唱了一大篇的高调，各位听得很吃力吧。现在我要再唱一点低调了。德国大诗人歌德（Goethe）有篇诗叫做《歌者》（Der Sanger）。这是一篇小型叙事诗。那诗里是叙述一个国王一天坐在堂上，听见外面有个歌者，唱得非常动听。于是便把他招至堂上。王的堂上非常的壮丽，好像今天在此地一样，有雄纠纠、气昂昂的男士们，有美貌的女士们。歌者见了，赞颂了一番，于是闭着眼睛不敢仰望那堂上的众明星，便调好声音高唱。他唱完之后，堂上的听者皆被感动，王便赠他一只金杯作为报酬，他却辞谢不受。他说：“你把这杯赠与武士吧，他们能在疆场上为王杀敌；你把这杯赠与财政大臣吧，他能为王生息再赚几个金杯；至于我呢？”他说出了下边的几句诗。我觉得很好，我今天晚上所讲的精髓便在这儿。我把它念出来，同时作为我今天晚上的讲话的结尾。

Ich singe, wie der Vogel singt,  
Der in den Zweigen wohnt;  
Das Lied, das aus der Kehle dringt,  
Ist Lohn, der reichlich lohnet.  
我站立在这儿清讴，  
好像只小鸟儿唱在枝头；  
歌声进出自我的歌喉，

---

语见《庄子·达生》。

参见叔本华《文学的艺术》。人文书店 1933 年版第 197~199 页。

“即是无我”一句，最初发表时为。既是没我。——即是没有丝毫的功利心（Disintere—stedness），这没功利心便是艺术的精神。

这便是我无上的报酬。

（选自《郭沫若全集》（15））

### 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

文艺有新有旧。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时有些错综。有新的内容而有旧的形式，也有旧的内容而有新的形式的。像人一样，衣服尽管穿得摩登，而仅有一种陈腐的思想，那就是旧内容新形式。倒不如反过来好。外表虽旧而思想很新，倒很值得欣赏。但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最好是内外都合乎新的标准。文艺是反映生活的，要反映当前的生活，要批判今天的生活。它要求有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这就是今天的文艺。

新文艺，一定要有今天的知识。过去的诗人在杜鹃的叫声中赋予以怀念故乡的情趣。一般说杜鹃的叫声是在喊着“不如归去”，还造出了一些传说来美化它。但在事实上杜鹃鸟是一种懒惰的鸟。它自己不砌巢，并没有家乡。它下蛋在黄莺的巢里，让黄莺的母鸟替它孵化、哺喂。鹃雏比莺雏大，一经孵化后把莺雏挤出巢外饿死、冻死，独占着义母的抚育。所以这杜鹃是一种法西斯式的鸟类。到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不好再以杜鹃的啼声来表现思乡的情感了，今天的诗人，要以今天的水准来表现。

又像雁鹅，也是诗中常用的。诗人们特别同情孤雁，事实上那是在同情落伍者。雁为了争取时间的关系，鼓足最大的劲头飞行，因而飞得很整齐划一，这便形成了所谓“雁阵”或者“雁行”。但如果有一只雁劲头不够，它就要落伍了；其余的雁鹅为了免除累赘，便要把这落伍者立刻抛弃，甚至啄死，毫不慈悲。

新的作品非但要有新的知识，还要有新的感觉。过去，写到山，便一定是青山。水，一定是绿水。这山和水是死的，事实上山不一定青，水不一定绿。我们今天一定要有新的直觉的印象，把它固定下来发生新的感觉作用，中国的旧诗人，因中国西部多山，河流是往东流的，所以习惯着说“日落西山水东流”。但如环境不同，西边不一定有山，而水是可以南流、北流、西流的。我们应该抛弃一些陈腔腐调、照实感写。

新的思想是最要紧的。写作的动机，作家的生活立场、思想，是艺术作品中真正的灵魂。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式的文艺，封建思想很浓厚。它的对象是上层阶级，对于当时有权势的阶级的歌功颂德。在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正相反，不应再只看到上层分子，不能再以少数人为对象，应当是以社会的真正主人作为对象，即一般人民大众。文艺作者应当向下看，为人民大众歌功颂德。今天的文艺作家应当歌颂劳动人民，表达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希望。这是新文艺和旧文艺的分水岭。

无论哪一个民族，原始时代的文艺，都是由人民大众集体来创造的。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可是有它的重要性。本质上讲，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分化了。分化的时候，一部分向上，一部分向下。上层的工作者即产生贵族文学，下层的工作者即产生平民文学。留在民间的文学是被当代的特权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土式的。其实这倒才是真正的文艺正统。那些上层阶级只是把文艺当作少数人的玩弄品。这批

判并不是在今天才开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断不断地在进行着批判。为人民的和为少数人的文艺作品，不断不断地在进行斗争。每逢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由民间上台，因而每每带来些民间的东西。文艺正是这样，每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新的气氛产生，是由民间带来的。但民间的东西一登庙堂，就跟新的统治者逐渐就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样，新起的文艺也成了贵族的文艺，对于历代作家，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批判。倘使你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大众说话的你便享有身份。如像屈原、杜甫。倘使你只是作为上层的弄臣，你便失去身份。如像宋玉、扬雄。是否为人民服务？这真可以作为新旧的标准。今天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种种新的知识和感觉，主要的还要有新的思想，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要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新文艺的最新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的文艺既要以人民大众为对象，我们就应当向人民大众学习。有人怀疑：许多知识都要向专家们请教，为什么文艺却应当向人民学习？我们受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熏陶，眼睛总是向上下向下，一般人不知不觉把人民看不上眼。其实文艺既然是人民生活的反映，那末对于一般人民的生活，人民便是专家。例如你要代替农民说话，代替工人说话，你就应当向一般工农老百姓去请教，去学习他们的生活，除掉工农之外，哪儿还有工农生活的专家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19世纪法国一位著名的画家叫德勒珂罗亚，气魄很大。他喜欢画马。有一次在巴黎的展览会上，大家都称赞他所画的马。可是有一个衣冠不正的人，表示摇头。画家就上去向他请教。他说：“我是一名马夫，对于马的生活很熟悉。在马飞跑的时候，口角上有白沫，但是你的奔马却没有白沫。”画家听了很佩服，立刻把展览会中止了。他准备重新向马的真实生活去学习。这是具有教育的故事。

在今天，我们要从事我们的文艺工作，一定要把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铲除，还要铲除买办阶级的意识。什么月亮也只有美国的好，完全是狗屁！要这样才可以满足今天的人民要求和时代的需要。我们不仅不应该轻视人民，还要礼赞人民，歌颂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向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

将来新文艺的发展可能有几种新的途径：一种是“五四”以来的文艺形式，受外来的影响多些，油画、雕塑、音乐特别显著。我们不应该排外，要继续吸收外来的好东西，而使它民族化，为今天服务，为人民服务。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掘和发展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旧有的形式，在形式上加以改进，并盛入新的内容。许多歌谣和地方戏剧是应该重视的。在今天应该把一向为人民服务的形式加以整顿，使它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两种途径都是我们应当发展的。可能还有第三种途径，便是把新旧融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民间形式。总之，今后的新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以人民大众为前提。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是人民的世纪。还有，文艺创作也是艰苦的工作。要创

---

宋玉，战国时楚国文学家。生平事迹不详。作品多亡佚，唯《九辩》最为可信，其他如《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也有人认为是他的作品。

德勒珂罗亚（Eugene Delacroix, 1798 ~ 1863），通译德拉克洛瓦，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自由领导人民》（又名《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里》等。

作一种纪念碑式的巨著，必须要把全生命灌注下去，要把全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

（选自《郭沫若全集》（16））

### 科学的春天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所有为而不能，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者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看到今天这种喜人的情景，真是无比感慨和兴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敬爱的叶副主席的光辉诗篇，完全表达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

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恩格斯在谈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更加需要大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巨人。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

科学是讲究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我祝愿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在新的长征中为我国科学事

业建立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发奋图强，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你们是赶超世界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效率。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祝福全国的青少年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无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选自 1978 年 3 月 31 日《人民日报》，已作删节）

## 邓中夏 一八九四——一九三三

湖南宜章县人，我国革命职工运动的领导者与积极参与者。早在五四运动时，当时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就开始精心研究劳动问题，并参加了北京的工人小报《劳动音》的工作。1920年底，他到长辛店筹划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翌年初，就组成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北方铁路工会的雏形。此后他运用长辛店的经验，指导和帮助天津、唐山以及北方各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奠定了北方职工运动的基础。1921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他是负责人之一，在翌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他任书记部主任。在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中，他参加和指导了多次重大的罢工斗争，如1922年8月长辛店罢工，10月开滦煤矿罢工及1923年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党内机会主义者提出了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观点，邓中夏严厉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大胆地提出陈独秀的名字加以批评。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到来之际，他参加了组织和领导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继而又领导省港工人阶级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邓中夏是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最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后，他每次都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8年夏，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在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他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留驻莫斯科。在此期间，写下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1930年他由莫斯科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特派员第二军团政委，1933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邓中夏长期从事中国工人阶级争取解放运动，多次参加和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为唤醒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号召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演讲，这里选出的两篇演讲辞即是一例。

《在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7月26日）是五卅惨案后，邓中夏在广州香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一次重要讲演。1925年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生死攸关的一年，这一年先后出现了上海纱厂工人反日罢工斗争，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五卅大惨案。当时一方面举国上下工人阶级群情激奋，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革命形势风云变幻。邓中夏力推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在这篇讲演辞中开篇就以高屋建瓴的态势阐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形势要点，从1922年5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工人运动遭受了巨大挫折，尤其是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下去后，造成了北方工人运动由公开转为秘密状态的艰难处境。可是经过工人阶级坚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1925年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工人运动从保守状态变为进攻的形势。邓中夏详细地向代表们通报了大会情况，这是全国工人大团结的一次盛会，针对广州与香港两个工会不和有悖于大会宗旨的情况，邓中夏条分缕析地分折了个中原委，严肃地指出了工会内部内讧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邓中夏还娴熟地运用自己多年领导参加工人运动的工作经验，分析了工会产业组合与职业组合两种方式的优缺点。他强烈要求省港工会求同存异，消除隔阂，尽快联合起来。演讲以“联欢者，联合则欢也；反面即是离苦，分离则

苦也”的大声疾呼戛然而止，令听众闻之动容，思之振奋，有着极强的感染力。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联席大会上的演讲》（1925年10月3日），是邓中夏又一次对广州香港两地罢工代表会议的重要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邓中夏形象地将香港政府比喻成纸老虎，一再重申工人与商人团结的重要性，提出工人与商人联合之时，便是中国恢复自由平等之日。演讲言简意赅，有的放矢，是一篇有内容有气势的演讲。

### 在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演说词

诸位工友：

今天省港工友开联欢大会，是很难得的，兄弟很高兴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形报告各位知道。全国劳动大会已开过了二次了，第一次是前三年的五月一日，第二次是今年的五月一日。为什么隔三年才开呢？我们知道，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共同压迫的国家，我们时常受他的摧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决议翌年在汉口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幸翌年便发生最可痛心的“二七之变”，京汉工友为了要成立总工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不准，京汉路举行大罢工，为争自由而奋斗，结果被汉口英国帝国主义唆使军阀吴佩孚打灭了。是役被枪击毙四十余人，斩首数人，法律顾问施洋同志亦遇害。从此次罢工以后，京汉及武汉的工会完全被封禁，北方各铁路各城市亦连带受其影响，由公开变为秘密。我们经过二年之严重压迫，到今年才能继续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去年冬北京政变，军阀吴佩孚曹錕倒了，曹吴倒了不算什么一件事，就无人压迫我们了吗？不然。不过曹吴倒了，（一）新兴军阀的势力尚未稳固，无暇压迫我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在政治上的势力也发生变化，无法压迫我们；（三）国民运动的势力却高涨起来了，中山先生北上更使北方的民众觉醒。有此三因，我们工人阶级于是利用时机，重振旗鼓，又由保守的状态而变为进攻的形势了。北方自北京政变后，今年春北方铁路工会完全恢复，上海纱厂发生五万人的大罢工，北京武汉山东各处也发生罢工，证明我们到了复兴时期了。但各自为战，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全靠工人大联合，共同作战。第二次劳动大会就应时而生，就是为了完成工人阶级大联合的目的。这次大会开了十多天，各重要产业以及各城市都有代表参加，总共到代表二百七十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五十四万。这次大会是很有成绩的，通过议案十三个，个个都是重要而切实的。这次大会的几个大结果，一是全国工人大团结，组织成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二是工农兵大联合，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阶级一致起来，共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中国工会一致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一种策略，我相信人家都很赞同的，因为他实在是解放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出路。其中还有为了广州问题与香港问题的两个决议案，决议的意思是第二次劳动大会听了香港广州的工友代表报告，工会很不统一，所以要混灭门户之见，统一起来。但从大会到现在已二月了，仍未能实行，希望今天的会是实行决议的第一步。如果不去实行，决议案不过白纸写成黑字，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我要不客气的将不能统一的原因说说：广东最不好的最可痛心的现象，就是工会与工会之争，如土木建筑之争，茶面粉之争，锦纶

机织之争，油业机器之争，中山县鲜鱼之争，果菜之争。为什么工会与工会发生这么多的争执呢？第一原因，是工人不明白工会的组织，第二次大会明白规定工会是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斗争的团体，不是工会内自相争斗的。其组织原则如下：

（一）凡新式产业，须绝对采用产业组合；

（二）小工厂手工业，可酌量采用职业组合。

平心而论，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何以呢？如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车务、工务、养路各处的工友，都加入铁路工会，这就叫做产业组合。若以职业分组，则铁路上之木工、电器工、机器工、与轮船纱厂船厂之木工电气工机器工，各组织木匠工会、电气工会、机器工会，乃叫做职业组合。我们比较一下，如系产业组合一致起来罢工，一定可致资本家的死命，职业组合则因势力之分散，就不可以了。不过职业组合，也有相当的用处，如小工厂手工业，他们若是每一个机关组织一工会，力量就小了，一定要联合起来，按地方组织一工会，如理发工会，铁匠工会等。试问几个建筑工会为什么不可联合，茶居面粉为什么不可联合，这都是因为不明白组合的道理。第二原因就是广州有政治自由，工人谋自由组织工会，资本家无可奈何，所以资本家只好利用或另组别的工会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工会内的领袖，论理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工人谋利益，不要为谋自己个人的利益，然而有些工会领袖，却不是这样，专门为了个人地位，用工会打工会了。第三原因就是无工会统一的机关，如是一班官僚从中偏袒播弄，引起工人自己打自己，前几天工人打死自己工人，这是如何不幸的事，如果我们工人被资本家打死，是很快活的，现在却自己打自己，同是被压迫阶级的苦兄弟，而自己打起来，无怪资本家在那里狞笑道：“请看！神圣打神圣，好呀！”工友们！你们听了惭愧不惭愧？痛心不痛心？现在有二件事要希望各位不可忘记的。

第一，广州有政治自由，我们要更加努力去整顿我们的组织，统一我们的组织，你们想北方各地工友，没有政治自由，是何等痛苦呵？你们为何还要自暴自弃。

第二，罢工是对付敌人的，今则以罢工对付自己兄弟，不要被全世界的人笑死。

最后，我希望从今天起，大家彻底觉悟，痛改前非，整理工会的组织，促成工会的统一，然后今天的联欢，是永远联欢。联欢者，联合则欢也，反面就是离苦，分离则苦也。工友们！大家努力！我在此高呼敬祝：

广州工会统一万岁！

香港工会统一万岁！

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原载《省港工人代表联欢大会特刊》）

###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 各界联席大会上的演讲

今天兄弟乘此盛会，亦拟说几句话。此次反对帝国主义罢工实力的宏大，无论是谁，都已知道。即才来省之港商代表，亦都知道。兄弟今日以同胞的资格，与港代表说几句话。我们很欢迎港商同胞到这里来和我们联络一齐救



国，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得的，其中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同是中国人，应该同爱中国，方可以恢复国家自由平等的地位。在此时期，我们的势力，已非常发展。现在我们有三个大目的：第一是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二是解决上海、沙基等处的惨杀案；第三是解除我们目前的痛苦。现在我们已有了办法，对于第一、第二两项，已交托北上代表团联络全国人民共同做去，这当然可在北京提出解决。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省港罢工的条件，罢工以后非独工人受尽痛苦，即商人亦然，但是有什么方法使省港罢工工人解除痛苦呢，那就要得到这个条件的胜利。今日到此，已可见得各界同胞之切实拥护这个条件，我们又很希望香港代表能够召集大会一致来拥护这个条件，如今日之情形一样，我以为这就是港商代表之第一的任务。其次我希望港商代表回去之后，应该压迫香港政府承认此条件，如果香港政府不承认，则我们另有对付的方法。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最惧怕的就是我们的大团结，所以港商代表回去后，要很好的团结商界同胞，一致进行，开一示威大会，压迫香港政府承认我们所提出的条件。或者有些人觉得在香港政府压迫之下，不易做到这地步，其实不是的，只要我们同胞能团结一致，便可以做到。香港罢工的工友，亦是如此。我们已经有了绝大的决心，所以便不恐怕他，而有此次的大罢工，弄得他们无法可以压迫我们，港代表明白了上述的意思，则可大着胆放心做去。我们知道，工人有很大的势力，即商人亦有与工人同等的势力，在此反帝国的罢工中，已表现的很明了了，所以很希望港代表回去之后，亦设法表现出这种势力来。香港政府的内容，我们已经很明白，我们无庸去重视他。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以前英国商人曾请其政府派兵来压迫我们，但到了现在仍不能做到，那么这个纸老虎被我们看穿了。他们的本身，如各处殖民地，亦迭起革命了，所以这个纸老虎，并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商人联合的力量很大，若工商联合起来，则其力量更大，将所向而无敌。所以很希望港商同胞，能联合以压迫香港政府，如果香港政府复敢压迫我们的港商同胞，我工人全体当出死力以为帮助。我们知道港商同胞以前所受的痛苦太甚了，这些痛苦，不敢向纸老虎诉说，只有自己暗中忍受。现在应该改变方针了，即要向这纸老虎反抗了。港商本有很大的力量，务须利用这个力量以压迫香港政府，此即是兄弟小小的意见，敢贡献于我很亲爱的旅港同胞。我们高呼：

工商联合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选自《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恽代英 一八九五——一九三一

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在武汉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利群书社”和“共存社”，传播马列主义，团结进步青年，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者。1926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受到打击，被调到上海沪东区工作。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1931年4月在南京英勇就义。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青年工作、生活、成长的关注是他从事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选编的有关他的讲演就是他关心青年成长的一篇著名讲演。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1926年5月）是恽代英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时，到岭南大学视察的一篇发言。1926年是国民革命高涨的年代，也是国民革命处于激变的前夜，作为共产党的一名领导干部，恽代英十分注重青年人的历史作用，这从讲演的题目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恽代英在讲演中对耶稣基督、孔圣人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而是在充分肯定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应有地位，以及个人人格的难能可贵，接着又指出其思想体系中的最大不足是不鼓励人们直面罪恶，反对罪恶，这无异于给罪恶之锁链添上新的环节。恽代英形象地把孔子学说宗旨归结为“劝”，把基督教义归结为“骂”，而把革命党的目标归结为“打”。历史证明，恽代英的结论完全正确，1924、1925年党内部分领导人的“劝”与“骂”政策招致了汪精卫的血腥屠杀，而1927年南昌起义的“打”则打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

今天承岭南大学欢迎之便，使我与岭南大学各位教员先生与各位同学有一个谈话的机会，这是很荣幸的事情。这对于岭南大学虽然以前并不知道学校中间一切详细情形，但是我可以说我实在很久便有了一个很好的映象。我并不知道史坚如烈士便是岭南大学的学生，我脑筋中有一个岭南大学是从五卅运动时候起。亦许有人疑惑岭南大学是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有帝国主义关系的，但我却很注意岭南大学，我相信在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间，一定有很多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因为在五卅运动中，就我所知道的，在这个学校不但有一个教员一个同学为反帝国主义在沙基牺牲了性命，并且有许多外国教员先生为了与我们打抱不平，在香港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许多恶劣待遇，这表明岭南大学与其他教会学校绝对不同、不但一般中国的教员和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中国教员和学生不同，便是外国教员先生亦是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在中国中部北方一般教会学校中做事的人，怕我们如怕蛇蝎一样，他们要用种种手段妨害我们，使我们进不了他们的学校，永远没有和他们学校中的同学相互谈话的机会。但岭南大学因为与他们绝对不同，所以不但怕我们，并且欢迎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宣传的机会。我今天能在这样

一个表同情于反帝国主义的岭南大学讲话，自然是再高兴没有的事情了。

人们彼此没有见过面而谈过话，彼此之间常常不免有一些隔阂或误解。譬如我来到岭南大学的时候，我未曾听见岭南大学教职员先生们为我解释学校内部情形，我终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我总怀疑岭南大学仍旧不免有许多普通教会学校的弊病。但自从我听见他们为我们解释的话，我便更明白你们学校的真正情形了。我们亦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便以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稣，不尊敬基督教徒与他们所办的教育慈善事业。其实这许多是误会。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今天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不妨把我的真正态度说与诸位听听，以免除大家的误会，并且可以提出我的意见，请诸位加一个批评。

我的意见，决不轻看耶稣的为人，我相信耶稣是古犹太的一个“圣人”，像孔子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圣人”一样，而且我相信耶稣实在有许多超过孔子的地方。至于教会中人，我确亲眼看见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认我自己实在受了教会中好人的若干影响，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国先生们个人的好意思。

为什么说耶稣是超过于孔子的圣人呢？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满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类的圣人。他生在春秋的时候，看见各国诸侯不讲道理压制人民，各国之间又时常发生战争，伤害许多性命，扰乱得全世界都不安宁。他因为学了一些古先圣王的道理，知道天下之乱都由于为人君的不存仁心，不行仁政之所致，于是他便奔走列国，向那些人君宣传，今天见齐景公，明天见卫灵公，一个地方没有将席坐暖，便又爬起来跑到别一个地方，可怜他一直跑胡子头发白的时候，除了每到一个地方混得几餐饮食临时混得几个盘费以外，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他老人家又跑了回来，删诗订礼，还希望在他未死以前，做几部好书，以便后之人君或有能采取其学说以行仁政于天下的。像孔子这样诚恳勤劳，为人类做事的人，我们如何能够不推尊他为圣人呢？不过孔子有一种很大的缺点，便是他看见这些不仁之君，不知道到人民中间去宣传组织人民，只知道去找那些人君，须知那些人君没有民众的势力在背后监督督促，专想靠讲什么道理以劝化他们，是不会有有什么功效的。孔子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生只是钻烟囱。不过他老人家精神很好，刚刚从这一个烟囱里钻了出来，又钻进别个烟囱里面去，周游列国，钻遍了列国的烟囱，到了七十岁左右跑回鲁国仍旧删订了许多书，要后世他的门徒继他的钻烟囱的事业。这一方是他的愚笨可怜的地方，然而亦是他的精神不可及的地方。到了后世他的门徒，便更糟糕了。他的门徒读了他所删订的书，却比他聪明狡猾，知道像他那样钻烟囱，是划算不来的事情；同时他的门徒多半亦没有他的名望资格，可以随便到各国谒访人君，因此他们学了孔子的书，完全不去钻烟囱，只知道拿那书中的话做文章考秀才举人为他们进身之阶，同时又拿这去说与农夫工人听，表示他们的博学多闻，于是帮助一般君主压迫这些农夫工人，这些农夫工人还认为这是孔圣人的道理，不敢反对他们。所以孔子还只是钻烟囱，他的门徒却成为一般人君的走狗了。

耶稣的仁慈想救世界人类，与孔子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却不像孔子那样钻烟囱。孔子对于压迫人民的人只知讲劝化，所以他总是跑去见那些国君，常时与他们讲话；耶稣则不然，他并不跑去见什么人君，他有些像我们现在的革命党一样，好接近宣传民众。他对于压迫人的人，不只是用劝化的方法，

他并且骂他们。照《圣经》所说，他到神庙中间去的时候，看见有些商人在庙中做生意，他便骂他们，将他们摆的摊子丢到庙门外面去了。在《圣经》中又常常看见他骂那些犹太的祭司与收税吏，这都是直接压迫犹太人民的人。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很有些革命精神。他这种勇敢的行为，所以使他后来遭杀身之祸。然而这便是孔子所万万不能及他的地方了。不过耶稣亦是与孔子一样，他们讲了许多道理，两千年收了许多门徒，但是他们通通没有能够救世界。耶稣仍旧与孔子一般，不能够救世界，为什么我说耶稣是超过孔子的“圣人”呢？这中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便是因为耶稣自身仍旧有一种缺点，他虽能够骂那些压迫人的人，然而那些压迫人的人是不会因为怕他骂便改悔过来的，你越是骂他们，他们越是恨你，想谋害你，我们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只有一个法子，便是将一切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来打倒他们。换一句话说，要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孔子的“劝”的法子是不中用的。耶稣的“骂”的法子亦是不中用的，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我们革命党“打”的法子。我们革命党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天天干打倒这些东西的工作，我们与孔子耶稣不同的地方，便是不靠“劝”亦不靠“骂”，对于这些反动的势力直接了当的打倒他。孔子耶稣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圣人”的法子是都失败了的，所以这便是他们都不如革命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耶稣的门徒亦与孔子的门徒犯一样的弊病。他们看见耶稣爱骂人以后遭了杀身之祸，所以他们便不肯随便骂人了。他们学了耶稣的道理，既不去劝化那些压迫人的人，亦不敢骂那些压迫人的人，他们亦学孔子的门徒一样，只知拿这些道理去对一般农夫工人讲，去愚弄恐吓这些可怜的人。譬如现在基督教徒对于帝国主义军阀乃至一般土豪劣绅，谁能有耶稣那样勇敢的精神，当大众骂他们呢？岂但不敢骂他们，并且无论什么事情还要请肖耀南孙傅芳等贼酋提倡捐助，以为荣耀。耶稣的道理遇着这种门徒，自然亦便糟糕了。

我见到基督教徒中虽然确实有若干好人，然而这些好人对于中国做不出什么切实的事情。教会里正在布道祈祷的时间，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在拘捕杀戮，或者在压迫苛待中国平民。这些教会中的好人，既不能劝止帝国主义军阀残暴行为，他们又怕得罪帝国主义军阀，不敢提倡而且不愿赞助中国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行动。他们明明看见中国平民被帝国主义军阀踏在脚下，但他们老守着和平忍让的教训，向践踏在帝国主义军阀脚下的中国平民宣传和平忍让的道理。这样子下去，中国平民倘若完全相信了他们的宣传，不要永远被帝国主义军阀践踏一世，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么？我为不忍见我们中国同胞这样被人践踏，所以反对基督教。但是我要申明，我并不是说基督教徒中间没有许多好人，不过这些好人因为相信了基督教，自己不革命而且亦劝人家不要闹革命的事情，天天教人家礼拜祷告，引诱许多人脱离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路线。这是我觉得可惜，亦是我所以不得不反对基督教的原故。

外国先生在中国办学校，有的人要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些办学校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所以主张取缔外人设立学校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外国先生是爱他们本国的，他们为中国人办学校，一方固要为我们中国人谋幸福，然而一方亦决不愿他们所教育的中国学生反对他们的本国。所以英国人办学校，一定鼓吹中英亲善；美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美亲善。这决不是外国先生主观上对于我们有什么恶意，故意欺骗我们；而且他

们所鼓吹的国际亲善，亦不能说是不应当的道理。为什么中国民众与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不应当亲善呢？不过有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对于英国民众美国民众虽绝对应当讲亲善，然而对于英国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加于我们的压迫，我们却必须要毫不迟疑的打倒他。外国先生劝我们中英亲善，中美亲善，是很对的。不过可惜在他们劝我们讲亲善的时候，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者同时却正在侵略压迫我们。这些外国先生因为爱国，不愿反对自己国里的人，所以亦不反对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并且他们亦知道若反对了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但似乎非爱国之道，并且恐将来自己回不了本国去，至少以后再不容易在本国那般大人先生们面前募捐盖造学校教会。因为这些外国先生爱国，因为他们还想有回国的一天，因为他们还想募捐盖造学校教会，于是他们不但要我们对他们的民众亲善，而且要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亲善，而且不愿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亲善。他们在中国办了学校，在学校内对于学生，只讲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对于我们怎样“好”，把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如何黑暗惨酷压迫我们的行为隐瞒到一字不提。若是学生在别的地方知道了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要起来反抗，他们还要靠着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来压迫我们的学生，或是开除，或是解散学校。我以为在我们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虽然根本并不是坏人，然而我们中国青年多一个人进英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多一个人进美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外国人办的学校越发达，便会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越少，便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损失。有人说外国先生在他们国，捐来了许多钱，盖造了许多洋房子，亦有许多难得之处。这些话自然是很对的。不过这些钱从外国送到中国来的越多，我们中国民族精神消磨了的亦便越多，帝国主义的捐款，好比是购买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代价。我并不是说在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都不是好人，无论他的本意是怎样的好，这种学校对于中国青年的民族精神总是有绝大妨害的。

今天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在岭南大学发表了我这一篇意见。我对于岭南大学，只是还有几个希望：第一个希望，便是还要在学校内提高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办理岭南大学的虽然亦有几位美国先生，我就沙基惨案时的事实看来，我相信这几位美国先生一定是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同志。至于中国先生与全体同学，自然更是反帝国主义的同志，无待言了。我愿意勉励岭南大学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的，便是，我们应当有更高的反帝国主义的热度。我们不但要预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亦应当预备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相信美国的人民确实是我们的好朋友，犹如日本的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各种手段压迫我们，亦正与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岭南大学一定要与别的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不同。无论什么帝国主义者，一定都要反对。我们虽然受了美国先生的教育，然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仍旧必须加以极严厉的反，这并不是对不住美国先生，只有能够这样，方可以证明美国先生来办校，完全是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为要欺骗中国人，使大家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而且我还要说，不但受美国先生教育的同学应当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并且诚心诚意欢迎美国先生们，下一个勇敢的决心，把耶稣痛恶恶人的精神拿出来，与我们一块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可以令我们中国人放心，知道外国先生来办学校，亦有些人并不一定是帮助他们本国的

帝国主义的。

还有一层，便是希望岭南大学能够把圣经礼拜等功课完全取消了，不要拿这些神话迷信扰乱我们青年的脑筋，虚耗我们青年的光阴精神。我们今天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需要努力宣传组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一天叫他们去听那些把两条鱼五个麦包散给几千人的传语，而且要他们闭着眼睛祷告上帝，这有什么用处呢？基督教徒祷告了两千多年，不看见将世界祷告好了；反祷告出这多帝国主义军阀出来。今天要我们青年祷告，再祷告三年五年，帝国主义军阀就不压迫我们，老虎就不吃人了么？对于老虎只有“打”之一法，祷告上帝，上帝哪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做反对基督教的宣传之时，有些基督教徒就说，信教自由，不能干涉的。不错；我们并不干涉人家的信教自由。但是既然说信教自由，为什么在学校里要强迫人家研究圣经，祷告礼拜呢？我们中国今天的青年，要去革命，要学习革命的知识技术，要学习革命的生活，所以我很痛心有许多与外国先生有关系的学校，强迫许多不愿意的青年，要他们做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情。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亦希望岭南大学的先生们想一想。话说得太长了！

总结起来，我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很感谢岭南大学今天的欢迎会，我们希望岭南大学的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要永远做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好朋友！

（选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选》）

## 鲁迅

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02年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回国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等地任教。其间他发表了猛烈抨击封建主义的小说《狂人日记》，并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五四”运动前后，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转赴上海。这期间，他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左翼作家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936年10月病逝于上海。

《无声的中国》（1927年）是作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做的一篇演说。当时北伐军正进逼南京、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在酝酿之中。作者在演说中抨击了已失去生命力的衰朽的“古文”或“文言”对国人思想及其表达的禁锢；深刻地揭示出僵死的文言与腐朽的封建文化，新兴的白话与文学革新、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号召青年们勇敢他说话，将没有生气的“无声的中国”变成生机勃勃的“有声的中国”。

《革命时代底文学》（1927年）是作者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说。作者从反映论的观点说明了革命时代文学发展的规律：革命前有鸣不平的愤怒的文学；革命后有“讴歌”与“挽歌”文学；革命使文学趋向于“平民文学”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作者似乎对文学对于社会、对于革命的积极的反作用持一种否定态度，甚至干脆说“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这实际上表达了对那些肤浅虚浮、贴着“革命”标签的“读书人”的文学的一种失望和轻蔑；同时也是面对以真枪真炮从事革命的军人听众，流露出对“实地的革命战争”的真诚钦羨，鲁迅在自己的一生中，恰是以文学作为匕首和投枪，向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是一篇谈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演说。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文学艺术与政治、艺术家与政治家之间永远处于一种互相冲突的状态。此时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尚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他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共同规律：一切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总是与表达广大被压迫人民呼声的文艺为敌的；而一切剥削阶级，在他们还是一种新兴的进步阶级、尚处在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上升阶段时，虽与表达人民呼声的文艺有暂时的一致，但一旦它们处于统治地位，便很快转而压迫人民，也压迫人民的文艺了。中外历史均可证明这一点。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则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要解放全人类，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与表达广大人民情感意志的文学艺术虽也可能出现矛盾，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要对“文艺”、

“文艺家”作具体的分析，并不是一切文艺、一切文艺家在一切时候都是代表着社会历史进步的要求的。所以，对作者在演说中两次提到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有的曾为革命出力的文学家自杀的例子，是不能简单地用“真正的革命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的宿命来解释的。在这篇演说中，作者还给“革命文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兆的都可说是革命文学。”由此可知，作者并非认为革命文学对于革命的社会实践没有作用，而是认为它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的作用是在于用“前进的精神”、用对旧制度灭亡的预言来动摇旧社会的精神秩序，从而唤起人们的觉醒。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0年）是一篇系统陈述作者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存在的问题及其今后发展战略的演说的演说。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加入者有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沈端先、冯雪峰、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等五十余人。“左联”的成立标志着文学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左联”内部情况复杂，一些左翼作家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种种偏向。鲁迅尖锐地批评了三种偏向：脱离社会斗争实际的偏向，对革命抱着浪漫幻想的偏向，认为诗人、文学家高于一切人的偏向。并指出，如不纠正，“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对于“左联”今后的斗争，鲁迅指出：必须持久地、坚决地对旧社会、旧势力作斗争，应当扩大统一战线，应当造就大群新的战士，应当有坚韧的战斗精神。这些思想对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 无声的中国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

指英语“张”或“章”的发音。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不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和平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旦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

---

指 1900 年义和团反帝斗争。

即辛亥革命。

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习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选自《鲁迅讲演考》）

## 革命时代底文学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底文学》，我从前学矿业，叫我开矿，比叫我讲文学容易。我对于文学颇怀疑，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没有办法对付它们。那时候我就想：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是无聊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能杀人，受压迫的人开口讲几句，就要被杀；所以文学是不中用的。鹰捕雀，不声不响者为鹰，吱吱而鸣者为雀；猫捕鼠，不声不响者为猫，吱吱而叫者为鼠；结果，还是开口的

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做几篇文章，或能称誉于当时，或能得到几百年的虚名，那些都是没有用处的，对于现实，总是吃亏；所以我对于文学颇怀疑。我没有学过陆军，手中没有枪，虽然我从前学过一点海军；我手中只有一支笔，才有今天这一个题目。

文学家讲文学和革命有关系，但我以为其中关系，颇为寥寥，它们以为文学在革命中可宣传，鼓吹，煽动；但这些文字在文学中底价值很低，不成为高尚的文艺，因为纯洁的文艺作品，不受他人命令，不管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说出。革命与文学是有关系的，革命时代底文学比普通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色彩，小革命不成为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色彩。在此地听惯了革命，在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很害怕，讲的人很危险；其实革命并不稀奇，革命就是社会的改革，因为社会天天改革，人类就天天进步，人类天天进步，社会就天天改革，这样地循环不已，所以人类没有一刻不革命。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与猴子没有异样的，人类与猴子是表兄弟。为什么人类成为高等动物，猴子仍为猴子呢？这就是因为猴子不革命，——猴子用四只脚走路，一个猴子站起来，用两只脚走路，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坐的，不许你站。”猴子不但不肯站起，而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一个人要站起，一个人要讲话，当时虽受反对，究竟它还要站起，还要讲话，结果它胜利了，大家模仿它。照上例看来，革命并不稀奇，凡是负责任，没有死亡的民族都天天在革命，虽然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分开三个段落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它有一种文学出现，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确是不少。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大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没有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这个民族没用，因为止于叫苦鸣不平。例如乡下人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官厅就知道分发冤单的方面没有力量再打官司，马上官司要归了结；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叫冤，压迫者对此觉得很放心。不中用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连苦也不叫了，这些民族成为沉默的民族，这些民族快要灭亡了：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除泰戈尔一人外），都没有声音了。富有反抗性，蕴藏全副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它的声音改变了，由哀音而变为愤怒之音，带有愤怒之音的文学出现，反抗就快来了；因为它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它要反抗，它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曾有此类文学；波兰、芬兰虽然复国，因为苏俄革命成功而使之复国，没有经过革命的阶级，因此没有此类文学。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波及，大家由呼声转之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再一层那时候民生凋敝，一心一德找面包吃而加紧革命，哪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打击，气得发昏，不能再唱所谓它们的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当我在北京，穷得很，到处借钱，无有文学发表，到薪俸发放时，方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定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

很，同时又穷得很，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斗争，非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底文学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破坏和新社会建设，都觉得有趣味，一方面对于旧的制度崩溃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讴歌。当社会没有改变时，以为社会应该改变，非毁灭社会反对社会不可，进步的文学倡出这番议论后，人们都表示同情，大家都实行破坏，信仰的人少，没有影响，信仰的人多，文学竟成为社会运动；运动起来了，社会改变了，所以讴歌革命。另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底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底文学，有些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社会虽是改变了，但社会上底旧人物很多，旧人物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它们底脑壳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这些人在革命时不革命，革命后反革命，因为革命时对于自己没有关系，对于自己没有损失，但是革命后，社会底一切都改变了，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回想旧时的舒服，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它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怀旧唱挽歌，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看不见这两种文学。但是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底文学，旧式的居多；因为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文学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不特如此，并且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仅有苏俄已经产生这两种文学。苏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皆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也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它已离开愤怒的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新建设是革命进行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没有前例可知，无从考据，依我想来，平民文学快来了，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底结果。

现在中国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是给阔人富人看的；它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究团圆了，这样地看着，多么舒服；或者讲阔人富人怎样有趣和怎样快乐。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俄国小说，描写罪人在野外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不懂，难怪他们不知道天下有这样的下流人，因为它们住在高大的楼房里。如果歌诗描写车夫，就是下流歌诗；一出戏内，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它们戏内的角色，只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我们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欢欢喜喜。直到眼前，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称之为平民文学，实质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

看见平民底生活，假装平民底口吻而说的，因为眼前的文人都有钱，有的虽很穷，总得比工人农民富些，才能有钱读书，才能做文章；你们以为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而是冒充；这不是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因为是老百姓所唱的：其实它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它们对于乡下底绅士有田三千亩：羡慕得不得了，每每拿绅士底思想，做自己底思想，绅士们惯咏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是五言七言，这是就格律讲，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没法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底思想，所以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假的。

诸君是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只有战余休憩时，拿本诗看看，觉得有趣。在革命时代讲文学，譬如农夫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荫蔽日，本可以坐在树荫休息休息，但是农夫一天到晚，耕作不息，只有在正午——十二点钟时候，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此外没有什么用处。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撵走了。他人以为文学至高无上，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不过是一种消遣品，无非民族底文学表示一民族的文化罢了。

我从前不过做了几篇文章，承诸位到此听讲；我呢，愿意听一听大炮的声音，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好听得多了。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位好意！

###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我本来不常出来讲演的，现在因为这里同学说过好几次，所以今天跑来随便谈谈，却不能算是讲演。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题目，——就谈谈文艺和革命的冲突吧。

文艺和革命本来没有冲突，但文艺和政治是常常根本冲突的。政治要保持现状。革命要破坏现状，文艺也是想破坏现状。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新文艺，大概都带着破坏性的。政治家只要别人服从，不许别人反抗，他们所做的是，最好没有人开口，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响，像猴子的头目似的，猴子的全体都该听他的号令，要你死就死，要你走就走。原始时代的酋长，也是这样，他的命令就是天命，就没有人反抗，也没有人怀疑。那时所有的文艺，不过一些赞美歌，间或有几首恋爱歌，决没有反抗的思想和文艺产生。后来人类社会进化了，由小部落变为大部落，又进步而为国家。但并合而成的大部落或国家，是没有不分裂的。因为并合了许多国家，集合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就会生出种种不同的思想和文艺。政治想把国家团结拢来，文艺思想却要把国家分裂。所以文艺思想的发达，一方面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一方面却使国家破裂。其实破裂倒是催促向上的，进步的。文学家希望破裂、政治家希望不破裂，结果是文学家受排挤。当革命者不曾成功的时候，他们和文学家是合作的，他们要利用文学家做宣传革命的工具。一到革命成功，革命者变为政治家，他们只许别人服从，他们是一言一行不容他人有怀疑的余地。但文学家有自己的理想，不肯附合别人的意旨，就不能不受排挤。西

洋有许多文学家都不能在本国安居，俄国革命的时候，有许多文学家很出力叫喊，等到革命成功，他们便又逃走，或自杀了。

有些人将文艺和人生离开，譬如做“春天的花开呀，秋天的花谢呀，”的白话诗，与人生似乎没有关系。中国的道家反对这种嘲花弄月的文艺。外国人却不禁止，由你们躲在象牙塔里说话，说花，说爱，说梦，说理想。躲在象牙之塔里说话，固然比较十字街头安稳。但象牙之塔也筑在地上，也得受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战争的时候，没有人从窗口送面包给他们吃，他们也就没有功夫谈花月，不能做美文，也不能有美的思想了。

北京有一派人骂新文学家，说：“你们不应该拿社会上的穷人和人力车夫做材料。你们做诗做小说应该用才子佳人做材料，才算是美，才算是雅。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但他们现在也都跑到南方来了，因为北京的象牙之塔已经倒塌，没有人送饭给他们吃，不能不跑了。照这样看来，这种文学家在平时固然没有什么危险，但在国家不太平社会不安宁的时候，也要出来找面包当教员。为人生的艺术家，平时就很危险，到了革命的时候，死的死，流落的流落。因为他们的感觉比普通一般人敏捷，他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平常的人都不了然。他们的境遇往往是很困苦的。所以能够看见别人困苦。照我个人的意见说起来，文艺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富家子弟大半不知道社会的苦况。挪威有一位文学家，专写一个人肚皮饿，写成一大本书。不曾饿过的人，大概不会知道饿时的况味。诸位且试一试，饿两天或两餐，必定可以发现饭的异香，走过饭馆，也曾闻出异样的香味来。有钱的时候，看见钱并不感到希奇，无钱的时候，一文钱也觉得很宝贵。穷人看见阔人，觉得不舒服；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人，看见穿粗布大衫的人也会不舒服，说他不应该穿那么值钱的大衫。我的小说里面，曾经描写过一个穷人，他的精神起了变化，他明知道抽屉里是空的，但他却抽开来寻了又寻，看看里面究竟有钱没有，这种心理，是我当学生时经验过来的。

有些无钱的人常常要想世界的好坏。有些无钱的人，尝过种种困苦，觉得钱是最好的东西，就变成个人主义者，有一文守一文，不给别人。中国是个人主义者居多数。有些人想，“无钱是很苦的，世界上苦人很多，我应该设法救助他们”，这种人就成为人道主义者，他们对于现状不满意，要反抗政治家，反抗政府；所以政府总是讨厌人道主义者。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自己是一个贵族，却反对贵族，反对威权。他自己打过仗，写了一部《战争与和平》，描写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时候，大军官躲在一个铁板的后面，托氏是小军官，没有铁板保护，所以他说，不看见那铁板，倒还不怕，看见那铁板，就更觉得可怕了。托氏眼见战争的惨状，眼见朋友的死伤，所以讨厌战争。大凡战争的结果，一部分人变成英雄，做了大官，忘了战时的恐怖，不反对战争。一部分的人忘不了战时的恐怖，变成非战论者。托氏主张不听皇帝的号令，也不主张杀皇帝，他主张无抵抗主义，法官不替皇帝判决罪人，警察不替皇帝捉人，皇帝也就不能为恶人。他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仍然和政府冲突，所以俄国政府还是厌恶他。

文学家和艺术家都被政治家厌恶，似乎是命定的。政治家爱杀艺术家，割了他们的头，他们便不能说话了。但杀也无用。文学家往往是替社会说话，不是替个人说话，他们的感觉比较灵敏，虽然是替社会说话，但社会不曾感到的，他们先感到了，所以社会也厌恶他们说得太早，太急进。譬如你们学兵操，教员喊“举——枪”，倘若“枪”字还不曾喊出来，你便把枪托上，

一定要挨骂的。政治家也是一样，骂文艺家说话太早太快，非杀不可。但社会的不安，并不是文艺家所能煽动的，杀掉文艺家，不安依旧存在。文艺家说话时，社会已经不安，已经有着造反和捣乱的潜伏思想了。文艺家死后四五十年，社会起了革命，所闹的问题时常和文艺家四五十年前说过的相同。于是政治家更讨厌文艺。但他们不懂文艺的作用，不明白文艺的原理，只知道禁止开会，禁止演说，到死都不会觉悟。所以文艺和政治永远不能调和，永远闹不清楚，譬如做官的人，今天听了我的话，一定要说：你做文章怕杀头，所以归过于社会，永远弄不明。

我在广东曾说文学不能鼓动革命，一位少年英雄便痛驳一通我的话，说一定可以帮助革命，革命文学是如何紧要。其实是有文学也会革命，没有文学也会革命的。文学家只要写出社会的痛苦便完事，不一定要“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才算是革命文学。革命以前，做了许多革命文学，是无效的；革命的时候，你忙的是革命，哪有工夫做文章。一面拉车一面作诗是不方便的。据说古时有人一面做诗一面耕田，我却不信。我从前有一位学生在军队里面服务半年，写信给我，把许多中国字忘掉了，可见干革命事业的人，是没有工夫“之乎者也”的，所以我说“革命期中无文学”。像俄国革命的时候，大家拿着票，排着队伍领面包吃，不管你是文学家，艺术家，X家，都该携着票去领面包，没有票就不给，哪里还有工夫“之乎者也”呢？革命以后，生活比较空闲，于是人们又起来“之乎者也”了。在革命后颂扬革命，不能说是革命文学。中国的革命已经革到徐州了，我们都在后方，在后方颂扬革命，就是颂扬已经成功的权威，可以不必。

政治家对待文学家起初是捧，后来是杀，这是毫无理由的。文艺家不过是说出多数人的预言罢了。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半是革命的预言。18世纪的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是给太太小姐们消遣的，姑且不管它，但我们读了19世纪下半期以后的作品，便觉得不舒服了，因为写的是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世界的痛苦。但文艺有一个魔力，人们看了不舒服也要看。像我个人就极喜欢看不舒服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把世界写在里面，同时也把我写在里面。在作品里发见了“我”，所以觉得很亲切。有些专写快活一面的作品，我却不喜欢看；如同看别人作寿，看别人娶亲，自己却感到寂寞。从前的作品是可以向壁虚构的；现在的作品，要多方面的观察，才写得出。

其实，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兆的都可说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所以写的都是预言，一般人所不能察觉的。所以徐州未下前，革命文学家站不住脚；徐州既下后，革命文学家也还是站不住脚。总之，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家是活不下去的，因为革命文学家不是革命家。孙传芳是革命家用枪炮打倒的。不是文学家写了一首诗：“孙传芳呀，你得走了呀，你滚吧，滚吧，”才赶走的。他们不是同类。

文学家是要理想革命，时时和现实冲突，所以革命之前革命之后都不能舒服。真正的革命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永无好日，这是命运。俄国有两位革命文学家，在革命之前是赞助革命的；在革命朗中，也很出力，在革命之后，却自杀了。因为文学家不能取一段落的合于他的理想，就认为满足。

今天的题目就定为——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侍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和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



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有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两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选自《鲁迅全集》）

## 马寅初 一八八二——一九八二

浙江绍兴人，著名学者。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被保送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1927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政府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因反蒋而被监禁数年。1944年恢复人身自由，但被剥夺在公立学校任教和发表文章、演说的权利。后到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至196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历任全国政协第一、三届委员，第二、四、九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五届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5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以大量调查分析为依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人口有计划增长的人口理论，因此而受到批判。1960年以后专心从事著述。“文革”中曾焚毁自己的农业经济学著作《农书》的手稿。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

《北大之精神》（1927年12月19日）是作者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29周年纪念大会时的演说。当时作者已在南京政府任职。在演说中，他对北大自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勇于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用北大精神来批评时弊，指出，“今日国家社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他对那些买官谋缺，营营于一己私利，对“公家事”漠然不顾的鄙俗之辈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作者在这里已深入到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层次。他对“中国人以‘不’字为道德”的批判尤为发人深省。最后他号召人们以北大之牺牲精神为国家社会的进步效力。

### 北大之精神

今日为母校二十九周年纪念，令人发生深切之印象。现学校既受军阀之摧残而暂时消灭，但今天之纪念会，仍能在杭州举行，聚昔日师友同学至二百数十人之多，可见吾北大形质暂时虽去，而北大之精神则依然存在。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然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苟有北大之牺牲精神，无论举办何事，则结果之良好，俱可期而待。今以浙江一省而论之，如以北大牺牲精神，移办政府与党务，则不出一年，必可为全国之模范省。盖浙江现时之地位，较他省优良之点甚多。财政之统一也：浙江之财政厅，尚能统辖全省财政，较之江苏、安徽、福建等省，俱远过之。江苏因为孙传芳之战事未了，所统一者仅长江以南之一部份。安徽在前数月间虽征收税吏，俱归二三军队首领所委派。福建即菜担妓女，亦俱贴印花，其财政上之紊乱，可以想见。至湖广江西等省，更无须深论矣。金融之平稳二也。全省无滥发纸币，引起金融之扰乱。军队之统一三也。教育之优良完全四也。此次革命军兴，全省所受之损失不大五也。既具此五种之

优点，苟政治能上轨道，办事人员俱抱北大精神而徐图改革，则将来之浙江，必较今日可以远胜万倍。

虽然，欲图改革，必须自环境之改造入手。重心不在表面，而在人心。今日国家社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如寅初回浙未久，而请寅初代谋统捐局长者，不知凡几。且有欲寅初推荐往禁烟局者，彼辈之心理，以为寅初现正在反对禁烟局，则寅初推荐之人员，禁烟局不敢不留用。际此生活困难之时，在政界谋事，果属生活问题，情尚可原。然来寅初处谋事之人，甚至预先说价，必须月薪至若干元以上，或有其它不正当之收益者而后可。是故中国大半人民，虽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脑筋中实无一“公”字之印象。故公家观念之薄弱，已达极点。而对一己之升官发财，譬诸厕所之苍蝇，群相鹜集。故无论何界，苟有一人稍有地位，则其亲戚朋友，全体联带而为其属下，家庭观念之深切，世无其右。当知吾人对于国家社会之义务，应以人民之幸福为前提，不当以个人弥补亏空或物质享受为目的。北大昔日既为群众之导师，今而后当如何引导人民，打破家庭观念，而易以团体观念；打破家庭主义，而易以国家主义，恢复人生固有之牺牲精神。否则，若仅有表面之革命，恐虽经千百次，于国家于社会仍无补于事也。

且中国人民之心理，对公家事，若不相干，可以不负责任。如寅初此次反对鸦片，时有人以“在此种社会何必做恶人”之语，来相劝勉，若寅初家中妇女，如作此语，寅初本可不加深责。然此种浅薄之语，竟发诸现在之官吏与夫东西留学生之口。呜呼！一人公正之勇气能有几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励，而反以冷水浇头，人心至此，可深浩叹！中国人以“不”字为道德，如不嫖，不赌，不饮酒，不吸烟，果属静止之道德。然缺乏相当之努力，与夫牺牲之精神，以尽人生应有之义务。虽方趾圆颅，实类似腐尸。西人谓 life is activity，否则，反不如截发入山，做和尚之为愈，何必在世上忧忧哉。

是故以北大之精神，牺牲于社会，对于全国，或以范围过大，尚须相当时日。若仅浙江一省，则改造之目的，诚可立而待也。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举凡战胜环境，改造人心，驱除此等奄奄待毙不负责任之习俗，诸君当与寅初共勉之！

（选自《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 宋庆龄 一八九三——一九八一

原籍海南文昌，出生于上海，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1908年留学美国。1913年回国，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她辅助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制订三大政策、实行新三民主义等重大活动中，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对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痛斥了蒋介石的叛卖行径。汪清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她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被迫出国。1929年5月回国后，拒绝担任国民党党政职务，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此后，她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支持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并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劳动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她应邀任名誉主席。1949年9月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和196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1933年9月30日）是作者于1933年9月在她所领导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上作的演讲。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原因及其本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正在准备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投降，“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作者进而指出，中国人民只有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民族的解放。由此，作者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这篇演说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当局出卖民族利益、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义正辞严，锋芒锐利，充满义愤之情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讲话》（1981年5月8日）是作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演说。在演说中，她回顾了中加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高度赞扬了以诺尔曼·白求恩为代表的加拿大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所给予的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赞扬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继而切入一个重大的主题：中加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应该密切合作，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演说以对中加友谊的美好祝愿作结。整篇结构起承转合，极为顺畅自然。

###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

同志们和朋友们：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

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对劳苦大众及其领导者施用了最残酷的压迫、酷刑和残杀，文化与生产的进步停滞。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

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

历史很明显地指示我们：战争的破坏性必然一次比一次厉害，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必然一次比一次惨重，战争中间相隔的时间必然一次比一次缩短。但同时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

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且使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

我很想在这里说明我自己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的态度。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

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

现在，帝国主义者为了克服那分裂它们日益尖锐化的矛盾，正竭力企图以重新分割中国和发动反苏的干涉战争来取得暂时的妥协。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远在日本夺取台湾以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控制了中国的一切战略要地，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支配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利用中国的军阀和其他反动分子作他们的爪牙，来达到各帝国主义不同的目标。

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1925~1927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也正是这种政策，鼓励并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窥伺川西边界。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法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云南。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财政和政治霸权；帮助了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更进一步实施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恶毒计谋。目前还看不到侵略的终结。这还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继续不断的卖国行为的帮助下，从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的开始而已。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更惨重的奴役。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将来一定还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来从事彼此间的相互厮杀。战争将继续不断地发生，而在这些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将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今天，中国东北的人民已经在替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了；将来，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助之下，将被迫给各帝国主义者充当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东北建造成将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它并且在企图扩大它的根据地，想先控制黄河以北的土地，然后加以占领，再进一步侵略内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征服全中国。至于英帝国主义，它和美国有尖锐的矛盾，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冲突也在增加，对印度革命怀着畏惧，并对苏联怀抱仇恨；它正在拼命设法组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反苏集团，以图延缓帝国主义强盗间不可避免的战争。

这是目前局势的真相，希望从任何帝国主义者或国际联盟那里取得帮助是犯了叛国之罪。希望从国民党的政策中获得生路，简直是愚蠢。国民党今天正在更有意识地、缜密地计划着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作全部的、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和希望，那就是，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得益。

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

亿万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进行这个斗争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

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

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

只有这些斗争，才能把中国从连年战争的无穷苦难与长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暴行为之中解救出来。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支持者问我们：“你们既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白色恐怖，那么为什么不反对革命中使用武力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

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干涉苏维埃中国或是干涉苏联的战争、对民众的压迫和恐怖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动的目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可以明了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危机中我们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直接接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帮助他们来解除中国人民在目前和将来的斗争中的武装。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反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击退一切帝国主义的联合武力的斗争，这种历史的先例指示了中国人民的出路。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装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很明显的，东北英勇的义勇军长期间的抗日斗争现在还在继续，假如不是惨遭反动政权罪恶地加以破坏，早就达到更高的程度了。

除却蒋介石政府方面的破坏，还有另一个因素阻挠这运动的进展。抗日义勇军的领袖们畏惧群众，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只武装了以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阶级观点看来认为“稳健”的分子。东北的工人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对这些义勇军的领袖如马占山、李杜之流，同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可能迅速成功了。

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帝国主义者。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与任



何军队订立军事协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附加的条件是武装人民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提议指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认真态度。这些呼吁虽然获得了群众和兵士的同情，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响应。这表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要不是亲帝的、国民党的工具，便是没有进行真正斗争的勇气。

总而言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发展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力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则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最后，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 5000 万美元中 1600 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英、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受到帝国主义各色各样物质的与精神的帮助。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选自《宋庆龄选集》）

## 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 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佩奇先生，  
加拿大大使高文阁下，  
朋友们，同志们：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我们两国在太平洋两岸隔海相望。很久以前就有许多中国人在加拿大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为加拿大的兴旺发达作出了贡献，受到当地其他血统的加拿大人的尊敬。他们一贯是加拿大的好公民。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祖先的故土，也从未停止过对故土进步事业的支援。在孙中山在世时，他们曾是孙中山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孙中山本人也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不只是在财力上帮助孙中山的事业，而且还加入到他的行列。其中还有不少人返回中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后来，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及至在以后的建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他们继续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在加拿大人当中，站在我们一边的不只是这些人。无论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制的革命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人民都得到了酷爱正义的欧裔加拿大人的帮助。他们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在中国最艰苦的前线——解放区游击战前线——为抢救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毛泽东主席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颂扬了白求恩大夫，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中国人民把他看作是在进步和正义事业中各国同甘共苦的最光辉的典范。全中国的男女老少，甚至我们辽阔国土的最偏僻地区的儿童，只要听到加拿大一词，他们就会想到白求恩；而听到白求恩的名字，又会想到他的故乡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遗骨，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名字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将使中国和加拿大千秋万代连结在一起。从广义上讲，一个加拿大人能够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一切企图奴役别人的人而团结战斗的国际性榜样，这是我们两国的光荣。

总的说来，无数加拿大人——政府官员、教育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一直对中国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采取友好态度。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突出，那时我们两国是反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同盟军。今天仍然是如此。我愿在许多老朋友中特别提一下切斯特·郎宁和文幼章博士，像他们这样的老朋友还有很多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之桥更加稳固、宽广和坚实。它包括我们两国良好的国家关系，互利的对外贸易以及学术和其他友好交流。

我们现在如同过去一样，不仅在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方面，而且特别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人和加拿大人都从历史的经验中懂得了，保卫和平必须采取明确立场，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的一切侵略行为，反对超级大国扩张主义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任何企

图。

正像 30 年代一样，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抉择是严峻而明确的。一条是历史早已给我们留下痛苦教训的、导致世界大战的道路，这就是幻想、怯懦、不协调和绥靖的道路。这只能怂恿和加速侵略者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步伐。另一条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密切合作，决心抗击和阻止这种扩张势头的道路。目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和紧张，世界和平受到严重的威胁，其根本原因是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所致。因此我们应当坚定地面对这一现实。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待当前危急的国际形势。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号召我们，在我们国家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又写道“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空前觉醒。在这种基础上，中国坚信，她能够完成不断进步的任务。这种任务集中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加拿大和加拿大民族就是这样一种民族。

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培育和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愉快地接受你们的授赠学位。

（选自 1981 年 5 月 9 日《光明日报》）

## 张学良

一九一——

奉天海城（今属辽宁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东北军爱国将领。1936年12月12日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在西安扣留了陈诚等多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3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并立即电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和处理“事变”善后事宜。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经过斗争，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西安事变遂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开始。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南京后即扣押了张学良，以后又将张学良带至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多年，于近两年才重获自由。

《在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是作者于发动“西安事变”后的第五天（12月16日）在西安革命公园民众大会上的演说。张、杨二人对蒋介石施行“兵谏”的举动，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人民群情激昂。作者在演说中向听众说明了采取扣蒋行动的原委，揭露了蒋介石的专制及仇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刽子手嘴脸；表明了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只要求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这一严正立场；并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抗日，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可谓气势雄健，慷慨激昂。由于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所以其与全体在场听众、与全体人民情感的交融共振亦溢于言表。

### 在市民大会讲演词

各位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请愿的同学们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的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谏，当面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

“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前面，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热情。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

（选自《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附录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两次演讲）

## 附 录

### 一、杨虎城对全国作广播讲话

（1936年12月15日）

国难日亟，自12月12日张主任委员和我应西北各界救亡团体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的意义，已于12日的通电及昨日张主任委员的广播词中很诚恳的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再郑重向大家报告一下。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就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救国的方针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外，实在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怎么样呢？他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什么“攘外吗”？

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主任委员就很恳切的谏诤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群众请愿出兵抗日中竟使警察对着手无寸

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他这样的错误政策，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仅奸，我们也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条抗日战线来。双十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中华民国的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昨天张主任委员广播中已经说明了。现在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团结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取最后的生存。南京政府对我们这次的举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同战。所以张主任委员昨天说，我们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必须用在抗日疆场上。我同样具此决心，只要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加以指导，使我们在抗日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那是十二分感谢的。

### 杨虎城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 (1936年12月16日)

全体同胞们：

今天开市民大会，兄弟受到各位同胞热烈的欢迎，觉得非常之惭愧。我们应该知道，12日的举动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义举。所有经过，方才张主任委员已报告的很清楚了，现在不必再来重述。兄弟现在所要说的约有几点，希望全体同胞们加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点、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下面群众一致答：革命公园），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现在我们既然在这个富有革命性的地方开市民大会，我们唯一所要认识清楚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族今天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扩大了向我们的武装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了。所以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就不应忘记先烈伟大的革命精神，大家都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努力抗日，才不负今天这个地方开会的意义了！

第二点、兄弟看到今天会场的热烈情形，使我非常感动。我们记得，过去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这些口号，群众受到环境的压迫，丝毫没有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若干年来，就在这样口号下，几乎要把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实地表示我们的救国意见，毫无虚伪地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才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民众大会。第一次的民族得到自由的大会。这是今天兄弟觉得非常高兴的。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了这次谏诤了。所以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在过去国家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

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西北也就跟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前线了。我们的民众在这种形势下，就应该认清西北民众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国防，担负起西北的责任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以保全国民族。我相信西北民众是认清了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会场群众高呼：不怕牺牲）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与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张主任委员很坦白地表明了他的爱国赤诚，并了解西北民众革命的伟大精神，极力帮助我们。我们要拥护我们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牺牲精神，在他的领导下收复东北失地。我们更应知道，双十二义举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更应当扩大一步团结全国同胞，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

## 陶行知

一八九一——一九四六

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从事民主运动，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引导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这里选编的演说辞就是反映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的一篇著名演讲。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1938年9月）是陶行知先生在香港作的抗战演讲。1938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功后第二年，抗战情绪在全国日益高涨，抗战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方向转变，陶行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作这次讲演的。讲演全篇充满喜悦乐观的基调。从国际上美、英、法、苏的联合抗日，到国内抗日前捷报频传；从政治宣传到大众舆论，陶行知如数家珍，喜形于色溢于言表。这对于激励民心，鼓舞斗志大有裨益，也表明了陶行知的爱国主义热情。陶行知是一位教育家，对于讲演的宣传功用自然是不言自明的，这篇讲演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篇典范之作。

###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各位同胞，幸喜回到香港来，兄弟觉得非常高兴。四万万五千万人站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了。二年前，此地唱歌也受到压迫，现在则可以听到救亡歌声了。兄弟所讲的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对于国际形势有两种看法。第一派以为中国跟日本打，那么第三国也会跟日本打，中国就得救了，这一派人可说是抱了买发财票的一种心理的。第二派则以为国际形势，如看天气，照客观形势推测一下，那就跟买发财票那种心理不同了。天气这个东西，风向哪里吹，雨从哪里来，都有一定的道理。各国的形势不能详说，先把几个重要的足以影响世界潮流的说一说。现在先讲美国。美国对欧洲的事情向来不大理，但在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说是为民主而奋斗而参加进去了，不过还受了些损失，好比小孩子玩火弄痛了手指头，好啦，顶好不要打，要打就你们打好了。一年前，我们感觉到美国所抱的是“孤立政策”。美国在世界大战时，为口号标语所麻醉，说是什么为民主，为世界正义而战，美国人在战后知道了上了军火商人的当。于是乎美国人对远东情形也就很冷淡。可是，自从我国抗战以来就把它转变了，这是因为：（一）日本的侵略决没有停止；（二）日本的行为是惨无人道的，如巴纳号的被炸沉，南京的大屠杀等等，把美国的孤立政策渐渐转变了。广州的空袭一天几次，是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大原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斯福的演说“侵略国如同虎烈拉”，必须隔离开来。这个演说引起了许多反对的反响。不过那是跟日本有来往的商人干的。可是，日本的残暴行为一天天增加，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损失日益巨大，便慢慢的觉醒了。……在轰炸广州的时候，国务卿赫尔发一通知书说“不能卖军械给侵略人家的国家”。后来罗斯福及赫尔在加拿大的演讲，更加具体的说明“孤立政策”定要放弃，必须建立集体安全制度。美国便由



“孤立政策”而变到“集体安全政策”了。这是放火的人联合起来，教会了救火的人也应联合起来啊。不仅演说言论是在变化，其行动也在变了。

现在我们看看英国的政策吧，它的政策是很聪明很巧妙的。东三省给日本人拿掉，国际联盟没什么反响，便是守旧派在那里玩的把戏，原来英日有盟约的关系，其条约虽失效，但守旧派在精神上还觉得恋恋不舍。

但日本的侵略由华北而华南……毫无止境。这给予英国的利益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当它的利益受到危害时，便的确对中国有点帮忙了。去年看英国的《泰晤士报》实在太不行，现在则对中国积极了一点，今年登载关于中国的新闻则更多了。中山先生的政策是“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希望英国也会走上集体安全这条路。

说到法国呢，有许多人说法国是跟英国走，好像英国握了法国的辫子，英国要她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英法两国爱情本来就很好，如情女情郎。对西班牙问题，法国跟着英国跑。但对捷克问题，则英国跟着法国走，好比妻与丈夫，见翁姑，则妻跟夫行；归宁，则丈夫依从妻子。对于远东问题，英法的态度则差不多。

苏联的态度对世界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又是世界和平的巨大柱石。是反对侵略政策的首倡者及集体安全制度的发起人。张鼓峰事件，苏联把日本一师团军队完全毁灭了，有一派人很快活，好似中了发财票。但张鼓峰是苏联的领土，日本的军队侵占进来，当然要把它打退，打退了日本军队当然也就不打了，但它不能代中国打，这是对苏联及中国都有害的。要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制裁侵略者，苏联当然会加入。国联的会员国应尽量援助中国的议决案，苏联是遵守的。

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很有影响。

英，美，法，苏，都向集体安全的路上走，虽然尚未达到其成熟的程度。这好比几个强盗联合起来，则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应联合起来打击强盗。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国际形势由“各人自扫门前雪”而走到集体安全的道路。真能达到集体安全，则于我国极为有利，我们应促成之。这是我所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为由看不起中国至看得起中国，由各个帮助中国而互相帮助中国。我们更应促其具体的有效的帮助中国。从前各国人民的舆论，多半轻视中国人。但自从“八一三”事变以来，我们有被几千日军包围而孤军奋斗的“八百壮士”，有台儿庄的大胜，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敬佩这个光荣的中国了。

八路军由锄头镰刀拜日人之赐，而变成机械化军队，这消息外国人知道，大为震惊。

在国外，中国人演讲上台下台，外国人都站起来致敬。这是对中国的恭敬。各国人民（跟日本人做买卖的除外）可说是都同情我国。

第三点是日本的战争材料从哪里来？他自己是一个穷光蛋，哪里来这么多飞机大炮？此问题不能不追究。

英美人士也常常问我们：“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应如何帮助你们呢？”则可答复“日本所买的军火当中，美国运往日本的，一百块钱占了五十四块半钱，要是我们死掉一百万人，有五十四万五千给美国人的军人杀掉了。”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洛杉矶听了我说这么，便站起来对听众说道：“应如何处置？”群众大呼：“切不可再卖军火给日本！”其次，我们要是死掉一百

万人，有十七万五千为英国的军火所杀掉。我们要使他们不要帮助侵略者。

第四点，日本打中国的钱从哪里来？一天要用一千多万，从哪里来？很简单，卖日本货赚了钱，那就买军火中国人。如各国不买日本货，则日本不能买军火，也就不能打仗，便要回家去了。可是日本货卖到哪里去？（一）中国；（二）美国；（三）印度。如果三个地方都抵制日货，日本便要回老家去了。不过香港的日本货也很多。美国的学生很多把日本货领带扯下，小姐把日本丝袜脱下来，都让火烧掉了。美国的杯葛日货运动很有效。印度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效力。

第五点说到“中日的宣传战”。日本的宣传好比一个很丑怪的女人，但涂脂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了很好看的衣裳，但骨子里是很坏很坏的。印的宣传品也很漂亮。可是，中国的宣传，好比穿了粗布衣服的西施；不打扮，但人人欢迎。中国对于国外的天主教，基督教，工人团体，女人团体，书呆子——大学教授的地方，都有人去宣传了。但日本也去。结果呢？“宣传战”中国是打了胜仗的。这是因为中国说老实话，“理直气壮”的缘故。

日本人是知道全世界三万万五千万回教徒的，于是造了一个回教塔，叫各国来礼拜。但在埃及的“爱资哈大学”的三十个我国回教留学生便播音说：“一千年来，日本连现在这个只盖了两个回教堂。日本只有二十个回教徒。中国有五千个回教徒。当日本在东京建起一个回教礼拜堂的时候，在中国毁坏了几百间回教堂，杀死无数的回教徒。”埃及就没派代表到日本去。这是“宣传战”中国大胜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位自称日本工人代表去见美国码头工人会的总书记：“请你们不要抵制日货，给日本工人一碗饭吧！”

“阁下代表日本工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

“代表工人，但政府也知道的。”

“日本侵略中国，阁下同意吗？”

“却不能反对。”

“你们反对政府的侵略政策，反对军阀买军火，你们便有饭吃了。”

这位日本人给美国人开会开不成功，便召集日本人来开会了，说他无脸回国，要求切腹自杀了。而且他不是工人，是工贼。日本工人是不赞成他来的。中国的宣传费很少，而且都是尽义务的。可是却没有中国人替日本宣传，但有替中国宣传的日本人。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日本女子说：“我爱日本，所以我不喜欢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没有出路，日本便没有出路，日本之侵华为日本之自杀，我始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大为美国人士所赞同，这是因为我们为真理而战。

可是不能等待国际的转变，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日本人的政策是分开进攻，我们的政策是联合抵抗！日本还是在挑拨、离间，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夏天很热，夏思春，春天更好。春风袅娜，鸟儿唱歌，花在跳舞，各人喜欢春天，我也愿意每天过春天。“春”字可知中国的命运。春字从三人日，三人者，上中下，右中左，老中少，苟联合起来，必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想实现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唯一的方法便是三种人联合起来抗战！

（选自《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陈 毅

一九 一——一九七二

四川乐至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从事爱国活动被押送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四川做兵运工作。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做政治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团党代表。1928年4月，同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湖南起义的农军，在江西弋市同毛泽东部会师，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赣南领导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北。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第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72年1月6日于北京病逝。

《就职（代军长）演讲词》（1941年）是作者就任新四军代理军长时的演说。1941年1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消灭。为了回击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坚持抗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命令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担任代理军长。陈毅在就职演说中，回顾了新四军——中国革命军队在反共顽固派的围剿之下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揭露、痛斥了反共顽固派与亲日派反共反人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指出了人民军队、民族解放事业必胜的光明前景，并说明了新四军由共产党领导、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鲜明特点。整篇演说气势宏大，铿锵有力，挥洒自如，有很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

《答记者问》（1965年）是作者在回答香港《正午报》、《香港夜报》、《国际文摘》记者提出的关于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问题时的讲话。1965年，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美国侵越战争继续升级；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扶植下蠢蠢欲动，佐藤政府不时掀起反华浪潮；印度亦加入反华合唱；台湾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港英当局同意美国将香港用作侵越据点。在这重重压力、种种威胁面前，陈毅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借答记者问的形式向全世界严正宣告：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是决不畏惧的；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中国人民将战斗到底，直到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态度之坚决，立场之强硬，语气之豪迈，充分显示了正在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捍卫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中国人民的强烈自信心，及经历了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历史大搏斗的一代领袖人物的气度与风采。

### 就职（代军长）演讲词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

今天是各界同胞抗战军队，在这里举行庆祝军部成立的大会，这在中国抗战中，革命史上以及将来都是一件大事。我想只要是抗战的爱国的同胞，听到新四军军部恢复，一定也会像诸位一样的欢欣与热烈的庆祝，仇恨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反共顽固派与亲日派。因此今天新四军军部的恢复，是直接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这不仅是兄弟个人、刘政委、张副军长、邓主任、赖参谋长，几个人在这里就职问题，而是全国抗战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几个人只是作为一个代表，代表出来讲话。我们要很好地完成抗战革命的大业，还要依靠各界同胞和所有抗战军队共同负担起来。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一致团结的力量，我想我们几个人大胆地来就职，一定能够负起责任来，而且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鼓掌）一定有把握打倒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全场鼓掌）这是一个光荣的责任，它将直接有力地使中国抗战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告诉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新四军是不能取缔和消灭的。反共顽固派一月十四号消灭了军部，但是一月二十五号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皖南新四军被歼灭了，但是新四军在安徽、湖北、江苏、河南，仍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发展和壮大，这是一定会亲日派反共派感到失望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大会，有坚持抗战最大的政治意义。

我想在这里讲一讲新四军的问题。新四军是一个什么队伍，在座的同胞和同志们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在新四军成立那一天起，兄弟就在新四军工作。直到现在十四年中都没有一天离开过。在民国十七年冬天就有了新四军（新四军前身是老四军）。大革命失败了，反动派破坏北伐革命，不愿意实行三民主义，与北洋军阀勾结，爆发反革命的清党运动，在南京广州掀起了反共的旗帜，一方面反共，一方面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人民与中国革命的事业。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头子，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想一想：在这十四年长期的历史中，是不是消灭了新四军——中国革命的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失望了！（全场鼓掌）叶项军长、朱彭司令、毛泽东同志，在过去为了建设中国工农红军整整奋斗了十四年。反共顽固派动员了几百万大兵，经过了六次围剿，都不能消灭我们；顽固派着急了，抵不住了，只好拿下反共的招牌来合作。大头子被捉去了，还是周恩来去讲情放出来的，难道忘记了吗？

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只带了八百多人上井冈山，就发展成为今天五十万大军。这样干下去是一定会胜利的。新四军的前身是南方各省的游击队，那时全部只有二千多人，因当时在残酷的斗争中，还受到损失。项英同志和兄弟在一起，在广东、江西交界的一个山上，只有二百多人。三年后，新四军发展到九万人，今天九万人还被他消灭吗？要被消灭，在大革命失败时就可以被消灭；在三年游击战革命失利的时候，也可以被消灭，但是没有被消灭，相反的是十倍百倍的壮大与发展。今天新四军有九万人马，四五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近一千万的人民拥护，谁想来消灭他，谁就要失败。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是最坚决的，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人民一天不解放，则新四军必然会发展，是毫无疑问。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革命民众的帮助，爱国同胞以及成千成万的青年的加入。虽然在斗争中有牺牲有伤亡，但是新生的力量继续地涌入我们的队伍，使我们愈加强大了。新四军是由优秀的分子组成，是代表抗日民众利益与要求，始终保持着和高举着这面抗战的大旗，坚决地抗战到底。有了这面大旗，这便是不能战胜的力量之根源。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越打越强！正因为这样，所以重庆

当局的亲日派、反共顽固派，看见新四军不可阻挡地发展，所以要来打新四军。他们不愿意抗战，与日本鬼子勾结起来，消灭取消抗战有功的新四军，这不仅是与新四军作对，而且是与中国抗战作对，和四万万老百姓作对！新四军有四万万抗日的老百姓的拥护，是一定会胜利的。今天新四军军部成立，受着苏北各界同胞的热烈拥护。我们的同志要明白我们的责任，是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的大旗。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新四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的命令——取消新四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恢复军部。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全场鼓掌）重庆当局制造皖南事件，取消新四军，这完全是双簧，后面有日本鬼子发命令。同志们！我们要反对重庆当局的非法令，反对他们就等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各界同胞要了解，重庆当局变了。在皖南事件以前，重庆当局还是领导抗战的；皖南事变以后，他不打鬼子，欲消灭新四军军部，取消新四军，发动二十万大军进攻我们。不愿领导抗战而领导内战，破坏抗战了！重庆当局负责的虽还是那几个人，但是变了，很快地会撤去抗战的招牌了。汪精卫不是堂堂的副总裁、行政院长、国民参议会的议长，他公开他讲反共，他就变成汉奸了。皖南事变以及取消新四军番号，就是重庆当局改变其抗战国策的证据！这完全与汪精卫的改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成立军部，就是要和他们作对到底。

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新四军十四年的历史，是为全中国谋解放的历史。新四军是为着老百姓的利益，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界、教育界及公正开明士绅的利益奋斗到底。新四军是与军阀、腐烂政客、卖国贼作对到底！“中国人”三字的解释，应该是真正爱国的人，才能算是中国人。爱国的士绅工农青年妇女，这是十足的中国人。过去的封建军阀，汪精卫、政客、党棍、韩德勤、李守维……他们压迫中国人，与帝国主义勾结，高高在上，把我们老百姓踏在脚下，自命为高等华人，把老百姓当作牛马奴隶，经常同日本帝国主义勾通，这些人不是中国人，不让他们冒充。各界同胞是清楚知道的，我们苏北，被重庆大头子的徒子徒孙搅得一塌糊涂，新四军当然要与他们坚决作战到底，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所以新四军主张民主政治，提倡文化教育，组织民众，减轻苛捐杂税，军民合作，提倡革命的艺术，正当娱乐，这些是与他们相反的。他们取消和压迫新四军，就是要夺去老百姓的自由平安的生活。现在汤恩伯、李品仙带了大批没有纪律的军队，要跑到苏北来发洋财。上官云相带了反共大军把新四军军部打垮了，在一月十五号，他的军队就开进了云岭、泾县、铜陵、繁昌，三年来新四军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顾祝同说是去剿匪去，就是去摧残民众团体，去剿老百姓，说他们是勾结新四军，是犯法的。顾祝同不但要消灭新四军，而且要消灭老百姓。日寇也出动了大兵，配合起来夹击新四军，打得非常好看。这是因为新四军是保护者百姓的利益，所以顾祝同要压迫老百姓，就先要打新四军。今天我们新四军军部的成立，也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我们一定能打垮他，一定能粉碎华中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二十万大军的进攻。我们华中的老百姓，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垮他们，我们才能抗战到底，过太平日子，不受压迫。最近我们盐城的九区区长，他不是当官的，是替老百姓做事的，现在被韩德勤绑去了。因为韩德勤不准他替老百姓做事，

要替他压迫老百姓。我们新四军军部成立，我们几个人的就职，我们是坚决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到底。我们相信，有了军民一致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今天军部成立，各位同志要了解我们新四军和其他军队的不同，是我们新四军有政治委员制度，有了这个制度，我们几个人一定可以担负得很好。新四军一定可以由几万人发展到十万二十万，因为新四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的每一个战士，不是为了做官拿薪水，是为了民族解放。他们的非法命令，新四军可以不接受。因为新四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政治委员的制度，有政治部，这是保证新四军永远为革命事业，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不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压迫欺侮老百姓，不会失败。我们今天军部的恢复，还要庆祝我们的政治委员就职。在抗战三年前，我们与重庆当局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主张全国抗战军队，都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不但是军官指挥，而且是政治委员来指挥。重庆当局的亲日派汪精卫不肯，因为有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就变成真正的国家的军队，私人要利用军队去做反革命投降，就做不到。他们要造成家兵家将，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要抗故就抗战，要投敌就投敌。新四军就决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委员的领导。现在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我们的政治委员。我们军事工作人员只管训练军队，如何拿枪瞄准，如何包围迂回；政治委员就指挥我们如何打，打谁，打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打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不能打老百姓，所以新四军是最可靠的。今天我向盐城各界同胞贡献一个意见，庆祝军部成立，一定要立即在全国抗战军队中，实行像新四军一样的政治委员制度，才能保持抗战军队不会被野心家阴谋利用，去作为压迫民众、投降日寇的工具。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二十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他不但为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奋斗了二十年，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已经奋斗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历史。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北，他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在政治委员领导之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我们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我们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地达到目的。我们军部今天成立，就更要加强军队的政治领导，拥护政治委员制度，我们军队一定能够百战百胜！

同胞们，同志们！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反共派所得并不多，他却失去全国人民的同情，引起全国国民的抗议，对比起来，坚决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希望大家努力！（全场鼓掌三分钟）。

（选自《陈毅资料选》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上海师院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79 年 9 月）

### 答记者问〔节选〕

英国和香港当局让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一个据点，使香港居民

感到不安。中国政府认为，问题不仅是把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据点，而且是准备把香港将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英国政府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希望它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比较聪明的做法。否则，到必要时，中国要采取措施。

美国肆意扩大侵越战争，英国关于“马来西亚”的做法，所有这些当然不仅是对付越南，对付印度尼西亚，他们的目标也是对付中国。美国帝国主义从来不掩饰它的全球战略是要称霸全世界。美军不是简单地到香港去度假。英国首相威尔逊先生也宣布过英国不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任何一个据点和军事基地。美、英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的一些具体做法上，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对于巩固全世界的殖民主义制度，他们没有什么根本分歧。美国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有什么理由认为，英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会回到它们原来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呢？所以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都是一个整体。全世界人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个斗争中互相支援。

越南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不单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是对全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作出贡献。如是战争扩大到中国，中国要坚决抵抗，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

中国不只是看到一个台湾问题、一个香港问题、一个澳门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美帝的全球战略。要准备一场全世界的战斗，才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能够允许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有安全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很相信美帝国主义的话，总有一天他们要上当的。

赫鲁晓夫说，中国自己不解放香港和澳门，而让亚洲人非洲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让他们为中国火中取栗。这是恶意的挑拨。赫鲁晓夫想指挥中国的政策。我们回答说，中国的政策要由中国决定，不能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决定。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不下最后决心而始终处于动动摇摇的状态，这只会失败，不可能胜利。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同朝中人民进行过较量，现在正同英雄的越南人民进行较量。美国承认这种较量对它很不利。对我们来说，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种较量大有好处，它把全越南人民团结起来了，把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把全世界反帝反殖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

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界线是美国打破的，不是中国打破的。我们愿意遵守界线，而美国却恣意打破界线，横冲直撞。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中国决不采取现代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

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把殖民主义的枷锁重新加在各国人民的身上，使各国人民遭受奴役，遭受宰割；或者按照敢于斗争、敢于反帝的人民的意志，坚决进行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结束殖民主义制度，使全世界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两条道路，人们只能选择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者苟且偷安的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愿意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选自《陈毅副总理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 周恩来

### 一八九八——一九七六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0年赴法、德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和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1924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会委员长及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任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27年3月参加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蒋、汪叛变革命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中共“六大”之后，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江西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等职。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8年底到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1945年8月与毛泽东一起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南京。1946年11月后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从中共“五大”到“十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中共“六大”至“十大”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八届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一生为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是作者从国统区回到延安时发表的演说。作者首先分析了当时二次大战的形势，勾勒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初现、而中国抗战仍处于相持阶段的总图景，继之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中国人民。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战的精神和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成就，赞颂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对抗战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景表现出不可动摇的信心。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是作者在万隆会议上的演说。1955年4月，有着共同历史遭遇的29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作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面对着帝国主义企图破坏会议的阴谋以及各与会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作者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在这篇

演说中，作者雄辩地论述了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说明了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立场。这一演说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整个活动，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打开了有利的局面。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1962年5月10日）是作者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从50年代后期以来，“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反右倾”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加上1959年至1961年的连续自然灾害，国家在60年代初一度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从1960年秋冬开始，党中央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到1962年初情况已有所好转。在这篇讲话中，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了经济工作中依然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指导思想和调整工农业生产的原则。作者在这里所提倡的“临事而惧的精神”，并不是指在困难面前徘徊不前，而是提倡实事求是、谨慎郑重，表现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著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么，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

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可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哪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哪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哪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哪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的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

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决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像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的，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国民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友言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与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

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之后，日内瓦会议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有被破坏的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心的人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1953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

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岛恢复领土权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成的。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他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



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

###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像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

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

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的。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

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1967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1967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1967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

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像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

闻一多  
一八九九——一九四六

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少年时即开始创作诗歌。早年参加文学社团“新月社”。1922年赴美留学，专习美术、文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1944年加入民主同盟，次年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长。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与血腥统治造成的黑暗现实，使他拍案而起，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中。1946年7月14日，在参加追悼李公朴大会后，于归家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

《最后一次的讲演》（1946年）是作者在爱国志士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他们不顾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反对，一方面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一方面血腥镇压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7月14日，昆明一千多民主青年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追悼会，悼念李公朴先生，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闻一多在会上慷慨陈词，怒斥反动当局，对反革命、反人民的白色恐怖表示了极度的愤慨和蔑视，显示出不畏强暴、不惧牺牲、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他在会后即被反动派暗杀。他的牺牲，使这篇“最后的演说”更闪射出辉映千古的壮烈的光彩。

### 最后一次的讲演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污，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的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也遭遇了反动派的暗杀，这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摇头，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也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害怕，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呵！在恐怖呵！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真理是一定胜利的。反动派的无耻，就是李先生的光荣。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

现在，有人要打内战，只是利用美苏的矛盾，但是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美苏间不是没有矛盾，但是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我们的新闻被封锁着，不知道英美的开明舆论如何抬头，但是事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改变。

其次，反动派干得太不像样了，在四外长会议上不要中国做二十一国和平会议的召集人，这说明人民的忍耐有限度，国际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李先生赔上了一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李先生倒下了，也要换来一个政协会议的召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信心！（鼓掌。）

“一二·一”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近的如“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他们以为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我们便就没有人了吗？特务们，你们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青年决不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选自《闻一多全集·演讲录》）

## 朱 德

一八八六——一九七六

四川仪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在蔡锷所部任营长、团长等职。1915年参加反袁起义，出征四川，升任少将旅长。五四运动后逐渐接受马列主义，随后赴德留学。1922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国参加革命活动被德政府驱逐。1925年赴莫斯科学习。1926年夏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蒋介石叛变后，他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后率部分起义军在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1928年4月率部在宁冈与毛泽东所部会师，成立红四军，任军长。1930年起任红一军团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委主席。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错误，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了坚决斗争。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司令。1941年中革军委成立，他任副主席兼军队总司令。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常委会委员长。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从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的一生为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尤其是领导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保卫国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是作者在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发表的演说。1946年元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实行和平民主的决议。作者在演说中指出，和平民主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多年浴血奋斗的结果；从停战谈判和政协会议成功的直接原因来说，则也是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结果，是美苏英三国政府协助的结果。作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和平民主国家的真诚愿望。尽管这一愿望被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的战火所否定，但这篇演说仍是中国共产党人维护民族团结、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一个历史见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1948年8月18日）是作者在解放战争发展最迅速的几个月中所作的几次讲话。在第一次讲话中，战局大势是敌人寻我在中原决战，而我认为决战时机尚不成熟。时隔三个月，在作者作第四次讲话时，形势即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不是敌人寻我决战，而是我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了。解放战争的雄伟壮阔，由此可见一斑。



《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时的讲话》（1954年4月25日）是作者对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毕业班学员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作者论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问题，重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指出了团结对于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作了严肃的批评。

### 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的演说

今天我们开大会，庆祝和平民主。我们中国人民求和平，求民主，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了，直到这一次，1月10日，才由蒋主席和毛主席下令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1月31日，才由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行政院，通过修改宪草原则，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础。虽然停战以后，各个地方还有一些个别的零星的冲突发生，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实行起来还会有更多的波折，但是从大局方面来看，国内和平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全国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上和平民主与建设的新阶段。这个事实，已经不能抵抗了，已经不容怀疑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庆祝和平实现！庆祝全国民主开始！）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的这个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从根本上说来，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年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民主力量25年奋斗的结果，是解放区人民和军队8年奋斗的结果（全场大鼓掌），也就是说，今天到会的每一个人，对于今天的胜利都有贡献，都有功劳。特别应当指出，多年以来，我国无数的志士，无数的先烈，为了和平民主的目的，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抛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鲜血，由于他们的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他们的遗志今天已经开始实现了，他们今天可以瞑目了。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要达到今天的和平民主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要开始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国家走上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就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的原因来说，这是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与全国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团结合作，互助互让的结果，这又是美苏英三国政府与人民一致努力，特别是马歇尔将军直接参加国共谈判，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促成中国和平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向国民政府蒋主席致敬！（鼓掌）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致敬！（鼓掌）向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先生，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民主同盟的各位领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致敬！（鼓掌）向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元帅、阿特里首相致敬！向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致敬！（全场鼓掌，并高呼：拥护国共长期合作！拥护各党派长期合作！拥护中美苏英亲密合作！）

现在国内和平已经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化的决议也已经通过，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我们过去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产生这些决议，今后还要作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些决

议。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时候，向全中国全世界作了郑重的诺言，宣布他一定坚决的忠实的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坚决的忠实的实行和平建国纲领，我们欢迎蒋主席的这个诺言。我们拥护蒋主席实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实行和平建国纲领。但是大家知道，在世界上不但有美苏英各国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日本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其他阴谋破坏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在中国不但有愿意执行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人们，还有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汉奸、伪军、亲日派、内战挑拨者和其他阴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国民党、各党派与无党派的民主分子，和国内外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来实现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不让任何人加以破坏。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与各党派合作，实现这些决议，保证国家的民主化。我们不但要实行已经通过的这些决议，因为这些决议的实行还只是全国民主化的开端，我们还要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继续努力实现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与文化改革，使全国的政治彻底民主化，全国的军队彻底国家化，使三民主义彻底实现于全中国，使中国成为近代工业化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全场鼓掌，并高呼：拥护蒋主席实行改组国民政府！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军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要做极重要的工作。我们已经彻底执行了停战令。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平建国纲领，它们的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已经执行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根据这个标准来重行检查一次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看我们已经实行的是否还不完善，还有缺点，如果还有，就要毫不迟疑的加以克服。那些还没有实现的，我们应当绝对忠实的去贯彻实行。我们解放区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不要钱，不怕死，全心全意服务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军队，除此以外，我们的军队不知道任何个人的党派的私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经过种种艰难困苦，创造了、发展了一支国家的人民的军队，这就是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纵队，现在国家民主化已开始实现，我们的目的已开始达到，这些军队即将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的最忠实的服从者与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将一如中国国民党一样即将停止在军队中党的组织活动，我们无论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军队国家化方面，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都要力求成为全国的模范。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加倍努力，把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参加全国范围内的民主事业与建设事业，推动其迅速前进，把全中国都建设好，我们的责任是双重的。是的，解放区的工作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解放区本来是全国经济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又受了战争的最严重的摧残，但是只要我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我们就有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有信心完成我们的双重任务，像过去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做过的一样。解放区在今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代中，将有伟大的发展前途；全中国在今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代中，将有伟大的发展前途。（鼓掌。会场高呼：加强解放区民主建设，推动全国民主化！）

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建设新中国！

国共合作万岁！各党派合作万岁！

中美苏英亲密合作万岁！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万岁！万万岁！（全场高呼，长久不息）

##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 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

### 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一）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汉楚相争刘邦与项羽的决战即在中原，韩信将兵所以能“多多益善”就是因为那里人口众多，地区广大。

（二）今年（解放战争第三年）战争的第一个月（七月）已取得很大胜利。八月快要完了，还剩下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能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将战争继续引向蒋管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

（三）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这点，美蒋对我们都估计不足。太原、济南是可以打下来的。

（四）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五）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得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都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就要着重解决“把生产提高一寸”的问题。这点每一个人都有份，都要努力去做，争取成功。

### 十月一日的讲话

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长春敌人可能逃跑，但我们有八个机动师能够消灭他们。

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还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

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比我西北野战军大，一时消灭不了他，时间要放慢些。

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

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当然吴化文即使不起义，我们同样可以打下济南。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

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因为中原粮食富足，地势平坦，便于大兵团的作战。在该区我之有利条件为：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敌人的兵工生产不如我们，他们主要靠美国帮助。

这次打下济南缴获炸药很多，对我们有很大用处。冀中每年可产一千多万斤硝，可做炸药。炸药，敌人不敢使用，怕炸死自己，而对我们却能起很大作用，它比炮厉害得多。

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浪费，现在仍然组织得不够理想。这在内线作战时还没有多大关系，而在外线作战时则关系很大。所以今后要把我们的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现在是六个人抬一副担架，如果组织得好，两个人即可，可以节省运输力。

现在打仗，人的思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拚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都是那样坚决，所以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当然，除了靠我们的机动部队外，还是需要各地方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另外，解放战士占我军的比例很大，以后对解放战士要加强教育，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订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

#### 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关于东北问题，美国人曾叫蒋介石撤出东北，不要孤守待毙。蒋介石虽然也看到了这个形势，但反动统治阶级临死也还要作最后挣扎，不愿撤出。现在打下锦州，他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敌人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守，但还是失败了。现在我们有二个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长春敌人也想趁这时撤退，但锦州我们很快就打下来了，力量即可以抽出，因此敌人不容易撤退。蒋介石的战略现在有所改变，他放弃若干孤立据点，这是在我们攻下济南以后才改变的。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傅作义主要还是靠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十六军等，而他自己的则不行。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他最怕的是我们搞他的张家口。绥远也是他重要的后方，而北宁线则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现在他的力量放在西面。但蒋介石的战略是要保住北平、天津，不愿傅作义的主力继续往西进。

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即使一下打不开，长期围困，饿也把敌人饿死。我们打太原的部队，除了太岳军区的八纵队以外，其他都是刚编

成的新部队，所以在战术上、攻坚技术上不那么熟练。但这样的部队，能打这么大的城市也不简单。

彭总那里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对他那边目前不能多增兵，因为多了也没有饭吃。如果太原打下，彭绍辉纵队可以调过去。

山东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青岛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所注意的战略要点。我们现在不去打它，因为有美国军队在那里，等到将来再集中力量去打它。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谭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

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他撤出孤立城市对我们也有利，这样我们的后方可以更加巩固。美国叫他撤到长江以南，如果他照办，将二百万部队放在一块，对我们也比较麻烦。

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好好学习，把书本上的与实际的对照一下，看一看对不对。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今年补充的人员经过训练，比过去强。打下一些城市后，也补充了一些人员。现在有十万俘虏补充到我们的部队，所以这几个月的工作要着力把俘虏教育好。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再一方面加强政治工作，反对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各自为政等现象。

过去对接收城市无经验，现在则不同了，能掌握政策，有经验了。过去石家庄解放了两个月，商店还不敢开门，而济南解放后，一个星期即开业。敌人现在丢一处地方即无法恢复。我们要加紧准备工作，迎接突变——敌人垮台。

####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

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大军有饭吃，有房住。现在我集中华东野战军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纵队，加上两广、特种兵、鲁中南、渤海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共十七个纵队，再加中原刘邓的六个纵队，在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弹药我准备了八个基数。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刘峙的指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不像白崇禧那样狡猾会逃跑。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所以冯部起义正适合时机，是我们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在消灭黄伯韬兵团的同时，原想把邱清泉兵团引出徐州来，所以我阻援部队有意后撤了一点。刘峙以为我们要跑，叫下面追，但下面不敢迫。中央社也吹。但邱部的后尾始终不离徐州，尽管眼看着黄兵团被歼。不过邱、李兵团在我预定的阻击下损失也不小。现徐州集中了邱、李、孙三个兵团不易打。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资格老，但指挥并不怎样高明。比较高明的是白崇禧，他看到要打败仗不肯来。黄维兵团来路远，走得急，过河多，受我游击队袭扰，辎重掉在后面路上，汽车

没有油，机械化反成大害。他情况不明，根本不晓得我刘邓部队在哪里，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有群众基础。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他没有强固阵地依托（黄伯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点亏）。他原来的前进方向是徐州，我们从侧翼打他，他向东与李延年、刘汝明靠不上，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李延年、刘汝明是否北上？我们希望他们来，不过他们的劲头不大，其中从东北撤回来的部队情绪不高。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他们没有粮吃，没有援兵。

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如果逃跑，塘沽是个冻港，海上的路走不通；如从陆上顺平汉、津浦铁路南撤，那样时间既长，而且我解放区的群众都是有组织的，虽然不能全部消灭他的部队，至少也要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失。到那时我东北大军势必跟踪猛追，我南面的部队还可以截击。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傅作义过去守涿州出过名，东北军没有把它打开。他又看到阎锡山暂时守住了太原，于是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消灭了徐州的敌人及傅作义、阎锡山部后，留下的还有马鸿逵、马步芳和胡宗南部。我西北野战军力量较小，今后西北方面再增加一点兵力，求得把胡宗南部消灭在陕西，如他退到四川就比较费事。我大军入川必须有良好的供应线。不去不行，扫帚不到的地方灰尘不掉。另外，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缩回广西也比较麻烦。至于蒋介石的部队倒无须顾虑，顶多只能再到广东去重建家务。

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

### 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 时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的学员，经过三年四个月的努力学习，现在就要毕业了。根据学院的报告，你们平时历次的测验、考试成绩和已经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想定的国家考试成绩，平均都在四分以上，说明你们学得是很不错的。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祝贺你们在学习上的成就，并希望你们在军事理论课程的国家考试中继续获得优良的成绩。

军事学院创立三年以来，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这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之下，军事学院全体训练工作人员、政治工作人员、物质保障工作人员、行政工作人员和学员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军事科学家热忱帮助的结果。在这里，我特向你们致以谢意。

现在，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我国的安全，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

必须认真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吸取苏军建军经验（目前应特别注意参谋工作、训练工作），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是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军事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是由过去军事建设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进到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高级阶段。过去，由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要实现这一转变是不可能的。现在，各方面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大量培养为现代化军队所必需的干部就有可能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同样是不可能的。各学院、各学校应明确认识自己在国防现代化的建军任务中所负培养干部的重大责任。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有德有才，也就是必须忠心耿耿地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努力学习，使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有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和为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所必需的文化水平，并能掌握业务，富有革命事业心。只要我们有了这样大批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到陆军、海军、空军中去，在党的领导之下，全军努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建成就一定可以实现。

党的团结是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保证。过去，就是由于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并依靠全党的团结，领导和团结着全国人民，才有可能克服我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国外的敌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当我们的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当我国的阶级斗争更趋深刻化的时候，我们的事业是更加伟大和艰巨，我们所要进行的斗争将更加尖锐和复杂。因此，全党同志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军队的高级干部的团结，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

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种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及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思想，不受到党的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害。为了克服这种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增进党的团结，全党、全军、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清楚认识：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党的最高利益，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帮助敌人危害革命。因此，每个同志都应该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作为自己一切思想、言论、行动的标准，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坚决克服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全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明确认识：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就是说：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只有这样，全党全军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我们艰巨的历史任务。

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你们

学习了和正在学习着先进军事科学知识，是我军建设中的领导骨干，但是决不能因此自满起来，要知道，科学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不会停止的。希望你们继续学习，把所学的军事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国防建设、保卫祖国、护卫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实际斗争中去，直到战胜敢来侵犯我们的敌人，以完成我军的光荣历史任务。

（选自《朱德选集》）



## 彭德怀 一八九八——一九七四

湖南湘潭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出身贫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根据地。同年11月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反“围剿”作战。后参加长征，历任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支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抗战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中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彭德怀一生光明磊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1947年3月3日）是作者在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作的战前动员。此时敌人大兵压境，胡宗南率领17个旅的兵力向边区大举进犯。中共中央向边区军民发出了保卫延安的号召。在这篇战前动员演说中，作者首先说明了为什么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即为了要和平、要分地、要民主，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道理说得简捷明了，毫无书卷气。接着，他用红军当年以二十比一的兵力战胜敌人，而现在我军早已发展壮大并大量地歼灭过敌人的事实，给边区军民树立起了我军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并提出消灭敌军、打到西安去的设想，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大无畏气概和藐视敌人、敢打敢拼的骁勇性格。“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恰是对彭德怀元帅疆场形象的真实写照。从这篇演说中亦可见一斑。

### 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

同志们！我到延安四年了，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抱歉。

今天我们开一个动员大会，胡宗南已调了十七个旅，三十五个团来进攻边区，进攻延安。

敌人侵犯合水、庆阳，已被我们打出去了。

洛川、宜川这方面，敌人集中了十三个旅，要准备进攻延安。我们也要把它打出去！

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打我们的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它，不消灭它，就不能和平。我们农民要分土地，土地没有分好的地方还要继续分，敌人来了也要分，因为地分了，敌人虽然来了，也抬不走，要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成家立业，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种地。我们农民不种地就没有饭吃。胡宗南的进攻就是来破坏我们分地，使我们农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它是保护大地主，保护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粉碎胡宗南的

进攻，把它打出去！

蒋介石要实行独裁，我们要民主，把中国变成是大家的。为着民主，也要打垮他的进攻。不取消蒋介石的独裁，中国就没有民主。

国民党蒋介石要卖国，第一个卖国贼是汪精卫，把中国卖给日本，现在又出了一个卖国贼蒋介石，他要把中国卖给美国帝国主义。我们要中华民族独立，我们就要取消蒋介石的卖国专政。要和平，就要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要分地，就要粉碎他的进攻！要民主，也要取消他的独裁！中国民族要独立，也要取消他的卖国专政！不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这四样事情，都得不到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消灭他的进攻军队。

我看能消灭它。有人要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这自然是有证据的。

1935年的事情就是证据。当时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可是那时候的敌人有多少呢？

据我记得的，那时敌人有一百一个团，三十万人。今天胡宗南却只有三十五个团。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可就大不同了。边区那时只有三四十万人，五个县，现在我们是大的多了。大家想一想，看我是不是扯谎。（群众：是真的！）没有扯谎，这是事实。当时红军却总共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比之。可是今天他只有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我们比那时的一万五千人就多的多了，我们能打胜吗？（群众：一定能打胜的！）是的，是一定能够打胜的。

当时，我们在南线，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胆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

现在，已过了十一年了。恐怕不能这样来比，现在我们已消灭了他六十几个旅，捉了他一百一十九个将官。我们所有的解放区，华北、东北、苏北，早都起来，消灭敌人的进攻。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消灭他六十个旅，再捉他一百一二十个将官，把进攻者一起捉来，这样子就会实现和平、民主，中华民族就会独立，农民就会有土地。

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

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消灭他三十五个团后，他打延安，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消灭了他三十五个团，他西安就没有兵了，我们还不到西安去吗？这可能不可能？（群众：能！）是的，我看很可能。这要看大家努力，努力大，早一点，努力小，迟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是可能的。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朱自清 一八九八——一九四八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文学研究家。他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朱自清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大学毕业后，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茅盾领导的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则从诗歌转以散文为主。这一时期的散文着力于揭示社会黑暗，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正直诚实的性格。1931年朱自清去英国留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次年归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在西南联大出任中文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不顾生活清贫，以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起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难，使朱自清震惊和悲愤，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悼念大会，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并嘱咐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1948年，朱自清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朱自清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下，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这里选编的《论气节》，就是他病逝前二年，在清华新诗社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晚会上的讲演。

《论气节》（1947年4月9日）这一演讲从气节在我国古籍中的最初涵义入手，论及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对气节的不同认识，显示出朱自清深厚的国学功底。朱自清高度赞扬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抛弃传统的消极的“气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肯定了气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朱自清在这里所褒扬的，正是他日后所实践的。二年后，他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宁饿死也不接受“援助”，表现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无怪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睬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

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鉤党”，“鉤”是“鉤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于“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作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作清高之上，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

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国民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中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倒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选自《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 蔡 畅

一九 —— 九九

湖南双峰永丰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1915年入长沙私立周南女子师范求学。191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参加过反帝爱国运动和五四运动。1919年10月与向警予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上海、香港妇委委员等职。1931年底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白区工作部长兼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后历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常委，任女工部长。建国后，为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和第四、五届副委员长，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在40年代后期，她还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副主席。蔡畅一生为妇女解放、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1947年8月30日）是作者在一次妇女大会上的演说。作者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说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能否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客观方面即社会环境条件。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将妇女禁锢在宿命论、“三从四德”和阶级、民族压迫的层层囚笼中，因而妇女难以进入社会活动的舞台。解放区则完全不同，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上与男子完全平等，因而出现了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新气象。但只有有利的外部环境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积极努力、自觉地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主观条件。作者运用了大量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道理，加之作者本人作为妇女奋斗争解放的典范，在话语之间无不浸透着自己的切身体验，因而令听众兴趣盎然，并感到特别有说服力。

###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今天讲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能干，什么也能干，不干，什么也不能干，能干又不能干，不能干又能干。”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确定女人能干不能干，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要看看环境，就是要看处在一个什么政权下，什么社会制度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个人努力怎样。如果环境好，自己不去努力，只靠人家解放，那就什么也不能干。但如果自己经常努力干下去，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如果努力干，就是从些小的具体工作到管理国家大事都能够干；如果不干，就又会变成新社会的寄生虫。

男女的智力，本来没有大差异，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便知。原始

共产社会，有所谓母权时代，那时妇女能生产，执掌家政，很多事情都是妇女来管，甚至男子打回来的野兽，也要妇女来负责分配。但一到封建社会，由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出现了阶级，强悍的封建主，夺去了别人的土地，让农民给他耕种，于是就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之分，就有了贫富的悬殊，随之也就有了男女的悬殊，男人掌握了家政，作主人，女子降为从属的地位。那时候，当了主人的男人创造了“宿命论”来统治被剥削者，麻醉他们从思想上不要求翻身。对占人口半数的女人呢，更制造许多封建道德，如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论调来剥夺女人发展能力的机会，使女人从广阔的社会活动渐渐退到狭窄的小天地——家庭里去。这样来巩固他们的统治。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把我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们勾结了封建统治来榨取广大的人民，这社会的女人，还是喘息于封建压迫之下。

至于八一五以前，完全殖民地化了的东北，日本统治者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待，他们给女人能力发展以最严格的限制，即使极少数有机会念书或就业的女子，也受着纯粹奴化的思想教育。女学校里教的是怎样烹饪，怎样当太太，怎样侍候老师和客人，机关里下级的女职员，便是侍奉上级和忍受上级的戏弄。在这里曾经身受其苦的女同胞，会比我得更清楚。

说到劳动妇女，无论在封建社会也罢，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罢，或殖民地社会也罢，都受着剥削和封建压迫的两重痛苦，比其他阶级妇女更苦些。现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大不相同了。施政纲领上规定女子，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地位与男子一律平等，不仅在纲领上规定，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行。解放区里有女专员，女县长，女政委，女主任，女区长，女村长，女经理，女编辑等。学校里没有男女的限制，工作中没有男女的限制，只看能力和工作经验来决定工作，不像旧社会的以年纪，相貌，财产，资格等，限制女性。我们看看东北解放区吧：

最高政权机关政委会有女委员（兼松江省教育厅长），宾县的女政委，哈大理学院的女院长，裕长源火磨、松江商场等的女经理，各省市的女参议员，女校长、女科长，女秘书和女区长，女主任，女队长不可胜计。女护士，女会计，女电报、电话员等各种技术人员里面，也涌现了大批的模范与英雄。

这是女知识分子方面的，至于劳动妇女呢，也普遍地得到提高与深造的机会。过去劳动妇女百分之百的文盲，不仅在社会上没地位，即使在家庭里也没地位。但解放以后的她们也和男子一样卷入了土地改革斗争，一样的分地分房子，一样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而且和男的一样站在生产的最前线；拥军劳军支援前线，捉匪防奸，巩固后方也尽了很多力，因此出了不少女英雄、模范和群众的领导人物，这些女人，不仅在社会上看重她们，即使在家庭里，也获得了尊敬。现在很多当丈夫的抱着孩子，让妻子去开会，婆婆也舍不得骂能干的媳妇了，她们亲手把“三从四德”，“烧茶做饭，喂鸡抱蛋”等等许多坑人的枷锁粉碎了，现在举个例子：

陕北土地革命的折聚英，原是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姑娘，后来参加了土地改革，又带头努力生产，组织妇女自卫军；后来进女子大学学习，提高了文化，总共不到几年的工夫，便当上了政治指导员，延安县的参议员，能文能武，被群众所爱戴。齐齐哈尔的石老太太，斗倒了窑主之后，她恨旧社会害她不识字，她就把斗争的果实（二十万元）拿出来办学校，她积极出来替群众办事，遇到困难时，她便和群众开会，大家伙出主意来克服困难。现在她

是嫩江省的参议员呢。

至于洮安的张寡妇，瓦房的杨老太太，北安的吴大嫂，和东北各地成千成万的翻身妇女，在民主政府的各种协助之下，都正以超凡的热情，因公忘私地努力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提高别人和提高自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也说不完。她们拿自己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因之家庭地位也随之提高。总之，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解放了的妇女正以飞跃的姿态来改变着自己原来的面目。

我们认为妇女解放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在经济上翻身，所以我号召妇女起来分土地，分房子，生产。我们对劳动生产是看成最高贵，最有价值，最荣誉的事情，希望妇女能劳动致富，从经济上翻过身来。

我们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解放根本谈不到。这也证明了有正确的领导，而且加上主观的努力，妇女什么也能干了。劳动妇女能干，知识妇女也能干。

有些女同志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在参加革命的初期，我工作和男的一样，为什么后来不如男的呢？”其原因之一是女人除了革命的工作外，还有另一种任务，就是生孩子和带孩子，所以前进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的，“之”字形的。正因为这样，女子更应当努力，不然就会赶不上，就会掉队。当然我们要想办法设立保育机关，减轻妇女一部分负担，但总不能减轻怀孕十月的负担。妇女的重担在两肩，因此要有一股劲，否则想作又不作，作起来又没劲，看见别人前进自己又不舒服，作了一下又放下，这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女性，又有些人想过去如何好，将来如何好，现在却不好好干，这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还有些人眼高手低，想于大事不于小事：要作政府委员，不作技术工作，认为自己能力很高，想一干，就变成英雄，闻名世界。这些思想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必须知道，妇女几千年来被剥夺了培养能力的机会，因此养成了好些懒性和缺点，如果我们不加倍努力和注意克服，就很容易落后。

“一生了孩子的女干部能不能工作？”我说：“能工作。”过去在蒋匪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妇女，哪一个不是有一儿半女的呢？那时的环境比现在解放区坏得多了。又看看，现在在乡村工作的翻身妇女，哪一个不是带着儿女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有了孩子能不能工作，而是有了孩子怎样把工作搞好。那就看我们是否有毅力，能不能吃苦，和办到科学的管理家务和孩子，和有条件的节制生育等等。

未婚的女同志在工作中，可能碰到一些与自己有关的切身问题，如在某机关中工作，有男同志向你求婚，怎么办？这权柄是属于你自己的，由你决定。有人问，是否可以不结婚。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结婚是生理上的需要，问题在于怎样避免多走弯路，减轻这个曲线的角度，如果现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为了很好工作，这个问题可以推迟几年再解决。假如要结婚，就要考虑生孩子的问题，如果事先没有这样的准备，生了孩子后，自己会感到悲观失望，前途暗淡了。

不可否认，女同志有了孩子，是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的。同样要把工作做好，则有孩子的女同志比没有孩子的要苦得多，累得多。这一次我看见好些做群众工作的女同志，很多是带着孩子的，洮南有一个女同志带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保姆，同样把工作做好。她们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相反的，后方机关里有个别的女同志，生一个孩子有一个保姆，依然



不工作。可见得问题在于我们主观努力够不够，毅力够不够，和善于克服困难与否。

现在我们妇女讲自己的问题，当然强调自己尽了一切努力，至于组织上多体贴和多帮助女同志解决困难也是应该的。不过这超出我们主观力量范围了。女人能干什么，决定于历史条件，决定于主观努力，这是真理，中外都差不多，我这次走过的欧洲民主国家，见过的那些妇女，都是什么也能干的，像捷克的妇女，在祖国解放战争中与异民族作了残酷斗争后，现在复兴建设，都干的很好。法国的妇女领袖，自然科学家戈登夫人，年纪七十四岁还在那里干。苏联有一位很普通的农村姑娘，她由学校毕了业，在火车上学司机，很多人认为她学不好，但后来她学好了，而且还号召了许多的女性去学，并在一个火车上完全由女子来管理一切，抗德战争中她运输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被奖为英雄，后来不断苦干，荣获少将头衔。我在莫斯科曾访问她，她说：“这没有什么诀窍，我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斯大林政策的力量，只要对人民有利的我就去做。”她现在是莫斯科地道车管理局副局长。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今天我们解放区，有良好的政治条件，如果我们仍然觉得干不了什么，那就是自己不努力，或努力不够的结果。假如单靠党和政府供给，坐享革命之福专吃解放之饭，那即使有了解放的条件，我们自己不去改造和栽培自己也是枉然。

我们要干，什么也能干，但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们都是旧社会里来的人，过去在旧社会里生活，甚至替统治者做事，都是不能免的。这且不去说它，但是今天呢？在今天新的政治条件下，应该替谁干，为封建残余，地主恶霸服务呢？还是替人民服务？说也奇怪，虽然在新的政治条件下，可是还有人愿意替日暮途穷的统治阶级服务，也有一些不知不觉地替统治阶级服了务的，很多狗腿子和特务，他们已被人民严正打击或被人民清算。很明显，为前者是白流汗，如果为人民干，不顾个人利益，那是最光荣不过的。

另外有一种人认为我是为自己干，是为了自己出头露面，扬名显亲，得一官半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已成为新社会的渣滓，应该去掉，因为有这样思想的人必然是自私自利，脱离群众的。我们所需要的英雄，是群众英雄是集体的英雄主义。如果没有群众拥护一味追求名誉地位，前途也就很危险。据说我们东北青年英雄气魄很浓厚，我希望把它发扬为集体英雄主义。

为谁干是个思想问题，确定这个思想，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人生观，即是为谁而生存？为国家民族，广大人民呢？抑或为个人私利而生存？人生观确定，就可以弄清楚替谁服务了，当然，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呢，还是替人民服务？这个人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绝不勉强，只有自己从思想上认识应该为人民服务，才算是站稳了立场，才是真正的人民勤务员。

为谁干决定了，那么，干什么呢？目前主要的题目有两个。一是人民的翻身，一个是支援爱国保田的自卫战争。这两个大课题下有许多具体工作，积极参加城、乡的各种翻身斗争，从领导斗争到替人民记帐，站岗放哨，代民收割，推动各种优属拥军、扩军的工作，参加或管理后方生产事业，儿童保育，乡村卫生，妇女识字，交通运输，部队政治，文化娱乐等，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何止千种，种种都是具体的革命工作，都需要人去做。

怎样干法才干的好？这又需要我们去注意了。我们干工作是要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这样一定干的好，没经验的也能很快地得出经验来。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例子，苦干的，正派的人，常常由工人升为厂长，站长，在农村中

和政府机关里也如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政府是人民的，故能注意培养人材。有些人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合口味的工作就不干，有些呢表面看干的不坏，实际上干的很差，因为这些专讲表面，图形式，铺张，还带有很浓厚的旧习气，对上逢迎，对下蛮横，这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干什么工作，要服从组织分配，因组织是根据工作需要的，服从组织要思想上服从，而不是盲从，做工作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不要因此而垂头丧气，不会干，可以开会讨论，交换意见，想办法，向群众学习，不要以为自己有天才，不相信群众的天才，我们要放下架子，当老百姓的小学生，不要光以为是群众的老师。我们在工作中，不要只会动手动脚，而且要会用脑子，要很好地思索问题，总结经验。所谓经验，就是从许多很小很小的具体工作中积累下来的，这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积累过程，就是我们培养能力，把自己提高的必经之径。此外没有任何捷径，如果我们偷懒，基础不打好，脱离群众地往上爬，爬到半岭掉下来会摔得更痛。

总之，共产党解放了妇女这个条件已具备，剩下来便是我们自身努力的问题了，我重说一遍，我们是从几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到了实际中一定会遇到好多困难，但假如我们能把握住正确的认识，有毅力和善于克服困难，那么什么困难都要在我们面前低头，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并且相信妇女自身的力量。

（选自《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3 年版）

## 冯玉祥 一八八二——一九四八

安徽巢县人，中国近现代爱国将领。少年时入保定练兵营从军，后入袁世凯武卫右军，任第二十镇管带。辛亥革命时，曾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共谋滦州起义。辛亥革命后任近卫军团长。1914年入陕镇压白朗起义；任旅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坚决反对，并促使陈宦在四川独立。张勋复辟时，他率部入京讨伐。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发动北京政变，通电主和。后组织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多次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1925年任西北边防督办，统领西北军。翌年赴苏联考察，加入国民党。回国后被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1928年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发动反蒋中原大战。1933年建立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多次击败日寇，收复失地。因受蒋介石压制而辞职。他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反对内战，主张坚持抗日、建立联合政府。1948年因乘船失事，受伤身亡。

《国庆演说》（1948年10月10日）是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纪念中华民国成立三十七周年集会上的演说。当时作者正在美国考察。此时中国大陆上，人民解放军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的胜局已不可逆转。但国民党、蒋介石仍在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一方面在军事上拼尽全力，一方面对其后方的进步学生、民主人士和广大民众大肆镇压，其反人民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冯玉祥在演说中历数了蒋介石专制统治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广大人民在这种统治之下遭受的重重灾难，对推翻专制统治、在中国“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表示了充分的信心，并号召青年学生们团结奋斗，唤起民众，以促使民主的胜利早日到来。作者以其特殊的身份说出这些话，具有独特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 国庆演说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们能来纪念中华民国37岁的生日，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我们才成为民国。什么叫民国，就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了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在说别的话之前，我先回答两个问题。有人说：“冯玉祥是政府派出来的，为什么批评南京政府贪污无能，压迫人民打内战？”你们想想，如果我说南京政府非常清廉，没有杀学生，没有捕学生，没有征兵征粮，没有抢米的风潮，……你们看可会有人相信？人家会指着冯玉祥骂，说我不讲良心话。

又有人说：“你和蒋先生是好朋友，做国府委员和常务委员就是二十年。有话为什么不当面说？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大家不知道，我不是不说，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但说了，而且每次说了之后，还加上一封信。我出版一本《蒋冯书简》，看了就知道我一切的话，都说完了。说了人家不听，如今我不能不向全国同胞说话，向世界人民说话。我们看训政训了二十年，实在不是国民党训政，而是一个人、少数几个人的训政。

今天在纽约能和这么多中国的青年主人翁们见面，是冯玉祥到美国后第

一次最快乐的事。这原因还不仅因为我们今天能在一起，共同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 37 岁的生日，更因为诸位是主张中国民主的进步青年。在中文和英文报上，我都看见了，今天这个盛会的发起人，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今年在美东、美西和美中都召集了夏令会，各处参加的同学有百来位，都曾以绝对大多数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张实现中国民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勇敢地提出主张来，真是合于耶稣基督勇敢牺牲的精神。中国史书上说：“禹闻善言则拜。”冯玉祥不敢比大禹，可是愿意学习大禹的精神，今天冯玉祥听见民主则拜。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托，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行政的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本大总统这次是来做你们的奴隶的，就是其余文武百官也都是你们的奴隶。从前帝国时代，四万万人都都是奴隶；现在民国时代，大家都是主人翁，这就是民国和帝国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1921 年 12 月 7 日在桂林演讲词）可惜孙先生 20 年以前说的“大变动”，到今天还是未能实现。少数丧心病狂的特权者，忘记他们是公仆，应为人民服务，他们要四万万同胞做奴隶。可是全中国人民却都要起来做主人翁，要人民自己来“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诸位青年主人翁知道自己做主人翁的责任，响亮地高呼民主，这真是很值得钦佩的。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国际地位是世界上四大列强之一。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结果，中华民国过去 36 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过，老百姓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现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反而不如一个战败的日本。一切和平和赔款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反而被逼迫地和日本通商，又作日本经济侵略的牺牲品。通货膨胀绝对空前，物价比战前高涨了 4 万多倍，财政八个月就亏空 30 万亿元，在全世界数第一位。贪污不法的事情，最著名的像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孚中公司、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外国报纸早把舞弊的情形，登载得清清楚楚，到今天没有听见严厉惩办。今天夏初，南京学生肚子饿了，抬着纸制的大饭碗游行，被军警狂暴地打一顿。武汉大学的学生们睡梦中胡里胡涂被打死了三个。各大都市的学生，很多都遭到特务的摧残。教授们吃不饱饭没有人管，说两句公道话便被解聘。公务员楞腹从公，好的公务员，像北平的余心清少将等，是好的基督教徒，是好的美国留学生，在重庆是最廉洁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只因为说真话，主张和平，便被特务逮捕了。工矿企业家想作一点正当企业，不是关门，就是奄奄一息。工人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最苦的当然还是农民，壮丁拉去当炮灰了，粮食拿去当军粮了，苛捐杂税一齐加在农民身上，人为的水旱虫灾，吞噬了二千二百万的农民。

一句话说，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特权者没有一个人能过好生活，除了英勇地起来革命，便没有出路。这些人都要打破这痛苦的现状，都主张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和它必然实现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大规模剿共已剿了一年零三个月，今天成绩如何，大家天天读报，知道得很清楚。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冯玉祥 12 岁当兵，1946 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没有倒台以前，以为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总可以长期挣扎，然而孙中山先生 1924 年改组国民党以后，团结全国各革命的力量，不到 4 年工夫，便扫荡了军阀，完成了北伐。现在中国人民的力量，从国民党民主派到共产党，经过了八年抗战的锻炼，经过了胜利后民主奋斗的两年努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 1927 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是不能摧毁的革命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今天在海外的同学们虽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虽然你们得不到随便卖给扬子、孚中公司的外汇，虽然你们之中的很多位，只买了半年用费的美金，半年之后的生活费和回国川资都无着落，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要认清，民主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民主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你们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在美国睡洗衣馆熨衣板的精神，要有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不畏惧的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团结起来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让中华民国名符其实，让全中国都成为你们贡献研究心得的自由园地。这样，才不辜负我们今天来纪念双十节一场。

我们今天纪念先烈，要对得起流芳万古的秋瑾女士、黄花岗烈士、滦州起义的烈士和所有的烈士们，必须自己勉励自己，有“舜人也我亦人也”的精神，去努力，去奋斗。最后一句话，你们的决议案好极了，可是我还有一个建议请求你们尽量宣传，每一个人抱定一个志愿，写一千封信到国内去，把国内的同胞都唤醒过来，做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那我们民主胜利的成功就更快了。

（选自《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

## 刘少奇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湖南宁乡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回到上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作。后调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领导工运。1923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925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即赴上海，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夏任中央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首席代表。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中先后任红八军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抗战爆发后，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启任新四军政委。同年5月任华中局书记。1943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职。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逝世于开封。刘少奇一生为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是作者在中共中央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部分记者于西柏坡举行的学习会上的演说。作者从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一角度，说明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并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认为只有把真实的情况、把群众真实的态度、观点、情绪反映出来，才能真正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政策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前一年，作者如此郑重地提出党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是有十分深刻的意义的。事实证明，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与群众越是休戚与共、血肉相连；而在胜利的情况下，则容易滋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所以作者在这里以十分警策的语言告诫人们：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如安泰离开了土地一样，会被人扼死。“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的思想，不仅对于新闻工作，而且对于整个党的作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1949年）是作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演说。在演说中，作者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说

明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建立在政协“共同纲领”基础上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在说到“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作者审慎地认为，要在中国实施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社会主义即是中国的必然前途，又不能一蹴而就。

##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同志们：

很久以前，就想和你们做新闻工作的同志们谈一次话，我过去只和新华社同志谈过，和多数同志没谈过。谈到办报，我是外行，没办过报，没写过通讯，只是看过报，因此，你们工作中的甘苦我了解得不真切。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向你们提点要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

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的处罚。

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联共党史》说了党报的重要性，说明它组织和团结了群众，起了指导革命的作用，而且说它是“中心”。俄国在创立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认为，要首先搞清思想界限，宣传党应该如何建设，方针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然后再来建党。原则问题没搞清楚，建党建不好。如何把原则性的问题搞清楚？办报，办全国性的报纸，使报纸起中心一环的作用。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手无寸铁，就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里从总的方面来说的。所以，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

我们所说的和人民群众联系，主要是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而且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

这是讲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那么，怎样联系群众呢？怎样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呢？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党要通过千

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大会、合作社等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有的同志说，做新闻工作没有兴趣，没有味道，担心是不是有前途。很明白，这是不懂得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自己轻视自己。当然，除了新闻工作，还有别的重要工作，打仗、生产都是重要工作。不能这样讲，“只有我重要”。要了解，除开前方有军队打仗，后方有人办工厂，有人做党的工作等，还需要你们，这是必要的社会分工。

党是依靠你们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呢？除了依靠军政机关、群众团体领导人民之外，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纸和通讯社。现在我们铁路不大通，邮政也不大通，和广大群众通点消息，就靠新华社、广播台了。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

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许多人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你们记者是要到各地去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

我们的报纸现在有几十种，将来全国会有几百种，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的作用。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和要求，看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求什么，把这些东西反映出来。不相关的人看看也许就算了，相关的人就会好好注意，就得到了你们的帮助。我们要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不经过人代会，不经过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危险得很。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因此，这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要对党对人民有很大的责任心。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记者是靠拍马屁吃饭的。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因为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客里空”还能靠这点残余吃饭。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靠资产阶级影响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前途。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如果你的事业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这样，即使你批评了别人，吃了人



家一顿骂，也不要怕。只要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党的路线、方向上，即便一时不得彩，也不要怕，要能坚持，要有点硬劲，要有点斗争性，要像鲁迅那样有骨头，没有骨头，是硬不起来的。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得经验。你们不受多次波折，怎么能锻炼出来！

你们就要出去了，要到群众中去了。听说你们在这里学习后，把握增大了，信心提高了，这很好。又听说你们感到知道的东西很少，担心下去会碰到困难，把握还不够，信心还不高。

你们还年轻、幼稚，还不成熟，还不能自立，这些党是看到了的。怎么办呢？要不断学习。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看国民党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如果你们的工作完全建立在这三个星期的学习上，那是不够的。你们要看一看，做新闻工作需要些什么条件，需要些什么知识，自己必须独立学习、努力学习。这样，你们就有了主动性。

你们的工作还没有上路，我的估计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工作还有些像豆芽，还在生长的阶段，但是生命力很强，将来是会上路的。那时你们对工作就会是熟练的、顺手的了。党老早就办报了，办报的人还没有上路，这是不是估计过低了呢？如果估计过低，那就对不起了，如果估计得对，你们就警惕。

为什么说你们还没有上路呢？这是有理由的。共产党办一件事情，要重新创造，要积累经验，一时办不好，并不奇怪。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比资产阶级落后。资产阶级办报是经过好多年才上路的，把办了几十年的《申报》和刚办的《人民日报》比较一下，我们进步并不慢。说我们进步不慢是不是就要骄傲呢？不是的。你们是给人民办报，是人民的记者、通讯员，人民给你们的任务，是否都已办好了？还没有，还没有上路。我是就这个标准来估计的。

你们要有主动学习的精神，独立地把你们的事业做好。这三个星期的学习，当作一个开始。你们要根据这个方向努力学习，创造条件，增加知识，把工作做好。

你们过去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曾经犯过错误，在人民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们没有责备办报的同志，更没有责备你们，因为这怪不得你们。依照你们在现有的条件，还不可避免地犯些错误。这怪我们没有把新华社、报纸掌握好，我们是批评自己的。但是应当向你们讲清楚，你们过去做错了许多事。过去的责任不追究，要追究的话，我们负责。

我们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成熟起来，我作为一个读者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

为了把工作做好，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

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人民包括各阶层，要加以区别。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看各阶层人民有什么困难、要求和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

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采地反映出来。“精”，就不是拉杂，“采”，就是漂亮。挂点“采”，读起来爱读。你写得不“精”，人家看不了那么多，你写得不“采”，人家不愿意看，所以要拣重要的写，重要的就是“精”的。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缺一面就不是真理。

你们写东西要考虑对象。这就是说每写一篇稿子，就要考虑这篇稿子大体上是写给谁看的。要区别全国与地方。你写给新华社的稿子，是面向全国的，包括蒋管区，而且还有外国人。你们就要考虑，他们需要什么，哪些东西多了，哪些又少了。如果你写一篇太行的通讯，要给各解放区看，就要估计到他们对太行需要知道些什么，怎样写才使他们更有兴趣。如果是报道经验，就要考虑太行的某一经验有无一般性。各解放区却都适用的经验，哪怕只是一个村的，他们也要看的。有的经验并没有一般性，只适合太行用，那就不要详细介绍，人家不看，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这是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呢？不是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因之，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你们要从各方面去考察，用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判断。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

说到全面、深刻，应该说，不深刻不会全面，提不到理论高度，是不会全面的，那只能是零碎的、现象的、无系统的。全面，就要综合，要总结，要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提不到理论高度，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的东西就是要“透”，不是光说明现象、皮毛，而且能说明内部的联系。

要全面，就不要笼统他讲，得分析。一个政策在执行时，要看各阶级、各阶层有什么意见，各种人有什么意见，看这个政策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该拥护的却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各方面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下判断。考察不清楚，就没完成任务，你的通讯人家就不会相信，因为没有材料。没有分析。问题不在于人家是不是相信，而在于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清楚。你们应敢于说：“相信我的通讯吧，不会有危险的。”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你们去访问，不论访问什么人，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新闻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很少有人对他们讲真话。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记者，所遇到的不会这样了。但即使如此，如你问群众，今年的公粮怎么样，所得的回答是“很好很好”，你就报道个好，这不一定真实，因为你听的是表面的话。你们要和群众深谈，要从各方面考察，找出普遍现象，否则，这种反映就不真实。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

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群众就会拥护你们，你一到那里，群众就会找你反映情况。那时，记者在群众中威信高的、低的、影响大的、小的，就看出来了。现在还看不大出来。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党和群众会报答你们的。但是，这是结果，不能当作目的去追求。如果你着急，马上想搞一个全国出名，那只能是“客里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

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艰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就要到处去看，去问，就要读马列的书，做许多研究工作。光靠在这里学习三个星期，下去还不能把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比方说，有时从群众中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个判断并不容易。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就没法判断。有的同志说，过去走了“干部路线”，现在要走群众路线，只提倡群众当家，反对干部当家。哪里会有不要干部的群众路线？那只能变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群众怎样当家？总要选派代表吧，不能几百万人一齐当家吧，干部还不就是他们的代表。许多同志认不清这一点，把群众当家和干部当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独立的思考，不能在分析之后加以正确的判断。

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

有的同志在北平时写得很多，很有人看，可是一到我们这里，写不出来了。他们说没有“自由”，一篇稿子改来改去，把“创造性”给限制了。不是的，如果你写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当然要限制，必须限制的。比方，你写一篇文章，倒是生动活泼，但内容却是只要群众当家，否定干部的作用，这种“创造性”是要限制的。问题在于你当了党报的记者，不是在北平墙报上、不是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这一点要搞清楚。在蒋管区写东西，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列主义，群众就欢迎，呱呱叫；在我们的报上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非马列主义，就得挨骂。

你们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看问题不是马列主义观点，而是别的观点，比方小资产阶级观点等，这样，写东西的盲目性就很大。

因此，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种自由。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不断学习，不只要三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

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自己不懂的问题，应当勤问，可以写信问你们的上级。不懂得党的路线，是搞不好工作的。你们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办报。坚

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是基本的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不否定左和右的谬误，就没法肯定真理，要确定真理，就得否定谬误。

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出你们的创造性了。你能了解群众的真正情绪，他就不能；你能有力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就不能；你写得真实、精彩，他就不能；你能发现党的政策的缺点，他就不能。你的创造性就表现在这里，党不是限制而是鼓励这种创造性。但是，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任其泛滥。写这些东西的人说是发展他的个性，其实是发展他那个阶级的党性。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如果你有接近群众的个性，有全面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心理之个性，这是好的。如果你讨厌群众，有喜欢反映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之个性，那是不行的。

具备了以上四个条件，工作就可以做好。但是，你们现在还不够，还要学习。当然，如果感情还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那里，那就不只是学习问题了，不过学习也会好些。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有点地、富、资产阶级观点，也是不自觉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改造自己，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学会接近劳动人民的本事，加强马列主义的修养，熟悉党的路线政策，不怕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把人民的新闻工作做好。

###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但在过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百端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没有能够在组织上最后地形成起来，或者初步地形成起来又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破坏。然而，在今天由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基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增高，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了。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

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以至全国人民，对今天开幕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来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及政治协商会议，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

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已全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不独是今天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

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

## 毛泽东 一八九三—一九七六

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1913年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湘江评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等革命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长。1924年初，参加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任中共中央农运委员会主任、全国农协总干事。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发动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部到井冈山地区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到1933年，历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并担任此职直到逝世。抗战中，于1943年3月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当选为主席。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一生为领导中国革命、建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阶段都写下了重要的著作，为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等问题上采取了“左”的做法，尤其是晚年发动领导了“文革”，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是作者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作的一次重要演说。作者提出了促使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如何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应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在这里，作者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和党应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有关的各种“左”右偏向，并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速度。作者还估计了胜利后国内外斗争的新形势，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危险给予了告诫。这篇演讲与作者于同年6月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一道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是作者于建国前夕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的开幕词。这是一篇胜利的宣言，它向全体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告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作者向全体中国人民提出了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国家的任务。整篇演说气势宏大，充满激情，充分

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以自己的浴血奋斗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代的自豪、自信与自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是作者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全党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历史时刻发表的一篇演说。此时国内国际形势都十分有利。国内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一定成就，党内团结，社会稳定；国外虽有英美等国企图对华实行经济封锁，但社会主义阵营十分强大，我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良好。稳定、巩固、调整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形成经济建设的更大高潮，成为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作者在这篇开幕词中强调要加强团结，包括党内的团结、党与人民的团结、党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友好国家兄弟党的团结；并强调了戒除骄傲、虚心学习的重要性。从这篇演说中可以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党和国家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气氛。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 三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

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

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

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做。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选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词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

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



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选自《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 沈钧儒

一八七五——一九六三

浙江嘉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主张变法维新。1904年中进士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从事宪章运动，曾任浙江咨议局副局长。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光复工作，任浙江都督府警察局长，加入同盟会和南社。袁世凯任总统后，他先后任浙江教育司司长、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护法运动中任护法军政府检察长。后任直系军阀政府参议院秘书长，曾反对曹锟贿选。国民党统治时期，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律师协会理事长，热心于教育和民主运动。1935年因力主抗日，发起成立救国会，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参政员、旧政协代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与黄炎培等共同创建、领导了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

《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词》（1949年7月2日）是作者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代表中国民盟作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29日在北平（北京）召开，是解放区与国统区革命与爱国文艺工作者的胜利会师，师大会总结了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明确了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任务，并筹备建立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组织。大会期间，毛泽东、朱德亲临大会向各位代表表示欢迎，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作《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分别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沈钧儒在讲话中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艺工作与人民大众的结合作了高度的评价，对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作了热情的赞扬，并呼唤全体文学家、艺术家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创造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于侃侃陈说中表现出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满怀激情。

### 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词

主席、各位文学家、各位艺术家、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今天来参加文化大会开幕典礼，非常荣幸。

出席今天大会的代表，包含了全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文艺批评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其中最大部分特别是来自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都曾经替中国人民出了力，都曾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了功。今天革命得到胜利，中国人民得到解放，拿枪杆的战士们，尽力最多，但是拿笔杆的战士们，也同样流了血，流了汗，值得中国人民的感谢。

因此，我代表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特别向各位文艺界战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在今天的大会中，我看见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文艺工作已经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第二件事情，全中国文艺界空前的大团结。这两件事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所不会有过的。

我自己非常爱好文艺，从幼年时候起，我也曾经做些旧诗，但是我明白，在从前的时代，文人只知道吟风弄月，不然就是粉饰太平，鲁迅先生所谓替统治阶级“帮闲”而已。虽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些文学家，为被压迫阶级作不平之鸣，但是一般地说，中国的旧文艺都是和人民大众毫不相干的，是脱离人民的。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有了人民的新文艺，其中鲁迅先生是最伟大的文艺革命导师。鲁迅先生不幸早死了，他却永远活在人民中间。这以后，毛泽东先生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号召全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作为战斗武器，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使文艺工作真正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毛泽东主席这一号召的效果，全国文艺工作者今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脱离了人民，为少数人帮闲。他们大批地进到工厂，进到农村，进到部队，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工作。从此文艺最属于人民的，为人民所创作，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中国数千年的文艺史中，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在旧时代有一句话，叫作“文人相轻”。自古以来，文人就最不容易团结起来。但在今天，情形也大不相同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各有历史，各有专长，并且有各种不同的作风，不同的癖好，在今天，却都能团结起来，为着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写作而演奏。单从今天参加大会的人数而论，就超过了北平解放后历次代表大会的人数记录。文艺界像这样的大团结，也是在旧时代所不能梦想的。一向不容易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居然有像今天的大团结，那么，我们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更不成问题了。

记得十三年前，我在上海参与鲁迅先生葬仪的时候，我写了“民族之魂”四个字放在鲁迅先生灵柩上。现在“民族之魂”已经化为无比强大的民族革命力量，震动了全亚洲，震动了全世界。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领导者，不是别人，就是中

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天才。他的一部不朽的杰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相信在场各位文学家、艺术家，应当都和我有同感。

各位文学家，各位艺术家，各位代表，我们大家向伟大天

才毛泽东学习，共同为人民服务，为创造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罢！

敬祝大会成功！

人民文艺万岁！

文艺界大团结万岁！

伟大天才毛主席万岁

（选自《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张 澜  
一八七二——一九五五

四川南充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早年主张维新变法，参加资产阶级立宪请愿运动。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发动了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四川发动武装讨袁。1920年曾任四川省长。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成都师范校长、成都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41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选为同盟主席。1944年该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他仍任主席。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流产后去上海，被国民党当局软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是作者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在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发表的一篇演说。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各人民团体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代表、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及特邀代表共六百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规定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立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国旗、国歌，决定以北京为首都。这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的盛会。张澜在其讲话中，将政协会议确定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旧民主主义的总统制、内阁制及苏联东欧各国的政体加以比较，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协“共同纲领”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要与全体代表、全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共同来实现“共同纲领”。作为一个深谙中国国情、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他也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所面临的保卫革命成果和建设新国家的任务的艰巨，因而他告诫人们只有提高警惕，精诚团结，才能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诸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今天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世界宣言，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人民觉悟了，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到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聚一堂，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发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对今天开幕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想在座诸位代表一定和我的感想一样，都认为这个会议有了绝对成功的把握。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三个完善的草案。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经过这次会议的通过，就要成为正式的法案。根据这几个法案，中国政治将来就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在这里，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他的内容丰富，他的文字质朴。中国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他没有高调，他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

我可以想象得知，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在这次大会中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责任。我们要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他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今天我愿更坦白地说几句话，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今天还有国内国外的敌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三个恶势力是三位一体，是狼狈为奸的，要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这些恶势力的残余，还须要相当的时间，他们今天还要做困兽犹斗的迷梦；他们还在进行死灰复燃的阴谋，我相信在座诸位代表没有人会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应唤起全体人民，共同警惕，共同戒备。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词中说得十分正确，他说：“谁要放轻了这项警惕，谁就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变成被动。”全国人民应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头，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是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同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

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天正式开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时代今天亦开幕了！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走到无产阶级社会，走到大同世界的正当途径，我们大家努力吧！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选自《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 赵树理

一九 六——一九七

山西沁水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曲作家。赵树理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参加劳动，深受农民生活、情趣与语言的熏陶。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参加了校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因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潜回家乡，失掉了学籍与党籍，此后在家乡从事小学教书、差役、店员等工作，并开始进行创作。1936年赵树理经友人之聘任乡村师范语文教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编写小型街头剧，亲自参加演出，次年重新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在长治等地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历任《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编辑，并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这类“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解放后赵树理继续同他的作品捕捉时代的新旋律，深刻表现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悲欢离合。1962年，因大连会议受牵连。1965年调山西的“省文联”工作。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文革”中，赵树理受到迫害。1970年9月在太原病逝。

赵树理是一位来自农村、反映农民心声的农民作家。他常常能通过一时一地的生活，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普遍性问题。他严格遵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创作原则，反复申述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道理。他的一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几代作家接受党的思想教育、跟党走听党话的知识分子形象，因而他的演讲也完整准确地反映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15日)发表于建国初期，这位来自农村的作家以其特有的敏感性，提出了新旧文艺界同仁要好好努力，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粮食。早在30年代的创作之初，赵树理就发现了新文学与人民群众的隔阂，开始考虑文艺大众化问题，并不断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完成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这篇讲演中，他重提二十年前的话题，提出“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可见其耿之于怀之情。为达到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目的，赵树理既要求旧文艺工作者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群众的需求，又要求新文艺工作者万勿轻视旧文艺形式，要用“旧瓶装新酒，”完成文艺服务大众，文艺教育大众的历史使命。

###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

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旧文艺界在一些老解放区已经有了进步性的组织，而且得到了相当成绩，但还不够。拿农村来说：已经作过十多年的旧戏曲改革运动，但只要识字的人，就仍存有旧戏本、唱本，由此来看，它远超过我们的新文艺或改造过的东西；在技术上我们也赶不上旧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技术上、内容上努力超过旧的。在这里，现在新旧文艺界都在努力，不过有的还只是开始：解放以来，旧文艺界虽然不写“一道白光”之类的作品了，但写新的还不能掌握政策，所以我们要好好学（每天报纸上的政策和文件，都应好好学习），渐渐学得能掌握政策，才能有好的作品产生。新文艺工作者，应丢掉轻视旧戏剧旧曲艺的观点，要认为它们低级，或觉得很简单容易，随随便便就可以写成，那是不对的。过去农村中，唱戏唱新的，但是不久就又唱旧的了——因为新的太简单，太容易，唱几回就腻了。我们要重视这些东西，要细心研究。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钱去看去听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特别再向旧文艺作者提一件事：旧文艺作家缺乏新观点，怎样建立这个新观点呢？第一要了解政策，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要研究群众：了解群众需要什么、如何表扬模范例子；要了解新老解放区的乡村、城市、工厂等各种群众的情况，想办法使写的东西给群众解决问题，使群众听得舍不得走。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住群众，受群众欢迎是最重要的。旧形式和新内容是否配合，新写的是否比旧的受群众欢迎，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应该下一番工夫研究——无论形式内容，都要下工夫研究，不能随随便便对付。

我们应该大家做学生、做先生，共同学习讨论。过去文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别人不能动一笔，实际上让大家一讨论，会有很多的漏洞经过多次修改才能完全。这个认为自己写的作品别人不能修改的包袱是必须丢掉的。我们这个会就是为了使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学习、创作、研究才成立的。有了作品，要彼此修改、批评建议，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使其成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

（选自《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一九八 年版）



## 周扬

一九八——

湖南益阳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周扬中学时，曾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读大学期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发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的文章。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1931年周扬从日本回国，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第二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到达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等职务。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1949年，他同郭沫若、茅盾等共同负责筹备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受迫害达十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后，又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扬长期担任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建设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事业和实施党的文艺政策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他既有显著成绩，也有重大的失误。粉碎“四人帮”后，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唯物主义方法看待过去，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鉴，主动承担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责任，给过去错批错整的同志公开道歉，显示出一位党的文艺领导人的博大胸怀。这里选编他的演讲《怎样批判旧文学》，表现出周扬将马列主义思想和我国文艺理论相结合的理论水平。

《怎样批判旧文学》（1950年3月30日）是周扬五十年代在燕京大学上的一次讲演。50年代初，我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主气氛浓郁。但是在如何对待祖国宝贵的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糊涂愚昧的思想。作为党的文化领导人，周扬既指出旧文学中确实大量存在落后的封建的糟粕，同时又运用列宁关于“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份”的理论，指出旧文化中也有具有人民性的精华成份。认为“尊重古代文化，批判地吸取其精神，是相信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祖国的不可少的条件。”讲演中的另一闪光处是周扬针对“五四”以来文艺界崇拜西洋文化诋毁我国文化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创作具有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并说：“不摆脱外来影响，一个人是没法成为真正民族的作家。”周扬在建国之初发表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也能深感到周扬的这些真知灼见。

### 怎样批判旧文学 ——在燕京大学的讲演

我们对旧文化、旧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有人嘲笑过我们，说共产党没有文化，不要文化。无疑的，这种肆意的造谣是不值一驳的。可是有没有什么客观的因素使某些人有这样看法呢？有的，在对旧文化问题上，我们发生过偏向。在过去异常紧张的军事形势下，

我们没能十分注意的研究这个问题，在个别解放区也错误地斗争过一些知识分子。

在今天，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族遗产，怎样继承民族遗产，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从“五四”起，才有新文学。“五四”时期深刻地接受了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封建文艺；反对文言文、四六体，斥桐城派古文为妖孽，反对旧戏曲；介绍进来大批的现代小说、话剧、自由诗。五四运动借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武器，来反对封建文化、封建文艺，是完全革命的。五四运动表面上受了很多外来影响，实质上它却有深厚的民族基础。不要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就没有民族基础了。正是因为中国民族有这种需要，所以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人说“五四”新文化与旧的民族文化没关系，这是错误的。“五四”仅仅反对了旧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封建部分，同时却继承了人民的或比较接近人民的一部分。陈独秀、胡适力争白话文是文学的正宗，宣扬《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价值，这是很正确的。（虽然后来胡适一直反革命，现虽没盖棺论定，怕也很难再争取到人民方面来。但我们有一种辨证的历史态度，我们不抹煞他的成绩。）

那么，五四运动有没有缺点呢？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也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这种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游》也不主张叫人看的。抗战起来了，民族形式比较得到重视，但那也只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完全认不清采取民族形式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仅只为宣传方面，拿来轻轻利用一下就得了。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鲁迅劝青年不要读线装书，那只是怕当时的青年还没批判能力，读了倒反受坏影响。鲁迅自己并不是把中国的旧文化一齐否定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很受果戈理，尼采的影响，但到《呐喊》，《彷徨》却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了。鲁迅自己把这摆脱外来的技巧影响，当作一种进步的表现。的确，不摆脱外来的影响，一个人是没法成为真正民族的作家的。不要认为鲁迅抛弃了民族传统，恰恰相反，正是鲁迅继承了民族传统。鲁迅细心地研究过中国旧文化、旧文艺，写了《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等书。鲁迅举过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说对于旧的应该“恰如吃其牛羊，弃其蹄毛，留其精粹”。假如不分辩，连蹄带毛一起吞，当然很危险；反过来，要是把好肉当作蹄毛扔了，也未免太可惜了吧？“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早就把新旧的关系正确的指出了。可惜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留意鲁迅的这些话，偏喜欢说洋东西，不喜欢中国的。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抗战一起，《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剧流行，老百姓却说：你们这些人要救国，很好，戏也演得很好，就是有点不合乎咱们的口味，不好。这就是跟群众隔离了。毛主席在1938年就指出来：文艺宣传运动“不合民众神气等，与民众发生隔膜，必须切实的改一改。”“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当时我们也觉着这话很好，可是并

没很好的把它贯彻到实践里去。我们那时没能真正体味毛主席的话，就像我们在那以前不能彻底了解鲁迅的主张一样。又过了四、五年，经过整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我们才纠正了这个偏向。

对于旧文化、旧文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极明确的说明：“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说新文化是旧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和旧的是相互衔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绝的。

这就是说尊重古代文化，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相信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祖国的不可少的条件。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艺是反映反帝反蒋，土地改革，劳资两利的。这只是横的一面，但还有纵的一面，新文艺必须是从旧的发展而来的。我们必须拿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来改造旧文学，发展其中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不要把封建时期的文学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学贴上个封条就算完了。列宁说过：“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面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故宫是供封建皇帝住的，但同时不要忘了它是劳动人民在封建压制下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长城更是这样，不过人民那时被统治着，所以只得按统治者的意思来创造罢了。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那人类的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之下所造成的智力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人民在封建社会下，创造出来很多戏剧、唱词、民谣、音乐……这里面有很多是人民自己的东西。被剥削的生活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使人要求平等、自由、反抗压迫专制。这里面有很多民主的革命的成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以神仙式的幻想来结束，就是投降妥协，要不干脆就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民主的斗争。我们祖先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只有等这个时代才能解决。诸位朋友说解放后有位小姐看了《红楼梦》，一心想作林黛玉，因作不上林黛玉而大为烦恼。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自由恋爱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们举个例来考察一下文学遗产里面进步的和民主的成分。

刚才提到的《红楼梦》，大家都知道是描写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从兴盛到没落，人民除了当作陪衬的刘姥姥外，在书里没有地位。但这里面就没有民主的成分么？贾宝玉、林黛玉这一派和贾老爷、薛宝钗这一派是恰恰对立的。假如贾宝玉生在现在，说不定是个民主人士，有住国际饭店的资格呢。贾宝玉不想当官，只想追求人间比较单纯的爱；反对等级制，对丫环小姐同是称姐道妹，一视同仁。不用说，他这种作风是为封建专制所不允许的，所以他结果也只有出家当和尚了。《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也是革命的，他反抗一切封建组织和封建纪律，他把天宫闹得熙熙攘攘，你怎么能说他不革命？从这里，我们找到这些书所以流行如此广而为广大人民所欢迎的原因。这就是说在分析批评这些作品时，我们要有阶级观点，要有历史的观点。我们切不可要求从前的人民像要求现在的人民一样。记得从前延安演郭沫若的《屈原》，演戏的人觉着屈原太懦弱了，屈原不该自杀，于是叫屈原的弟子婵娟小姑娘

劝说屈原，结果是屈原没自杀，屈原和群众结合了。这完全不合历史。我们应该了解屈原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只有牺牲。又有人演旧戏，把贪官打下去而让群众自选县长，群众看了戏虽然很满足；情绪很高，但是这把历史给歪曲了。我认为：在照顾观众情绪时，原则上是不能歪曲历史的。只要从历史上看是最革命的，那就行了。比如刚才说过在封建的贾府里，贾宝玉类型的人物是有革命性的。有位同志说：《水浒》里面除了官就是流氓，没有一个人人民群众。这位同志是不完全了解《水浒》的。《水浒》一百单八将里有很多是劳动人民，比如李逵，阮小七等等。他又说宋江不好，宋江一直想作官。还是由于没有历史的眼光。你以为今天的农民要不是受共产党领导，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就没有那种幻想么？例如在东北，有的农民发家了，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是纯洁的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经济成分要上升到富农了，要剥削人了，怎么办？党教育他说要照顾大家，要帮助别人。农民离了共产党离了无产阶级是很容易走到从中农升到地主，继而组织军队，终局是想作皇帝的路上去的。宋江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求他不想作官怎么成呢？

有人会问：过去的中国的落后的，文学里面的民主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的因素比较少；西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比我们多得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重视旧文学，一定要发展旧文学呢？我们的回答是：这除了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过的那个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外，还有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

在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有些中国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无形中形成了民族自卑感，以为外国都是好的，中国的全不好。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思想上的问题。比如演电影一定要学好莱坞，搞话剧一定要模仿外国人，演讲起来也得耸几下肩膀，老百姓实在不懂你搞的是什么名堂。这就是由于忘了毛主席再三嘱咐我们的“要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问题在于我们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假如说我们的祖先不全是混蛋，假如说我们的祖先都有过为民主自由奋斗的历史，假如我们认识了这些血泪斑斑的事迹，明了了我们祖先为反对内外压迫者付出了光辉的代价，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祖先而骄傲，我们就该敬爱他们尊崇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

有人说哈姆雷特好。不错，哈姆雷特好，可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他，中国老百姓不喜欢他。老百姓所熟悉的是关公、张飞、李逵、薛仁贵等等人物。我们应该请专家把民间流行的一切故事、歌谣、戏剧等等搜集起来，用马列主义、阶级观点、历史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决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用的，和哪些是没用的。把没用的送进博物馆，对于好的有用的，我们不仅只是消极地去继承它，而且更要积极地去发展它。我们希望有很多人来研究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民间文艺。我们绝不忽视这个丰富的，宝贵的文学泉源。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是广泛的流行着的，正是反映着人民的反抗情绪。其调虽悲，但其悲足可以哭倒长城。要不注重民间的东西，比如只写自由诗吧，诗的思想性很高了，艺术技巧也很好，可是老百姓却偏好到西单、天桥听大鼓书，那又拿什么去打倒封建文化呢？光是一个燕大或者再加上一个文化部都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那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吧？老百姓爱大鼓，那我就来编大鼓，唱大鼓。改造旧曲艺单靠艺人还不够，同时也要靠真正有修养的搞新文艺的朋友们。这些人读过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借他们的好东西来改造旧曲艺。例如《打渔杀家》吧，改一下就得了。《空城计》里面也许是还有好

东西。要是我们写三、四个剧本是反映目前的现实题材的，那我们就应该拿出写一两本的力量来去作改造旧戏曲工作。旧曲艺的思想性虽然差，但是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新的思想性虽然强，内容和形式却往往是分裂的，比如演旧戏，要打着令旗喊“我是政治委员是也”，岂不要闹笑话，我们对于这些旧的文学遗产一定要改造它，加以新的内容，提高其民主性，革命性，和艺术性。你好听大鼓，我们就有民族气派好的，音乐好的，思想好的大鼓给你听，那你为什么不喜歡呢？秧歌就因为这样改造了，所以秧歌就受到这样广大的欢迎。我们在分析旧文艺是必须分别清楚：哪些是只有修改一下就成了的，另外一些却是需要比较彻底改造的；再另外一些却只有某些好的成分供我们吸收的。

对于曾经流行过的而和现在人民隔绝了的文学，例如大学里讲的《诗经》《楚辞》，我们也应该作一番清理工作，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作一番翻译工作，否则人民没法接近它，它没法成为人民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里的人更有给人民介绍这些古代文学的责任。只有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才会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也许有人要说北京是大地方，共产党进来也变成复古派了吧？那完全是过虑。我们对于旧文学仅是说：你是我的祖宗，好，我尊敬你，我接受你的好处。但是我是你的儿子，是你进一步的发展，那我当然就更有资格来裁判你。我们就是用这种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文学遗产的。

（选自《周扬文集》第二卷）

## 丁 玲

### 一九 四——一九八六

湖南临澧人，中国现代作家。“五四”运动时，当时尚在读书的丁玲，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游行和演讲等学生运动。20年代中期，丁玲开始发表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表现了一批在新思潮影响下冲出封建家庭的知识女性，从此，丁玲成为引人注目的女作家，

1930年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担任过“左联”组织部长、党团书记等职，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左翼作家、进步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以及国际文人友人曾发起营救运动。193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在陕甘宁边区。丁玲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历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常务理事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丁玲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诞生后，丁玲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及常务副主席，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又入狱监禁达五年之久。1978年，丁玲恢复名誉，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1986年病逝丁玲一生道路坎坷，屡经磨难。然而她却从不向恶运低头，而是以其坦荡的胸怀、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这里选编的两篇演讲辞可以说较准确地反映了丁玲其人其事，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见其生活背景。

《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9月）是丁玲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在大会上的讲演。大凡作家发言总免不了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也总是充满激情，丁玲也是这样。她激情满怀地倾吐内心对祖国深情的爱，她想像着工人、农民、战士、老大娘、老汉、少数民族姐妹们因获得新生活后的幸福情景。丁玲的这篇讲演典型地体现了解放初期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欣喜心情。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份”》（1981年）则是丁玲在饱经风霜后的一篇肺腑之言。对待自己以往的生活历程，丁玲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不幸，也可说是幸总被卷入激流旋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浪去，我又被沉入海底。”面对生活浪潮的颠簸，丁玲不是气馁，而是得到了人生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丁玲十分得体地将这些经历与自己的创作巧妙地联系起来，风趣地谈到了人生与文学的血缘关系。丁玲这种处惊不乱，笑做人生的生活态度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 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当我走进了会场，当我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在战抖，在压制不住地激动。我要向大家，向全世界倾诉出我的比高山还重、比海洋还深的感受。这是多少年的辛酸，多少年的血泪，多少革命者献身的结果啊！许多熟悉的面孔在我的脑中涌现，许多熟悉的声音在我耳旁回旋。我看见农

民,笑脸上挂着泪珠,沉重地说:“我做了几十年的牛马,现在才做上了‘人’。”工人们挥着拳头说:“我们再也不是臭工人,再也听不到老板骂我们:‘我能让你们活,就能治你们死。’我们已经是中国的主人。”老大娘告诉我:“打倒了地主,我翻了一个身,男女平等算又翻了个身,现在只差学好文化翻第三个身啦。”还有白胡子老汉,他们住在休养所,他们说:“多奇怪的事啊!我们不能想的,不敢想的幸福都有了,哪一个夜晚,我都舒服地睡着了,可是又从梦里笑醒了。”我看见青年人,他们充满着欢欣,唱着“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谈着怎样改革技术,提高产量、质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他们充满了劳动创造的信心。我听到那守卫在遥远的祖国边疆的战士们的宣誓,他们全心全意地保卫着我们,保卫祖国的建设,保卫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和平。那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姊妹也歌唱不尽,他们唱着:“天上星星颗颗亮,宪法条条记在心,民族一律都平等,团结成个大家庭。……”我看见湘西的一个苗民老太太,她宁愿自己担负家庭的主要劳动,把独生儿子送到民族中学去念书,她同我说:“要当家理事呀,没有文化行么?”中国少年儿童剧团的山青同志写了最动人的诗,他说:“……我开始读那些没画的画,我开始想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这幅画里,我们穷孩子穿上了新衣,在这幅画里,我们身旁坐着微笑的妈妈。终于一个伟大的人使我看见了,可是他并不是一幅纸上的画呀,它比我想像的画要美上千倍百倍,它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国家。……”这首诗替许多妈妈、孩子,替千万人说出了心中的话。这一切欢呼、赞颂,和坚定的誓言,都只为了一件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这是人民的宪法,它给人以尊严,给人以道德的标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崇高的感情,人在这里充实了,武装了,提高了,人懂得为什么去斗争。宪法是斗争的果实,但并不是表示斗争的结束。我们的争取新生活、反对旧生活的斗争是永远不能结束的。就在不久以前,我记得,在安徽黄山有一个摸山的老头,他是同悬崖绝壁、深山野林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人,牙齿都掉完了,他同我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政府好,村里大家都过好了,可是咱们村上还有一个坏干部,是地主的走狗,混进了共产党,他不准我拆自己的房子,他欺压老百姓,他的余粮比谁的也多,可是卖给国家的很少。”也是在最近,在河北省一个村子里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把写了几年也不敢发的匿名信交给我,他说:“为什么杀了我兄弟的还乡团还在村子上洋洋得意呢?”同志们!这样沉痛的事情在我们国土上还有不少,我们得坦白地承认。人人有权利,人人就有义务。我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我同大家一样,同人人一样,都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就要遵守它,宣传它,和宪法所不允许有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让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宪法的实现,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吧!人民的宪法万岁!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981年11月6日在纽约哥大的演讲

讲话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和诸位是第一次见面,诸位对于我或许还能有些微了解,但我对诸位却是全无了解,真可说是素昧平生。我也不知诸位想听我说些什么。

来美前有人提醒我,告诉我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色各样的人

都有。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太好的朋友，还有坏的朋友——已经不能称为朋友，因此你要注意。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我向来处在相当单纯的社会，对任何人都相信，把谁都当朋友。我以前交过美国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就是史沫特莱。本来我从小不单是对美国人，而是对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这也难怪，因为过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但是史沫特莱给我上了一课。她的言行说明，外国人当中也有很好的人。她那时在上海处境就很危险，整天都被特务包围着，但她仍然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进步事业冒险奔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她尽力协助营救我。所以我回答提醒我的人说，我不怕。我从来就是不怕的，因为我是写人的，就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对他们有了解，否则就不可能写他们。我这次来美国，就要尽量多见到一些人，也许我将来回国后能写一些半美国人与美国人。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从事创作或对创作感兴趣的，我现在就讲讲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怎样写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像《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不起我，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小事都不让我参预。这就使我有了一些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人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态、语言声调等，却在我心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我颇能过目不忘。

我要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个革命的时代。我既不能跳出这个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革命时代，我就必须全身全心投入。有一次有人要我题辞，我曾写道，我也很想能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可以无忧无虑。可是这是乌托邦，天下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因此我得到了很多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炼，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回到写作，我说一点体会，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已的。美国社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中国旧社会使我很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愿跟着其他的人争着向上爬。进中学后对学校给我的培养教育，也感到怀疑，他们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老教我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呢？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能怎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我由于家庭关系和读了一些书，就懂得忧，懂得愁，很为国家和社会着急。急于想求得国家该走什么路，我该走什么路这种问题的解答。那时共产党刚成立，我就去上海找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比毛泽东有名，我对毛泽东所知不多，虽然我们的家更近，我还认识毛的夫人。

我个人的事，在爱荷华和芝加哥已说了很多，今天时间不多，我要讲得简短些。到上海后，我首先进了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那是培养女共产党员的。后来又进上海大学，校长虽于是右任，但管实际工作的却是邓中夏、



瞿秋白。这个学校我是从后门进去的，读了一年，仍然不满意。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对此是容易理解的，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又年轻少经验，因此极容易对一切不满。我只读自己喜欢的各种小说。包括外国的小说。我也想去外国，但去干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我于是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里连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为文艺而文艺的人，也有一些作品，还写得很好，例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水沫社的戴望舒，现代印象派的李金发等；连创造社早期也号召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浪漫主义，如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有不少好作品。但他们所号召的“为艺术而艺术”却发展不下去，莫说郁达夫从未写过浪漫主义作品，他一直是写实的，就连郭沫若后来也转了方向。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高雅的脱离人民群众斗争的“纯”艺术品，而是要求反映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说出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最早的理论到今天还能存在的原因。他们号召“为人生的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我就是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左倾的，一直走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30年代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所走的路，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到大众里去”。说实话，左联在上海人并不多，同情的有一群，真作事的却不多。但奇怪的是这少数人却能在文艺界起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刊物一上市便抢购一空，另有一些作家如王平陵等的书，却老堆在书店里卖不掉。还有一些作家，打着“民族文学”的旗号，但这批人如今早已不为人知，连我也记不起几位了。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攻击过鲁迅和左联，至今还有一两位写文章的，但他们老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市场，打不开局面。并不是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好，只是没有人要看。这也说明了我自己的问题，如果不是走到人民中去，不卷入时代的潮流，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早就完了。那些人就是因为生活圈子比较狭窄，眼光老看着身边，脑子里老想着个人的得失荣辱，想不到身外的广阔天地，所以多烦恼苦闷，就不能写得深，写得远。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一定要把小圈子的生活丢开，到大天地里去，到部队去当干部，到农民中参加斗争，到工人中参加建设，到青年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我的天地比较广大。但是否只要能够到处跑，就能拿回东西来呢？那也不一定。有许多年轻人有过这种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是临时办货性质，是去专门买一点东西，到处找材料，能找到一点就想赶快卖出去，连加工都很少，等于现买现卖的贩子，所以少有成就。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拿回一些东西呢？我不知别处是否也有同样条件，在我们中国是你随便走到哪里，你就立即成为该地的一个成员，就可在那里管事，可提意见，可动手作事。我开始也不很懂这些，后来才知道你一到某地，你就是某地的主人之一。例如我到农村搞土改，就是一个组长，要作调查，提意见，听汇报。土改完成后，分房子时，本村人没有想起的房屋，我却能提醒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其实只是因为我和他们老太婆、年轻人及其他人都能打成一片，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一起生活，向他们提建议，劝解夫妇和好，把大家都当作一家人，所以能很熟悉他们各自的情况。我去到那里，就从来没想过是去拿材料好将

来写文章，我只想到是去干工作的，只是想如何能在那里好好长期生活下去，甚至当个村长也很好。

我每到一处，想的都是怎样能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在夜校当文化教员时，就一直想如何干下去。我从未想过只有什么事才是最适合我的。我不觉得干某些事就是大材小用。只在离开那些工作岗位回来写作时，所有那些接触过的突出事件和各种人物，就在我脑中像电影一般不停转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不知英文如何翻译，那就是“缘分”，那就是你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的结合在一起。我跟文学也是这样。

我们文学上的确向来是有条条框框的，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大肆鼓吹“三突击”，他们就说我写的农民不够英雄。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毁誉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在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能作：能上，也能下。

有些关心我的人也不了解我，问我有没有受不了的痛苦。我说是有的，那就是开除我的党籍，那使我最痛心。因为它在我和人民中间隔了一道墙。我那时想，我唯一的出路不可能是坐在家里写文章，而是要走到人民中去。文协许可我留北京写文章，我能有一个四合院，但只能困在那个四合院内。我不能过那种日子，我是自己要求去北大荒的。我提这个要求，不是要闯升官或成名的路子，而是要闯到人民中去的路。但闯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已失去党员身份，这很不光彩，你必须不害“臊”，在人民中敢抬头。如果我过去没有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经验，那是不敢去的。因为我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会给我友谊和前途。事实证明我选择得对，但这要花很大气力的，否则也不行。他们几次三番向上面建议说，应该为我摘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我，要使我完全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但可减轻冲击。

中国共产党很伟大，但也有过错误，有时左，有时右，为此受了损伤。党受了很大的损伤，个人当然也受了损伤。我坐了五年牢。有位朋友还坐了10年牢，出狱后我们相遇，我问他们有何感想。他说，党受的损失很大，我个人倒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得到很难得到的经验，得到人民的友谊。如要说损失，也比较小，损失了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口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党又把我们的名誉、地位完全恢复过来，等于承认过去整

你整错了。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我现在完全自由说话，我能来到美国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我以前已有艾青、萧军来过，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对中国来说，可说是跨了一大步，但可说美国也是跨了一大步，美国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如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有的今日的中美关系的。

周文中先生去年去中国，我们见了面，很欢迎他；聂华苓夫妇也会了，作家协会很欢迎他们。

我说过，我走到哪里，就常会喜欢那儿。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都有它的趣味。我来美国前还不怎么想来，来到了爱荷华，我很快就爱上当地的风景；但我仍想，也许是小城特别优美，大城市就不会有什么趣味，可是今日来到纽约一看，虽所见尽是高楼大厦，却觉得它也另有一种风味。这使我想起我本来是只爱国画的，不会欣赏立体画，或印象派的画，今日看到纽约的高大建筑，就想到也许西方人就欣赏那样的画。

我见到了一些美国人，我对他们很感兴趣，觉得他们都是很少城府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绕大圈子。我想能多认识几位美国朋友，也许回去后能写他们。

我这是信口开河，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选自《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杨献珍 一八九六

湖北郧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40年代起，开始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大跃进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64年又被强加犯有十大罪状，至文革时，则被监禁达八年之久，释放后又流放到陕西三年半。拨乱反正后，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杨献珍是中国共产党高级理论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应该说具备相当的理论水平，可是在那个令人利令智昏的年代中，正确被视之为谬误，谎言竟当作真理。杨献珍这样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的真正共产党人，却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肆意迫害。这段人妖颠倒的历史可以通过我们选编的杨献珍的讲演辞中略见一斑。

《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年6月12日）是杨献珍就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时，接见某省、某市党校部份同志时的一篇谈话。谈话列举了当时司空见惯，如今却令人瞠目结舌的浮夸现象。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像“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像五岁小孩当哲学讲师、人人写诗超杜甫、三天以内扫除文盲等等，这些令现在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故事，当时却在报刊杂志上广为宣传的唯心主义表现形式。杨献珍面对这些违背人们常识的奇谈怪论，以一个普通党员的党性原则大加鞭挞，竟被视为反对三面红旗，组织人马轮番批判，最后被迫写下《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任何一位读者在读完这篇讲演后，不管其心态如何，有一点是共识的：这样的历史断乎不能重演！果如此，则编者欣慰矣。

### 坚持实事求是作风， 狠狠批判唯心主义

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在理论工作上也刮了一阵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有人说，“实践就是理论，读书就是教条”。反对厚古薄今，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成“古”了。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人说成厚古薄今。去年某地有一个同志偷偷地读《资本论》，怕人说他厚古薄今，就在《资本论》上放一本《红旗》，把《资本论》盖住。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读书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吗？我看靠不住。如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

---

某个市的市委党校，“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派了一个干部到哲学研究所（那时我已从高级党校调到哲学研究所），以“法官”的身份审问我。他说，“你教我们经济学教研室的讲师们读《资本论》，你是犯了滔天大罪。”我听了，真的大吃了一惊，心想，这家伙是从台湾来的吧！

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在去年，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 7320 斤”，有个科学刊物叫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 年第四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 7320 之谜》的文章，作者是陈炎理，好像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的。我看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掩盖 7320 的谎言”，才比较切合实际。科学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科学不科学呢？还有这样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产，放假卫星，就把几十亩水稻移栽在一亩专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夜间再移栽新的。像这样的卫星还是以不放为好。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办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近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

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个别同志甚至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说什么“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等等。现在应当好好地检查一下，到底是虚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还是实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虚报的结果搞得没饭吃，搞得群众脸都浮肿了，这叫群众脸上有光吗？在过去战争期间，我们的战报，打死一个敌人就报一个，缴获几条枪就说几条枪。如打死一个敌人报打死一百个，敌人是知道的，被骗的还是自己人。所以，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战报是惊人的准确。去年这一阵“浮夸风”，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

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这本领已经失传了，没地方学。现在我们要的是真铁、真钢，不是要假“钢铁卫星”。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不能虚报的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还好得多。从旧社会出来的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带有很多旧的痕迹，说假话就是旧社会带来的恶劣作风。如有个公社，就像演戏一样：“报！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流动红旗被夺走了。”“不好了！”于是赶快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社员想不通，就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无怪有的群众说：“社会主义教育就受不了了，共产主义教育更不知怎样。”党校现在的任务更重了，要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要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和行动。不把唯心主义批透，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刮起这种风来。

恩格斯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们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 卷，第 131 页）我们的形而上学也不少。“薄古”，薄到不能读《资本论》，“厚今”，厚到要学小孩子的哲学。有个县组织了万把人的哲学讲师团，开始我听说最小的哲学讲师只有六岁，就感觉到这孩子真是天才，以后又听说还有个五岁的孩子当哲学讲师。还有什么哲学秧歌、哲学快板、哲学相声，稀奇古怪的事这样多。

有些人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

薄今”。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对立起来，甚至规定讲哲学只准讲《实践论》、《矛盾论》，多讲一点也不行。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可是对这一套作法不能反对，一反对就要给扣上“轻视主席著作”的帽子。

有些人的数字观念，好像是越大越好，搞密植是越密越好，定指标是越高越好。有一个生产队种了一块麦田，指标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其措施：一是密植；二是施特殊肥料——狗肉汤。他们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到地里。由于下种过多，出苗太密，长不成，就割掉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我以为留下四分之一还可以收三十万斤。谁知道没有过几天，他们把那四分之一也割了。社员在割的时候，一面割，一面故意哭丧着脸，讽刺干部说：“哎呀！我的狗哇！”

还有人人写诗，口号是“超杜甫”。有个工人把机器开动后，到一边写诗去了，结果出了事故，工厂着火了，损失了七十万元，这诗真值钱，真是“超杜甫”了。听说部队有个团，提的口号是人人写诗，争取当“万首团”。于是营也提出当“万首营”，连也争取当“万首连”，排也争取当“万首排”，班也争取当“万首班”，人也争取当“万首人”，还说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有个战士写了一天一夜，写的站不起来，要人从两边架着才能站起来。

“速成风”其实就是“浮夸风”的另一种形式，去年也刮得很厉害。“三天扫除文盲”。为了应付检查，只好把一些知识分子借去充数。有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全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这一年真是天才丰收年！还有人主张，“高级党校最好是七天一期，最多半个月。”真要照此办理，西藏的学员未到北京就该回去了。

“共产风”，事实上是反共产主义风。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共产风”，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要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作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依据条件，可是去年则大批“条件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干什么事都可以不讲条件。建设共产主义也可以不讲条件。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财产所有权，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22页）。马克思又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来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同上书，第24页）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却从来没有说过要消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因为只占有生活资料是不可能变为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的。我们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现在对西藏没有参加叛乱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也实行赎买政策。这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剥夺他们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当地主、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已经被剥夺后，还要刮“共产风”，那实际上是剥夺劳动者占有的生活

资料，去年不是什么都要归公吗。

建议同志们把《哥达纲领批判》很好地读一读，马克思在这本书里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新社会中的“旧社会痕迹”。在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不平等，所以资产阶级要求平等、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它得到了平等，但无产阶级还受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平等，要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从形式上看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并不平等。因为一个劳动者和另一个劳动者，在付出同等劳动，取得同等工资的条件下，由于他们的家庭负担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各不相同了。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消灭这种不平等，不能依靠道德化的说教，也不能靠行政命令。谁要想只靠这些力量去改变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其结果必然是破坏生产力，去年刮“共产风”的结果，不是弄得粮食丢在地里收不回来吗。

共产党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不是我们的最后目的。但是，这需要有比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才可以作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目前搞什么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为要认真批判空想的共产主义，必须把去年的“共产风”扫荡一下，不破不立嘛。

党校教研室的同志要认真地学习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应该很好地读，把它摸熟，把根基打好，这样就能经得起风吹浪打。去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不是有几个自认的或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共产风”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逞风施威，火上加油吗？当然，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分子可以不去说他们，对于这样的人，哲学不过是他们为达到这样或那样的卑鄙目的的敲门砖。这种人要是不从根本立场上转变，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要强调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要特别注意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解决干部的群众观点问题。现在有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好像奴隶主对奴隶的关系，一声号令下，群众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要停下来，去服从他们的瞎指挥。谁要不服从，就把他送去“劳改”，简直是敌我不分。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归根到底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的互助关系。

要让干部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活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闹革命，杀头也要讲，就是被蒋介石杀了，还是革命的嘛！现在谁要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

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大脑清醒起来。

什么叫党性？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组织观念强只是党

性的一个方面。毛主席说：“主观主义就是没有党性”。主观主义是不自觉的，情有可原。”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几句话见于《聊斋·考城隍》篇里。去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这样的人，不克服说谎话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讲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讲这些话一定要得罪人，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话。要是有人觉得我说的过头了，那就请同志们想想，对于某些至今还拿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宝贝的同志，你除去向他大喝一声，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选自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艾 青

### 一九一

浙江金华人，中国现代诗人。艾青出身于地主家庭，出生后因算命先生测为“克星”，被送往本村一个称为大堰河的贫苦农妇家抚养，大堰河对艾青的恩爱胜过父母，这使艾青从小感染了中国农民的朴实与忧郁。1928年艾青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在院长的鼓励下，次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国家中断经济接济，艾青被迫中断学业去打工，工余自学绘画兼习法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深受比利时诗人瓦尔哈伦的影响。1932年，艾青归国潜心诗歌创作，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投身于革命文艺运动。7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以颠覆政府罪被判徒刑6年。囚徒生活使艾青从绘画转入诗歌创作。1935年获释后，开始发表诗歌创作。抗战期间，艾青以其诗作投入到争取进步艺术的战斗之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延安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并加入共产党。1945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57年被错划右派，离开文艺界去黑龙江、新疆等地接受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又一再受到批判。1976年后重新获得创作自由，1979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六届人大常委，1985年荣获法国授予的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认为“诗与伪善是绝缘的，”“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震撼人们的心。”这里选编的演讲辞十分贴切地体现了艾青的这一个性。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17日）是诗人二十年沉冤昭雪后的一次讲演。艾青以一个友人的奇特遭遇开头，十分熨贴地表现出祖国春回大地的欣喜心情。诗人沉痛地述说了多年来政治空气的反常，造成人人噤若寒蝉；诗人大声疾呼要建立一个罪恶史陈列馆，让人们永远记住那些搞文字狱的罪恶之徒；诗人由衷地感叹“人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无民主，心有余悸，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这些感慨对那些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年青人来说，形同天方夜谭。”诗人，应当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艾青的一腔热忱全部倾注在铿锵有力的这话语之中。诗人最后说：“春天来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有沼泽地带，还有泥浆路。”我们深深为艾青的真诚所折服，这恐怕也是我们选编这篇演讲辞的原因吧！

###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 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已经多年没有出席过这么隆重的会了。像这么一种阵势，不得不使我感到紧张。我有一个朋友叫胡明树，他也是二十多年没出席会议了，一开始就兴奋，就紧张，当时就昏倒了，马上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

今天，有这么多诗人出席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到会的诗人中从“五四”到如今，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我想每一个带听觉来的人，都会感到有收益。

前几天我在会上已讲了一些话，那么，今天大会发言就可能有些重复。本来，大家让我讲讲形象思维。大家都是诗人，讲形象思维是班门弄斧。我倒想讲讲创作民主的问题。这或许是当务之急。

总理在 1961 年讲咱们民主作风不够。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今天的民主作风和 1961 年相比，已有了进步。

总理还提到，只使一人言，不使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吗？这句话，百分之百正确。我认为：天下绝不应有此事。蓝色苍穹之下，绝无此理。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被认为说错一句话，就有人打棍子，似乎有一种固定的框框。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框框，办任何事总要有个框框，但不能随便打棍子。还有人爱抓辫子，诗人是激情的“白发三千丈”，抓辫子太容易了。也有人爱扣帽子。帽子不能不戴，但不能乱戴。应当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空气。

搞创作，不能有划一的格式。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不能强求一律。过去，有时一个人说了算，说什么：“我不喜欢。”那么，我可不可问你：“你算老几？！”这话不好听，但很纯朴。

讲了半天百花齐放，文革期间却一花独放。一些条条框框把人们束缚注了。我主张要有创作自由，也要有批评自由，但不能用政治代替艺术。少数人不能独霸文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批评家比作家好当，似乎只要摇摇头，一个动作，就够了。有时一个人摇摇头，就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这很不正常。要让大家敢于讲话，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只在不违反基本原则。

周总理讲话快 20 年了。18 年前发出的呼声，但这么多年，没照这样去做，却执行康生那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20 年过去了，多少人流了血，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今天深感幸福，能站在这里讲话，我没想到。甚至我没想到过要离开新疆。我那时确实有终老在新疆的想法。

人民是有疾苦的，这用不着隐瞒。许多地方生活很苦，受过痛苦的人，更懂得哪里有真理，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新诗。新诗创作有自己的历史。我是 1910 年出生人，九岁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如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那时影响很大。今天读起来淡而无味，有的诗比儿童诗还幼稚。当然，像孩子似的，从爬行到站起来并不容易。当时俞平伯、康白清也写诗。那时郭沫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我还读他的《瓶》，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重复句子很多。重复，无非是为了强调，有什么“一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诗的历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

我从小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人说我的诗好、有人说是“大白话”。大白话没什么不好。说大白话比说“大右派”好。有的人写的诗四不像，古不古，洋不洋，帮腔帮气，主题先行。新年到了，要写新年献词：春节到了，要写春节献词，这算什么诗？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传统——反帝、反封建。当然，还应看到，反了这么多年，还有买卖婚姻，结婚还要陪送几大件。

《天安门诗抄》选得很好，这些诗十分感人。读了这些诗，我曾说：我们没理由悲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诗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知古往今来有没有？如没这些诗，“四人帮”会不会倒得那么快？也很难说。

“四人帮”手中有权，张牙舞爪，你要虎口拔牙，谈何容易？有了诗，可看、

可听。这也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相补充。总之，《天安门诗抄》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诗人要对当代提出问题，要与人民共思考，多提几个为什么。当然有危险，睡觉不危险，可平安无事，但你又要做事，又图平安，那怎么行？都像 30 年代一些人“今天天气哈哈”这绝对平安无事，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诗人称号。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敏感性，也要有主见。生活在世界上，处处充满矛盾。没政治敏感性不行。有人凭“天气预报”搞得手忙脚乱，谁上来就捧谁：谁下来就打谁。总之，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不要像投机商那样。应当和亿万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思考，大事上不会错。如果连人民都不相信了，那就没办法了。

卞之琳想写一建设性的诗，却挨了多少人骂。卞之琳经常像祥林嫂那样说：“我真傻。”这些年，搞得人们想干点好事总要担惊受怕。有人写《天安门四重奏》受了伤害，普天之下受伤害的人有多少啊！一些人简单地结束了生命，可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全之处。

什么叫野心家？什么叫阴谋家？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林彪、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罪证都陈列在那里。康生他手上鲜血更多，全身可泡在血里，血染浴池。由于他们这些人搞文字狱，株连人之多，至今也没法弄清。人太多了，简直是小天文数字。因读我的诗而判刑的已发现有五、六人。像康生这样的人，良心应受到审判！

诗人，应当讲真话。冯至发言中也谈到要讲真话，我很同意，但讲真话有危险。讲假话可以不出事，可以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

前几年是不能讲真话的。正派人讲了真话。说你是怪话，是放毒！是黑话。

前几年，人们都变聪明了。你问这话哪里听来的？答：上厕所听来的。而且从隔壁的妇女口中听来的。人的聪明，可适应各种场合，合种环境，可随遇而安。

一个人讲了错话，批评批评本是好事，可是前几年，批评变成判决。一个人，有一段时间没见报，人们就认为他出问题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似乎关键是见报与否，只要见报，这个人就没问题，哪怕出席一次追悼会也行。

这些年，一个人倒霉，株连九族，一受批判又不容申辩。我这些年，一直在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这两个词都是好词，但——合并就成了“劳动改造”，就麻烦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劳动改造，中央 55 号文件也不传达。水落石不出，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各取所需，许多政策不能及时落到实处，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到十年动乱这个样子，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从 1957 年开始，不敢讲真话，直到如今。开始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这一段历史教训应当总结。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右派？可我向谁去问呢？什么叫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当时不签字就成了极右。极右，武装押送，武装看守。总算有幸，始终没有拿我当最顽固的敌人。我那时把老婆孩子接走，长期在农场安家落户。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到 1966 年，突然又来了个文化大革命。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敢给看。医生要给右派看病，也被视为右派，右派也传染。当时说我是大右派，真不知是因为罪大，还是年

龄大？我天天打扫厕所，一共打扫了六年。冬天，累得棉衣都湿透了，医生心疼我，给我出主意说：“你隔一天干一次吧。”我说：“我休息一天，人家屁股可不休息。”我隔一天干一天干得更多更累，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今天，反正是漫谈，漫无边际地谈。想到哪，谈到哪儿。

记得那时到医院看病是坐拖拉机去的。医生问：“你是艾青？什么病？”

“小肠疝气。”

一位女医生说：“疝气？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我查过辞源，疝气疼痛时如女人分娩，你们二三年生一次，我们天天如分娩。”后来动了外科手术，开了刀。林彪下台后，才允许我回北京看病。事到如今，我的户口还在新疆。可是，这儿的邻居们十分关心我，还拿购货本借给我，让我买肉。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看到“专制”是多么可怕。人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而在专制下，人民身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重。可姚文元还说民主给得太多了！

我们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无民主，心有余悸，事先感到害怕，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作家不敢写，编辑不敢登，都怕再有康生式的人物。他如一个混世魔王，使得小鸟都害怕。

我认为今天形势很好。今天已允许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要民主，也要讲法制。以后，我相信不会再蛮不讲理了。蛮不讲理将一去不再复返！

春天来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有沼泽地带，还有泥浆路。

我今天就谈这些。

我参加革命五十年了。每当想到在中途牺牲的人，我就感到难过，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干劲！今后，有斗争，不奇怪，无斗争，不可思议。

（选自《艾青全集》第五卷）

## 邓小平

### 一九四 一九九七

四川广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底至1930年初参加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右江、左江根据地。1931年8月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共瑞金县委、会昌县委、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红星报》主编等职，曾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和打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总前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87年辞去其他职务，留任党中央和国家军委主席。1989年11月辞去一切职务。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全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实践。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是作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所作的一次重要讲话。“文革”十年动乱积累下来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拨乱反正，重建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并重新振兴，是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科学教育工作由他分管。他推翻了“文革”中盛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在这篇演说中，他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使科技、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2日）是作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前半部分紧密围绕“解放思想”这一主题展开，指出了思想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提高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重申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进而论及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民主与法制问题。后半部分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定适应新情况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并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篇讲话实际上为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是作者在党和人民总结拨乱反正的经验、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作的一篇重要演说。在演说中，作者将党的“七大”、“八大”与“十二大”作了对比，指出，现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丰富的经验，因而一定能够更加坚定自觉地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开创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里，作者明确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出席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技术革新的能手，科学种田的模范，忠诚于党的科学事业的干部。你们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辛勤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同志们！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

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今天，我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讲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

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末，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伟大成就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他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然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中国的革命，吸引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与之共呼吸。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已得到并且必将进一步更广泛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28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确有很大的进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作这样一个估计，当然并不是说，科学技术人员政治思想觉悟都很高了，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了。而是说，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当然，他们不应该自满，不能就此停步不前，而要继续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不断求得新的进步。至于他们身上还存在着缺点错误，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

题，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参加党几十年的老干部，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吗？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在科学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在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常常摇摆不定。对于他们，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他们，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热情帮助他们进步。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革命队伍的人越多越好，向来主张尊重那些有知识、有专长、有贡献的人，向来主张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而不是嫌弃他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实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我们还要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就使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了。

我们培养、选拔人才，有广阔的源泉，有巨大的潜力。最近，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发现了一批勤奋努力的、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看到他们的优异成绩，我们都感到高兴。尽管“四人帮”猖獗一时，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扑灭广大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没有能够扼杀广大教师为党为人民精心培育下一代的革命积极性。今天，党中央这样关注科学和教育事业，这样着

力于培养选拔人才，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把有贡献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成长的优秀中年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诬蔑为修正主义苗子。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是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讲讲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各级党委要真正做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做到在技术上、生产上不断有新创造和新纪录。全国有几十万个企业、几十万个生产大队，只有每个企业和生产大队都来大搞技术改造，大搞科学实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广泛地在工农业中得到应用，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同时，又要大力抓好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专业的科学研究队伍，是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也难以持久深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我们一定要把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

中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

挥专家的作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

要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不可能所有这些事情都由党委去抓，都由党委去解决。应当老实地承认，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还不懂。即使懂得，也不能事事都由党委来办。要有分工负责，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这样，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

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党委应该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

许多事情，比如对学术论文的评价，科学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考核，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成果的鉴定，等等，都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倾听有关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这是我们科学研究机构党委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强调科学技术人员集中精力搞好科学技术工作，是不是减轻了政治工作的任务，降低了政治工作的要求呢？不是的。这是要求我们提高政治工作的水平，改进政治工作的方法，抛弃形式主义的东西，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认真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要求和创议，就应该给以支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应该进行批评教育。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应该是使每个科学技术人员都了解他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的关系，鼓舞和动员他们以革命的精神，和衷共济，大力协同，努力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

20多年来，我们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应该承认，怎样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好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我们面前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就不会有主动权。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

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推翻剥削制度，改造社会，也一定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工作规律，领导我国人民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同志们！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相继召开，充分显示了全党的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也是一次

团结的大会。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根保证。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祝科学兴旺发达！祝大会圆满成功！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了斗志，增强了信心，加强了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个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

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个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



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

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

好起来，就必须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词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一）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二）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20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

我国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 20 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党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 3900 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动的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以上各篇均选自《邓小平文选（1975 年～1982 年）》）

## 夏 衍

一九 ——

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的组织者、领导者。1919年，在“民主”与“科学”口号吸引下，夏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年中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到日本深造，留学期间，夏衍大量阅读文学、哲学及马列著作，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负责留学生和华侨的组织工作。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夏衍于1927年被迫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并开始翻译外国文艺理论与作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夏衍被选为执行委员，并领导秘密电影小组，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电影工作。1935年，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敌人破坏，夏衍受到追捕，避居于上海一家小公寓之中。在蛰居期间，开始话剧创作，1937年抗战开始，夏衍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总编，尔后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期间被监禁八年多，粉碎“四人帮”后，夏衍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岗位上。

夏衍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党的文化事业工作，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也亲身经历了文化事业来自党内和党外、极“左”和右倾思潮的冲击，尤其是“文革”对文化事业的浩劫更使他永生难忘。这里选编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文化工作者在迎来文艺又一个春天之际，希望文化事业从此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由衷心愿。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1979年）是夏衍经历了痛苦磨炼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后的第一次文化盛会，或许也是他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次文化盛会，因此他的演讲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夏衍讲出了一个老艺术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讲演讲述了三个问题，即思想解放、安定团结和作品质量问题，这三个问题之间有一个逻辑因果联系。思想解放必然会带来文化繁荣，国家昌盛，而安定团结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反过来又保证了思想进一步解放；作品质量是思想解放和安定团结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国力强大、人民安居乐业的文化折射，同时也为思想解放、安定团结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夏衍的演讲朴实无华，切中时弊，将深邃的道理寓含在漫谈式的发言之中，丰富的情感包蕴于随意的交谈之内，是一篇有内容又有艺术性的讲演。

###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闭幕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各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完成了它预定的议程，会议取得了成功，今天就要闭幕了。在这次会议中，有些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议程规定，要我作一个闭幕词。过了10月，我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我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因

此，借这个机会，仿照茅盾同志的办法，讲几点漫谈式的个人意见。不妥当之处请代表同志批评。

#### 第一，关于思想解放的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讲出了问题，而且讲得很好。我想讲的是，在文联和各协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人，我认为还是有的，这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缘故，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没有认真批判的缘故。我这样说，是因为不久之前文艺界曾经吹过一阵“冷风”，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把社会上一小撮坏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也归罪于思想解放过了头。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极端有害的。第一，因为它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在文艺界，思想解放不是过了头，而只是露了一点头，离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民主还有一段距离；第二，因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五四运动虽则也反对孔孟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但并没有把整个盘根错节的封建思想体系彻底摧毁。实践证明，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过来人，是有一些切身体验的，从辛亥革命的剪辫子，到五四运动以后写文章用白话，加标点，这一类小事也都经过了时间不短的激烈斗争。而在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时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要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曾经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马、恩和列宁多次引用过歌德的一句名言，叫做“亲爱的朋友，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这句话说得真好。它说明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明了生活是理论的源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呢？是从属于生活的。这并不是对理论的贬低，而是揭示了它们的内在关系。我以为，这一句话也适用于马列主义这个伟大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已经一百多年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些都是经受了各方面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着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他们所能看到的生产关系，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他们所能看到的生产力，主要是用蒸气机推动的火车、轮船和皮带传动的机器，他们没有看到过广泛大量利用电力乃至原子动力来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列宁看到了发电机和电力传动体系，因此，他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很明显，如果要求马克思当年讲这句话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今天再有人讲这句话，那显然也是不很贴切的。假如列宁今天还在，他也许会讲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子计算机了。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兴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经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也只能是一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直到如今，不论在苏联、在中国、在东欧，以至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而进行不断的调整。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对农民先实行了

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改行新经济政策，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党接受了苏联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开始就采取了通过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在农村生活没有太大变动，生产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很快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正是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不是违反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理论要保持它对实际生活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

近年来，不少人出国考察，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感到惊异。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 1929 年，资本主义制度碰上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恐慌，那时，我们都认为，这个“垂死的”社会制度的确在阻碍着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了。可是很奇怪，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循环不断的经济萧条，但从 60 年代中叶到现在，却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倒退，反而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新的情况，给马列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的思想也必须适应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正视我国当前迅速变化的实际，来考察我们过去用惯了的文艺理论，而不能“刻舟求剑”。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文艺是否能仅仅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问题；一切意识形态是否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在题材多样化中有关反对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

全国解放后，我们常说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30 年来，在文艺领域中很少强调反封建的任务。过去我们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 30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道路，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该归入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之列。当然反映这些题材的作品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恰当的表现形式。文学和新闻都有它们特有的敏感性，这里有一个安定团结和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关于安定团结的问题。

谈到安定团结，文艺界也的确有一个加强团结的问题。我们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不论在抗战前、抗战中、解放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分歧，在总的方向上应该说是团结得很好的。但是，林彪、康生、“四人帮”这批恶棍，拉帮结伙，制造派性，破坏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团结。经过三年来的“拨乱反正”，清理积案，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个人恩怨、宗派情绪——特别是林彪、“四人帮”蓄意扶植起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排座次、争名位、要待遇的习气还没有根除。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以后，能够将 17 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恩怨抛入东洋大海，彻底清



除一切妨碍团结的因素，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艺术创作上、理论研究上，使我们这支队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成为一支坚强不屈的钢铁队伍。

今年5月，胡耀邦同志在文化部召开的五个专业座谈会上讲过：林彪、“四个帮”把中国这条大船弄到濒于沉没和触礁的危境，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条船才免于沉没。这使我想起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这两句古话。因此，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顾全大局的问题。大家知道，1971年，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破坏到濒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经过三年的努力，这艘载着九亿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大船，不仅已经免于沉没，而且经过紧急而稳妥的措施，已经开始在风浪中前进。但是，由于破坏的严重，整修完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快速前进是不适当的。从打倒“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冤案、错案，同时还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强化。我们每一个“同舟”的人都应该有互谅互助——也就是“共济”的责任。今天，我们还有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内部不安定是很有兴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宣传机构，对于我们内部闹事和暂时困难，总是不厌其详地反复报道；而对于我们内部的巩固和成就，却常常保持沉默，甚至连国庆三十周年叶副主席讲话这样的大事，也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不作实质性的报道。这些情况，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但是，我相信，一个爱国作家、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对感到感兴趣的题材、事件、人物进行创作之前，必然会考虑到怎样使之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平，必然会感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肩负的重大责任。

第三，我还想提一下文艺作品的质量问题。

三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别是在短篇小说、话剧、诗歌等方面，成绩比较显著。我不在这里列举周扬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了。应该承认，那些作品都能解放思想，突破旧的清规戒律，不少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最受欢迎的作品在内，在艺术技巧、技术方面都还有不少的缺点。这当然和作者的思想水平与生活积累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地，也和作者的文化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责怪现在的青年乃至中年作家。一个四、五十岁的作家，正处于创作的盛年，但在全国解放时，才是个十几、二十岁的青年，本来这是他们一生中潜心学习、积累知识的重要阶段，可是，他们的青春年月却是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度过的。因此，除少数人外，他们没有得到在文艺创作上打好坚实基础的机会。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应当继续深入生活，同时加紧提高文艺修养。我很同意茅盾同志在11月3日讲话中所说的：“现在的青年和中年作家，既要在继承和借鉴两个方面补课，在本国历史、世界各国历史两个方面补课，又要吸取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科学的知识。”否则，要在不久的时期内产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样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在年龄上，我和茅盾同志只差几岁，但是在文化修养方面却有一段很大的差距。茅盾同志在二十岁左右已经读过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写很好的骈体文，还能从英文翻译文学名著。而我在中学时期虽也读过一些古籍，但是，19岁

那一年碰上了五四运动，来了一个“全盘西化”，于是，我就泡在 19 世纪的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去了。这一点，我没有反悔，因为，这一泡使我得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的粗浅知识。正由于这样，我对本国文学的传统，包括从《诗经》起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本国文学的理论，如诗论、文论、剧论等等，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学习这些中国文学的珍贵财富，是在解放以后，因工作的逼迫而开始的。这就是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时期，文艺工作者再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害怕像五七年那样的政治运动了。对中年作家，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对青年作家，则是一个时不可失的学习机会。我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中已经有了不少既解放思想，又有文艺才华，同时还具备着一定的文化素养的同志。我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文联和各协会能迅速地采取措施，制定规划，在文艺界普遍地造成一种好学深思、勤学苦练的空气。那么，10 年、20 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祖国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我们文学艺术界也能够产生出许多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最后，我受大会委托，向为胜利地完成这次大会的任务而给予我们热情帮助的中央、国务院和宣属机关，北京市和解放军等有关单位，以及为大会的顺利进行而废寝忘餐的各方面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选自《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 华罗庚

一九一 ——一九八二

江苏金坛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1924 年从金坛县中初中毕业后，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0 年因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重视，被邀请到清华大学当助理，一年后任助教，又一年升为讲师。1934 年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 年去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1938 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其间写有《堆垒素数论》专著。并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46 年去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1948 年在美国意大利诺斯大学任教授。1950 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1954、1955 年间，著有《数学引论》和《典型群》。1958 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著有《高等数学引论》（第一卷）。后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67 年开始研究优选学，写成《优选学》和《优选法平话》，并到全国各地开展推广运用统筹法和优选法工作。这期间，华罗庚教授还与王元教授合作开展了近代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上的应用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1978 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外，自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以来，他就是这个协会的副主席。他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82 年，在出席日本举行的国际数学大会时，不幸猝然病逝。

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不仅在数学研究和数学应用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且在培养青年、乃至少年数学爱好者方面也竭尽了不少心血。这里选编的他的演讲就是他回母校的一次讲演。

《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1981 年）是华罗庚勉励中学生发愤读书的一篇生动的讲演，华教授现身说法，追述了自己一生遭“三劫”的不平凡经历，总结了一生的真谛：靠自学，介绍了自己“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的奋斗经验，亮出了自己奉行的“不空不松，从严以终”的人生哲学。华教授一再告诫中学生要珍惜现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要加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华罗庚的讲演令懒惰者汗颜，令有志者奋进。

### 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

今天，我就给在座的好多先后同学谈谈我的经历，也就是我的学历。我的经历，或者说我的学历，讲起来也简单，也不简单。说简单，就是三个字：靠自学。说不简单，就是一生中，遭受过许多次“劫难”。

现在，我们大家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如果从“劫”字谈起，那么我这一辈子碰到过三“劫”，我准备讲一讲我怎么度过这三场“劫数”的。这样，同学们也可以对比一下，把现在的环境，同我从前的那个环境对比，看哪个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如果今天的环境确实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好，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走到前面去。这就是我讲话的目的。我不是要在这儿宣扬自己，而是把我的经历给同学们作借鉴。

先说第一“劫”。这一“劫”就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开始的。你们现在叫金坛县中了，我们当时叫金坛初中，最高班是初中三年级。在国外有时人家

问我什么学历，我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初中，金坛县初中毕业。人家问我有什么文凭，我说，我有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的文凭，除此之外，没有了。一直到1980年才发生了一个变化，法国给我荣誉博士证书，现在总算有头衔了，以往都没有。我初中毕业是多少岁呢？我只有15岁。后来，又到上海进了一年职业学校。尽管那个学校给了我免交学费，不过还是交不起饭费，后来只好回家呆着。我的家，就在大桥那边，现在叫南新桥，从前叫大桥。我就住在桥东。在家怎么办呢？要是现在的话，没有机会上正规学校，也会有许多其他求学的机会，像电视大学啊，函授大学啊，我们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方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图书馆，我只有大本代数，一本解析几何，还有一本很薄的五十页的微积分，我就啃这么几本书。那时候，这当然也不知道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感觉我们应该为国家出一点力，争一点光。我就这样开始钻研学问了。也许有人要说这是笑话，念了几年书就谈钻研了。那不是笑话！钻研并不是迷信，并不一定大学毕业才能钻研，也不是非有齐全的条件不可。实际上，真正肯钻研的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钻研。这是大约1925年到1928年的事情。我记得，后来大约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又有机会回到这个学校里面来了。到这个学校来做什么呢？当会计兼事务。那时我的老师王维克，预备提拔我一下，预备搞一个初中一年级补习班，让我去教书。但刚有一个计划，不幸我的母亲在那年死了，我也生了重病。我病在床上六个月，腿就坏了。要是在今天，我的腿是不该坏的。现在都知道，如果生病睡在床上睡久了，不翻身会发生组织坏死，所以不管疼不疼要翻几个身，那个时候我们既请不起医生，也没有哪一个人告诉我这个常识，所以病后起来，就不会走路了。本来嘛，不生病，身体好，还可以多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挣碗饭吃，可是我的腿坏了。我们家里原不宽裕，我一生病，那就更穷了。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还是让我参加工作，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但结果有人告了一状，说什么王维克校长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校长是法国留学生，做初中校长，未免委屈，他一听有人告状，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几乎没有办法了。继任的校长叫韩大受，他说，旁人上任要带会计来。我不带，就让你干，不过书万万不能教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了你任课而被告了一状的。这样，我总算当了一个会计。有了一点办法，我就继续钻研下去。不久，清华大学找我去任职。那大约是1931年。到了清华，他们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安排我的工作？这是个麻烦，因为要在清华大学当个助教，应当有大学毕业的资格，否则又是不合格的教员。后来，清华大学安排我当数学系助理。所谓助理，就是管管图书，管管公文，打打字，办点杂事。助理已经很不错了，我继续抓紧学习。过了一年半，他们让我教微积分。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没资格啊！清华大学的教授为此特别开会通过，让我教微积分。这等于说，清华大学承认我了，我可以抵得上大学毕业了。从初中毕业到当大学教师，我前后大约用了六年半时间，通常初中到大学毕业要用八年。从这一点同学们可以看到，学习要自己努力，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

到1936年，我就到英国去了。1938年我从英国回来，因为那时候抗战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来后，清华大学就让我直接当教授了。从助教到教授，前后又是七年。现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机关，自己是大学毕业生，环境很好，又有书，又有杂志，又有导师，更重要的还有党的领导，但就是对赶世界先进水平没有信心。要知道，到二〇二〇年还有二十年啊，能不能赶得

上呢？从我的经历里面，同学们可以算一笔账，只要有一点简单的算术知识，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难。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旧社会，又没有书，又没有钱，又没有老师，甚至没有灯光，电灯黄黄的，一点儿光，看不清。今天，在党的关怀之下，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请同学们对比一下，一方面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信心。现在很多人没有信心，能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从我的体会讲，我觉得有信心，赶得上。不过做个懒人可不行，要更加努力，才赶得上。

现在，再讲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国外的资料，甚至杂志之类都看不到。不但封锁，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还被迫做买卖了，他们跑仰光，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我住在昆明乡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楼板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了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是在这种微弱的灯光下，我从1940年到1942年完成了我的《堆垒素数论》，后来又跨到了矩阵几何。

抗战胜利后，我到美国去了，当上了“洋教授”。我当“洋教授”也比较困难。别人是又有博士头衔，又有大学毕业证书，我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是让我当了教授。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艰苦环境里，由于坚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是“臭老九”，当然不能幸免。1980年，外国又来邀请我去讲学。有的老朋友很关心，也有点担忧。他们说，这次华罗庚出国，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了，还能不落后吗？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一方面是各处跑，搞统筹优选，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背后还要防“四人帮”的冷箭，虽然时刻提防，我还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1975年被射倒过。所以，有些朋友的关心、担忧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里国”。什么叫“外通里国”？就是外国知道我的名字，有书出版就寄一点给我。这样，我不通过图书馆，也可以知道一些国际行情。而且，他们不了解，我始终没有放弃理论研究。那时候，我身体还很好，白天紧张地搞优选法，有时上午跑四个厂，下午跑三、四个厂，一天跑七、八个厂。尽管这样紧张，我没有放松理论研究。我的理论研究是晚上进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说不定晚上一点钟、二点钟被叫醒，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搞。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不过那个时候搞了理论研究还不敢说。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暴露出来，等一会就要说：你看这个华罗庚，用统筹优选作幌子，他实际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论研究。这种人后来一看形势变了，他又改一个手法，说华罗庚就只搞统筹优选，不搞理论研究。反正这种人理论不多，实际也不高，但他有一种本领，手里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论他就打你的理论，你搞实际就打你的实际。那时期我

们的帽子当然不少罗，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也戴过了，以目乱纲的帽子也戴过了。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只知道统筹优选对人民有利，我要搞；我只知道，没有理论就搞不出优选来，所以理论也要搞。

不过，我们刚出国的时候，心里终究也不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十几年中虽然是搞了一些理论研究，但毕竟遭到了损失，许多手稿也抄的抄了，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写下来，或者只写了一点草稿，在脑子里像散沙一样，像乱麻一样。如果出国以后，立刻叫我上台讲演的话，我还真有点担心，亏得去了之后开了两个学术性会议，会议后刚好暑假到了，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好之后，我给了他们一个单子，单子提了十个方面。一般讲演，提出几个专题就够了，拿自己最擅长的专题就够了。可是我们提了十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国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学问广、精、深，数学十个方面都可以讲？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到一个地方去，与其讲自己所长的，不如讲自己所短的。讲自己所长的好不好？我在这儿跟同学们讲一下哥德巴赫问题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大家都听不懂。你们会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华罗庚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一定是有学问的。可我自己有收获没有？我自己没有，得不到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十个方面来，好让人家自由选择。让他们选，他们一般都是选他们最好的东西，最拿手的東西。好，我就到你那儿讲你们拿手的東西。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切忌班门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弄斧必到班门！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那儿去耍。在旁人面前耍，欺负人家干啥？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如果他说你有缺点，一指点，我下回就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有相当成绩。俗话说，下棋找高手。找一个比我差的人，天天在那里赢他的棋，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下棋，每一次都输给他，输这么半年下来，你的棋艺能够没有进步吗？所以我主张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这一次，我跑了四个国家，好几十个城市，做了好多次报告。反映怎么样呢？我给跟我出去的同志说：你们向上面汇报，第一，大家给我讲的好话，你少吹点，如果说一点的话，最好是有书面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外国人对学问还是很严肃的，不瞎吹瞎捧别人，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一点，因为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到那里去，人家大多是我的学生辈，你又是借了新中国的威信，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人家捧一两句会不会呀？我想是会的。所以，我们情愿估计我们的差距比人家大一点，而不要估计我们比人家好，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能某篇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整个加起来呐，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因为差距是指面上的差距，不是说我们有个个别的人，他的数学很好，或者他的某一门科学很好，我们中国的科学就很好了。我们是一个面上的差距，是整个的差距。所以领导上再三强调，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际真正的水平是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水平。当然也不排斥我们有若干个特殊的人先搞好，搞得好。这次我在国外，也同国内一样，“人民来信”多得很。我只想给大家念一封信，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在荷兰听了我的报告，他是这样写的：“您在安纳本的演讲，是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您向大家证明了，好的学者即使是在最恶劣的逆境中，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您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和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只能感到羞愧。”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他给我写了这封信。这说

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不能把我国人民压倒。由于我们能够坚持工作，结果还是做出了成果。这个成果还得到世界上学者的承认。而现在是“四害”除掉了，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过了，同学们想一想，现在环境这样好，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信心呐？我想，你们是会作出叫人欣慰的回答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困难肯定有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困难，也决不会比从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更严酷。就是再有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对我个人讲，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当然是会有困难的。除了其他困难，眼前就面对着：自己有成果了，满足于现在的成果，甚至骄傲自满；国外有名声了，国内也有了，我可以歇口气了，可以不要学习了；而且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就指导指导人家搞研究，自己少吃点苦吧。如果这样想，那就是一个危险，这是自己造成的困难。比如，今天我在这里跟同学们见面，以老同学的资格给大家谈自己的经历，就很容易产生满足的思想。所以我要警惕。满足的思想是不能有的。因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是精益求精的。科学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更加大的劳动。我顺便在这儿给同学们把自己的思想暴露一下，讲了之后，对我自己可能有好处的。

我为了经常提醒自己，给自己写了几句话，叫“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从严以终。”像我这样的年龄，是很容易“松”下来的。当然，并不是说年纪轻的人就不会松呀！年轻人如果要松起来，对不起，我就要以老学长的资格打他的手心啦！总之，搞科学，做学问，要“不空不松，从严以终”。要很严格地搞一辈子工作，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常常对自己说：以前三次浩劫，都没有把我打垮，说不定很可能最后从我自己的思想上，在已经有收获的时候，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一定要警惕。

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比我从前碰到的情况好多了。我走的是自学的道路。自学嘛。就得靠自己勤奋努力。有的同志要我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很系统的一下子讲不出，我想：一、自学最起码的一条要踏实，从自己水平出发，不要好高骛远；二、自学要有周密的计划，要经常检查；三、在自学过程中要多想多练；四、要以长期性、艰苦性克服自学中遇到的困难。要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我曾写过这样四句话：“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呆。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选自《学人谈治学》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 巴 金

— 九 四 —

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封建大家庭的衰败，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对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29年发表处女作《灭亡》（长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写出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寒夜》。这些作品思想深刻，风格细腻，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鲁迅曾对巴金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两度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满腔热情地抒写了在朝鲜战场的见闻，讴记歌志愿军指战员。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创作了许多以歌颂新生活、赞美新社会、保卫和平等为主题的散文。“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精神焕发，重新开始写作，除将建国三十年来写的散文编选成《爝火集》出版外，还出版了《巴金近作》、《巴金散文选》、《探索与回忆》、《心里话》和五集《随想录》。这些作品情感深沉，敢讲真话，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1984年）是作者在日本东京出席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这一届国际笔会的总议题为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在曾经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来讨论这一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作者以自己在广岛、长崎访问时耳闻目睹当年核爆炸残迹的感受，对深受战争残害的日本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以一个老作家的强烈责任感，呼吁各国作家用自己手中的笔承担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以使广岛的悲剧不致重演，使核时代成为和平建设的时代。他坚信：“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演说中，作者还谈了自己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感受，话语之间，使人感到其胸中澎湃的激情不减当年。

###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主席先生：

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作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



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听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死亡人数最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我们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1961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1927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支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

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支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不会忘记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外国军队还在侵犯别国领土，屠杀别国人民，摧残别国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核裁军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就像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的利剑，倘使有一天核弹头落了下来，那么受害的绝不是一个广岛，整个文明世界都面临大的灾难。然而核时代的文学绝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用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应当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只有和平建设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昌盛繁荣，保卫世界和平正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核时代的文学本来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人类怎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生活，建设灿烂的文明。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产生许多感人的诗篇，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了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又鼓舞读者。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头上还聚着乌云，我们耳边还响着战争的叫嚣，我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1980年春天我访问了那个城市，在和平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绝不容许再发生1945年6月6日的悲剧。”关于广岛，我读过不少“鲜血淋漓”的报导和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那次访问日本我特别要求去看看广岛。在那里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几年前的一片废墟，而是现代化城市美好繁荣的景象。美丽的和平公园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陶醉在濑户内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开的樱花，觅食的鸽群，嬉笑的儿童，华丽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厂，繁华、清洁的街道……短短的两天中，我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我对广岛人说：“我看到了和平力量、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在广岛我上了这动人心魄的一课。不允许再发生广岛的悲剧，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亲爱的朋友们，各国作家在东京集会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最大的愿

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核武器的祸害。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我们主张和平，更期望长期的和平。我们并不轻视自己，笔捏在我们手里就可能产生一种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文学塑造人们的灵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总有一天广岛和平公园中的“和平之灯”会熄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来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服务的时候。那么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亲爱的朋友们，到东京参加大会，我感到特别亲切。在会场中我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国的古文化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也向日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仿佛又听见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的声音。他们都曾在日本学习、生活，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以文学为武器的战斗旅程。我 1935 年也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60 年代中的几次访问，我总是满载友情而归。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的心拴在一起。频繁往来，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着友谊的火，为子孙万代铸造幸福。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 1981 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罗兰、高尔基、肖伯纳、H·G·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支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1984 年 5 月 15 日在东京第 47 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发言）

